



・許良英簡歷・

許良英先生是當代中國著名的科學史家，愛因斯坦著述在中國的主要編譯者，和中國的科學民主自由人權事業的最堅決的推動者。1920年5月3日出生於浙江省臨海縣，1942年浙江大學物理系畢業，1947年任中共地下黨浙大支部書記，1952年調到中國科學院工作，1956年調哲學研究所，研究科學哲學和科學思想史。1957年因公開反對“反右”運動，被定為“極右分子”，回老家當了20年農民。從1962年開始，在極端困難條件下，主持編譯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於1976年後陸續出版，對中國當代思想解放有極大影響。1978年，許良英重回科學院，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工作；同時積極參與、推動中國民主啓蒙運動，在1989年初發起一封42位知識分子呼吁政治民主化和言論自由的聯名信，在1992年發表《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二者皆引起巨大反響。2008年因其“一生宣揚真理、民主和人權”而被美國物理學會授予薩哈羅夫獎。

呼喚民主與人權

賀許良英先生九十壽辰

王作躍・劉兵・陳恒六◎編



明鏡出版社

www.mirrorbooks.com

呼喚民主與人權

賀許良英先生九十壽辰

王作躍・劉兵・陳恒六◎編

明鏡出版社

《文化清涼》系列(四十二)

• 本書簡介 •

許良英先生是當代中國著名的科學史家，愛因斯坦著述在中國的主要編譯者，和中國的科學民主自由人權事業的最堅決的推動者。2010年，為慶祝許先生九十壽辰，他的一些親友和學生，包括中國著名冰川學家施雅風、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1989年中國學生民主運動領袖王丹等，紛紛撰寫文章，介紹許先生的經歷、社會政治理念、學術貢獻，以及他們與許先生的交往。本書收集了這些文章出版成集，以期更多的讀者能夠得以認識許良英先生並與他一起推動中國社會的向前發展。

呼喚民主與人權

“[我在1985年在]浙大‘開放改革’演講中的許多觀點是許先生的。。。所以，我被開除黨籍后，許先生有一點不服氣，為什麼不同時開除他？中央也不調查，方勵之浙大報告的‘黑手’，不折不扣的‘黑手’，是許良英”。

——方勵之

“在八十年代風起雲涌的思想啓蒙運動中，許良英成為科學界中最勇于發言的代表人物。。。1995年我因為參加公民上書運動而第二次被捕入獄。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許先生挺身而出，在1996年公開發表了《為王丹辯護》一文，抗議當局對我的審判。當時在獄中得知許先生的聲援，對我來說是巨大的溫暖，也鼓勵了我堅強面對環境的險惡”。

——王丹

“我十分欽佩你研究民主的學術著作，十年二十年后必然成為‘國民必讀’。”

——李慎之致許良英，2002年1月21日。

“我們呼吁實現開放與正義，不是為了把我們的觀念強加于人，而是為了使中國人民能够表達他們的意見。正如中國科學家許良英所說：‘向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We press for openness and justice not to impose our beliefs, but to allow the Chinese people to express theirs. As Chinese scientist Xu Liangying has said: 'Human nature is universal and needs to pursue freedom and equality.'”）

——喬治 W. 布什，2008年8月7日在曼谷的演講

“為其一生通過寫作及向公眾傳播，宣揚真理、民主和人權，即使在遭受監視、軟禁、騷擾與威脅，甚至流放的條件下也不放棄”（“For a lifetime's advocacy of truth,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 despite surveillance and house arrest, harassment and threats, even banishment -- through his writings, and publicly speaking his mind.”）。

——美國物理學會授予許良英2008年薩哈羅夫獎獎辭

《文化情理》系列(四十三)

呼喚民主與人權

賀許良英先生九十壽辰

王作躍・劉兵・陳恒六◎編

明鏡出版社

www.mirrorbooks.com

**An Advocate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Essays in Honor of Xu Liangying on His 90th Birthday**

Compiled By

Wang Zuoyue, Liu Bing, Chen Hengliu

Published in 2012 by Mirror Books

© Copyright by Mirror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 978-1-935981-53-4

Publisher: Pin Ho

Cover by: Meng Yu

P. O. Box 795, Deer Park, NY11729-0795, USA

TEL:(516)338-6976

Web: www.mirrorbooks.com

E-mail: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明鏡出版社出版品受國際版權公約保護
版權所有，禁止翻印，轉載，複印，違者必究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本社立場

本出版品缺頁或裝釘錯誤，請寄回更換

序

許良英先生是當代中國著名的科學史家，愛因斯坦著述在中國的主要編譯者，和中國的科學民主自由人權事業的最堅決的推動者。2010年，為慶祝許先生九十壽辰，他的一些親友和學生紛紛撰寫文章，介紹許先生的經歷、社會政治理念、學術貢獻，以及他們與許先生的交往。作為許先生的學生，我們收集了這些文章出版這本書，以期更多的讀者能夠得以認識許先生並與他一起推動中國社會的向前發展。在此我們向各位作者致以深深的謝意，並感謝周密女士和美國《世界週刊》允許我們在附錄裏收入周女士2008年在該刊上發表的關於許先生的文章，以及陳罕立等各位為編輯出版本書所給予的大力幫助和辛勤勞動。為方便讀者瞭解許先生、閱讀本書，我們還撰寫了下面一個許先生生平簡介。

許良英於1920年5月3日出生於浙江省臨海縣括倉山山麓的張家渡村，1924年入家鄉小學，1930年轉學到海門（今椒江市），1935年入浙江大學代辦高工（相當於高中）電機科。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高工被解散，許良英回到家鄉自學物理，初次閱讀到愛因斯坦的

序

“極右分子”，結果回老家當了20年農民。

1962年6月，他接受哲學所委託，編譯愛因斯坦著作選集。在眾多好友襄助下，經過16個寒暑，歷盡坎坷困頓，終於完成了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成為當時世上最完備的愛因斯坦思想文庫。

1978年6月，許良英重回科學院，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工作，研究物理學史、近現代科學史、科學與社會。與生物史學家李佩珊等一起編寫《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1983年出版）。1980年2月，中共中央重新設立書記處，胡耀邦任總書記。兩個月後他要求科學家為書記處成員和國務院領導人開設科學技術講座。第一講為科學史，由錢三強主講，講稿主要由許良英和李佩珊起草。他在講稿中提出“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當年十月，在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成立大會上，他宣讀論文《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對上述論點進一步論證，在中國當時知識界引起較強烈反響。

1986年11月，方勵之與許良英、劉賓雁在許良英家共同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訂於1987年2月3-5日召開。但由於在方勵之鼓動政治改革演講的影響下，發生了學生上街要求民主的遊行，激怒了自封為“第二代核心”的鄧小平，導致1987年初方勵

賀許良英先生九十壽辰

“極右分子”，結果回老家當了20年農民。

1962年6月，他接受哲學所委託，編譯愛因斯坦著作選集。在眾多好友襄助下，經過16個寒暑，歷盡坎坷困頓，終於完成了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成為當時世上最完備的愛因斯坦思想文庫。

1978年6月，許良英重回科學院，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工作，研究物理學史、近現代科學史、科學與社會。與生物史學家李佩珊等一起編寫《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1983年出版）。1980年2月，中共中央重新設立書記處，胡耀邦任總書記。兩個月後他要求科學家為書記處成員和國務院領導人開設科學技術講座。第一講為科學史，由錢三強主講，講稿主要由許良英和李佩珊起草。他在講稿中提出“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當年十月，在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成立大會上，他宣讀論文《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對上述論點進一步論證，在中國當時知識界引起較強烈反響。

1986年11月，方勵之與許良英、劉賓雁在許良英家共同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訂於1987年2月3-5日召開。但由於在方勵之鼓動政治改革演講的影響下，發生了學生上街要求民主的遊行，激怒了自封為“第二代核心”的鄧小平，導致1987年初方勵

呼喚民主與人權：賀許良英先生九十壽辰

之、劉賓雁和王若望（誤為許良英）被開除黨籍，胡耀邦被罷黜。

1989年初，許良英和大學同學、冰川學家施雅風為紀念《人權宣言》200周年、五四運動70周年，發起一封由42個有成就的知識份子（主要是自然科學家）簽名的、呼籲政治民主化和言論自由的聯名信。由眾多科學家公開發表政見，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

1992年許良英發表《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對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大潑冷水。1994年，他發起“改善人權狀況”的呼籲，卻被政府軟禁3天。1995年，他又聯合老師王淦昌等44位知識份子，發表“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寬容”的呼籲書，得到國際科學家的連署，反響很大。儘管他自己的文章在國內還是經常受到壓制，不給發表，但他從未放棄為民主、自由和人權的訴求，以各種方式繼續進行民主啟蒙工作，為此在2008年被美國物理學會授予薩哈羅夫獎。他和夫人王來棣多年來合作撰寫的著作《民主的歷史和理論》將於近期完稿出版，相信它會對中國的民主事業產生深遠的影響。

目 錄

序

照片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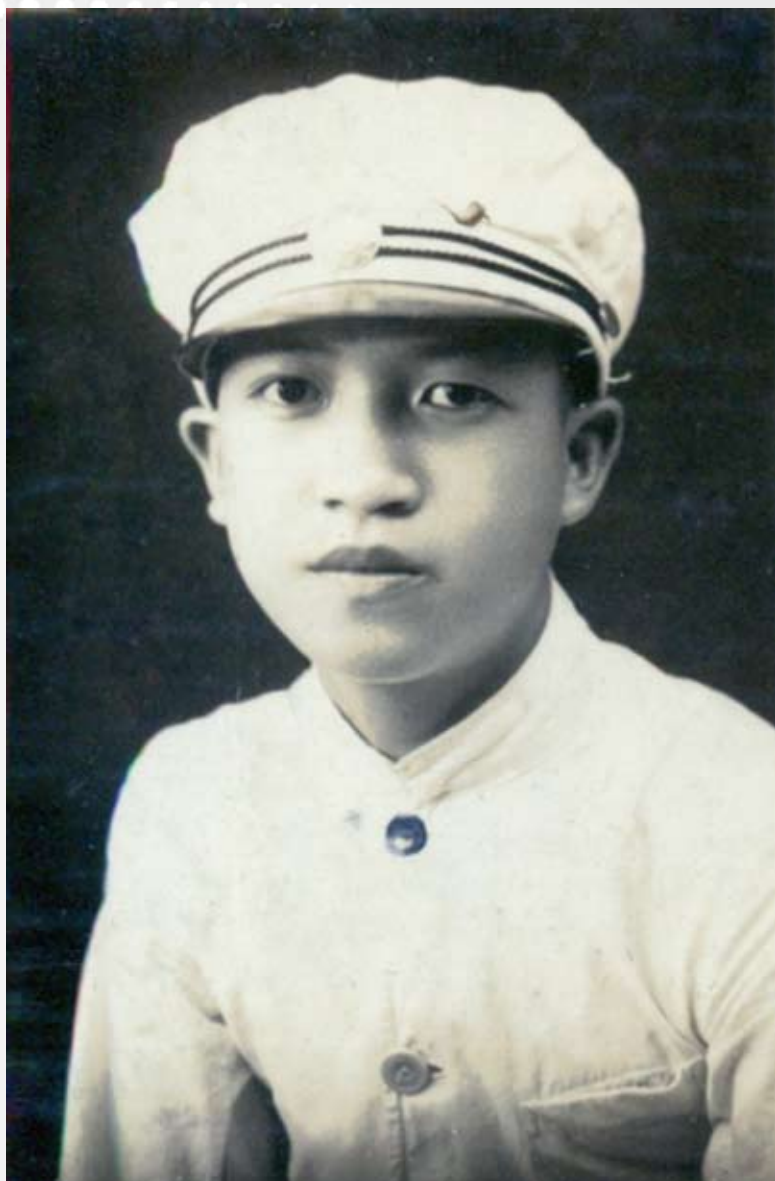
施雅風	許良英：呼喚科學自由民主的大家 ——祝賀科學思想史傑出學者許良英教授九十華誕	1
方勵之	許良英先生九秩賀	14
吳洵高	良師益友、嚴師諍友 ——略記與許良英老師交往片斷	20
王 丹	許良英：中國科學界民主運動的先驅	46
傅國涌	“嚮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 ——為許良英先生90歲而寫	55
王德祿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祝賀許良英先生90華誕	64
武文生	許良英先生對我的教誨和影響	76
陳恒六	真正的仁者只有傲骨沒有傲氣 ——祝許良英老師九十大壽	96
劉 兵	嚴師小事，學問大事 ——寫于許良英老師90誕辰之際的幾則回憶	109
王作躍	“肩住黑暗的閘門”：我所知道的許良英老師	115
胡大年	科學史研究的良心 ——記許良英先生言傳身教二十余載	137

呼喚民主與人權：賀許良英先生九十壽辰

許成鋼	做人—做學問，人生觀—世界觀：祝父親九十 大壽	166
附錄1	《人民日報》1957年7月29日文章“……許良 英的靈魂滲透了右派思想”	198
附錄2	《人民日報》1957年8月3日文章“他們在哲學 研究所研究什麼？”	201
附錄3	《世界週刊》2008年6月22日文章“許良英：死 心塌地追求民主”	203



1931年1月1日許良英於家鄉浙江臨海
(今台州市椒江區) 女子小學，生平第一張照片
(許良英提供)



1935 年夏許良英在浙江臨海海門，初中畢業照
(許良英提供)



1947 年許良英在杭州（許良英提供）



1949年8月1日王來棣、許良英在杭州（許良英提供）



1957. 4. 北京

1957. 4. 于苏联展览馆莫斯科展厅外

顾震潮摄

反右运动前 2 个月

1957年4月許良英一家在北京“蘇聯展覽館”（後改名“北京展覽館”）。攝影者顧震潮是許良英摯友，有成就的大氣物理學家
（許良英提供）



1957年5月12日許良英一家在北京
(許良英提供)



1975年8月13日許成鋼、許良英在杭州
(許良英提供)



1978.3.17.

北京海淀紅藝

1978年3月17日許良英在北京，回科學院前3個月
(許良英提供)



1980年8月21日許良英與美國國家科學院“美中
學術交流委員會”駐北京代表Pierre M.Perrole 在
北京的北京飯店（許良英提供）



1980.8.24.

1980年8月24日王來棣、許成鋼、許良英、許平在北京潭柘寺（許良英提供）



1983年11月許良英（右一）、李佩珊（右三）
與美國科學史家Erwin Hiebert（右五）、Gerald
Holton（右六）在美國哈佛大學會談
（許良英提供）



1984年10月杭州（自左到右）前排：谷超豪 周志成 許良英 鐘沛璋 洪德銘 陳向明 吳大信；後排：張申 陳業榮 田萬鐘 鐘伯熙 吳洵高 崔兆芳 王來棣 徐永義 陳永時（吳洵高提供）



1985 年許良英（前右一）、李佩珊（後右二）
等在北京會見Hiebert（前中）
（許良英提供）



1986年5月28日許良英與他的研究生仲維光、王作躍、陳恒六、劉兵在北京許良英寓所舉辦物理學史討論班（許良英提供）



1986年11月14日許良英（左起）、李淑嫻、方勵之、劉賓雁在北京許良英寓所商討在1987年舉辦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學術討論會（陳罕立攝，許良英提供）



1987年3月王來棣、田萬鐘、吳洵高、許良英、李景先在北京許良英寓所討論撰寫杭州學運史（吳洵高提供）



1987年10月吳洵高和許良英在杭州于子三墓
(吳洵高提供)



1987年9月3日許良英會見在北京講學的美國物理學史家Abraham Pais（許良英提供）



1987年9月3日範岱年（左二起）、方勵之、許良英、Pais、李佩珊、劉遼（右起第一）合影於Pais在北京講學結束時（許良英提供）



1987年9月16日李佩珊（前排左三起）、錢臨照、方勵之、許良英、範岱年等在北京參加“20世紀中國科技史討論會”（許良英提供）



1988年5月12日範岱年（左一）、方勵之（左三）、許良英（左四）在北京李佩珊家中會見來訪的美國物理史學家Lawrence Badash（左二）
（李佩珊攝，王作躍提供）



1989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長閻明複（左五）在統戰部與呂東明（左二）、王來棣（左三）、許良英（左四）、施雅風（左六）等合影
（許良英提供）



1989年初王丹、許良英、方勵之（前排）在北京
（許良英提供）



許良英與方勵之，年代不詳（1987）
（許良英提供）



許良英在北京寓所，年代不詳
（王增基攝，吳洵高提供）



許良英1996年9月6日在北京接受美國物理學史
家Lawrence Badash教授贈送愛因斯坦體恤衫
(王作躍攝、提供)



1997年2月18日許良英（左起）、胡濟民、周志成、汪容在北京看望老師王淦昌（中）
（許良英提供）



1998年11月9日許良英在北京醫院看望病重的恩師王淦昌（許良英提供）



施雅風與許良英在北京許良英寓所，年代不詳
(施建平提供)



2004年5月11日許良英和王來棣在北京寓所
(王增基攝，吳洵高提供)



2004年5月11日許良英和王來棣在北京寓所
(王增基攝，吳洵高提供)



2004年5月11日許良英在北京寓所
(王增基攝，吳洵高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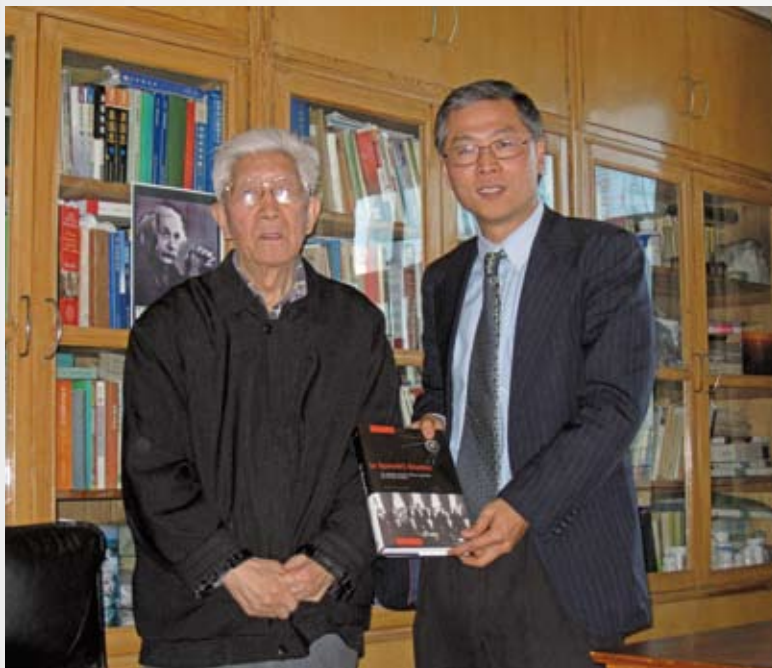
2005年7月17日許良英、王來棣（前排）和王作躍（後排左起）、劉兵、陳恒六于北京許良英寓所
(劉兵提供)



王作躍（左起）、Noemi Mirkin、許成鋼、
Edward Gerjuoy、Noemie Koller、曾敏兒、胡大
年2008年4月13日參加美國物理學會在聖路易斯
市年會上為許良英頒發薩哈羅夫人權獎而舉辦的記
者招待會（周密攝，王作躍提供）



王作躍（左起）、許成鋼、胡大年2008年4月13日在美國物理學會給許良英頒發薩哈羅夫人權獎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周密攝，王作躍提供）



2009年1月9日王作躍贈送自己的英文專著In
Sputnik' s Shadow 給恩師許良英;在扉頁上王
作躍把書題獻給他的中國導師許良英和美國導師
Lawrence Badash（王作躍提供）



2010 年3 月包紅梅（左起）、許良英、劉兵在北京
許良英寓所（劉兵提供）



2010 年許良英（前中）、劉兵（前右）、章梅芳
（前左，劉兵學生，北京科技大學副教授）和章梅
芳的學生馮訓婉（後左）、馬粹（後中）、包明明
（後右）“四世同堂”攝于北京許良英寓所
（劉兵提供）



2010 年8 月2 日胡大年（後排左起）、王作躍、
陳恒六、劉兵到導師許良英家裏向他祝賀90 大
壽；前右為師母王來棣（王作躍提供）



2010年8月2日武文生（後排左起）、胡大年、
王德祿、王作躍、陳恒六、劉兵和董麗麗在許良英
家裏向他祝壽（劉兵提供）



2010年8月2日王德祿、武文生、陳恒六、劉兵、
王作躍、胡大年等在北京蘇浙匯飯館為許良英先生
舉辦祝壽餐會，許先生孫女許蒙為爺爺切生日蛋糕
(王作躍攝、提供)

許良英：呼喚科學自由民主的大家

——祝賀科學思想史傑出學者

許良英教授九十華誕

施雅風

許良英教授，1920年5月3日出生於浙江臨海括蒼山麓一小村鎮，4歲喪父，子女5人均由母親撫養長大，良英5歲上小學，愛好讀書，由於經濟拮据，升學兩度很困難，高中進浙江大學代浙江省辦高級工業學校，受到良好教育。1937年秋，抗日戰爭初期，該校被浙江教育廳解散，許良英回老家，意外發現《萬有文庫》中若干介紹現代物理學的通俗讀物，特別精讀一年前購置的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書中許多關於人生和人類事務的精闢論述，使許良英深受啟迪，隨後又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哲學，也產生好感。

1. 投身革命，對老浙大民主學生運動有重要貢獻

1939年2月，許良英考進已遷至廣西宜山的浙江

大學物理系，我也在那年回浙大複學，重讀一年級。1940年浙大再次西遷至貴州遵義、湄潭辦學，在非常傑出的竺可楨校長領導下，倚靠一群勤奮、博學、高尚的好教授治校，立“求是”校訓，培養起追求真理、民主、樸實，為國家服務的好學風，學術空氣濃厚。除各系師生有定期報告討論會外，進步同學還組織有“黑白文藝社”，“質與能”自然科學社、“大家唱”歌詠隊、“鐵犁劇團”等。許良英在湄潭物理系，我在遵義史地系，本來很少有接觸機會。1942年初，倒孔（祥熙，行政院長，自私，貪汙）學生運動後，我結識了待人熱情誠懇、有見識、早於1938年入黨的呂東明同志，從呂處得知許良英為物理系高才生，為“質與能”社主角，為人正直，又有強烈政治要求。以後我得知，許良英以浙大助教身份，于1946年在重慶新華日報館解決了盼望多年的入黨問題。1947年，他在杭州浙大任地下黨支部書記，任內發展了不少黨員。是年，因學生自治會主席于子三被捕被殺害，由此而引發了全國性的反迫害爭自由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持續近5個月，得到竺可楨校長全力支持，取得完全勝利。年底，中共杭州工委成立，許良英任委員兼中學區委書記，開拓新工作，後又領導浙大總支工作，兼大專區委書記，日夜奔忙，多經風險，在黨內外有較高聲望。他曾借師生名義，熱忱為竺可楨校

長祝六十壽辰，借杭州工委名義致函杭州各界比較有名人士宣傳新民主主義政策，敦勸留在杭州，產生了較大影響。1949年5月，迎來杭州解放，許良英在新建的杭州青委機關負責全市學校黨務，繼又專任學生部長。1952年6月，他調北京中國科學院工作，負責編輯院刊《科學通報》，並審查公開出版書刊“有無政治問題”，旋被選為學術秘書處支部書記。

2. 撰著《科學和社會主義建設》，闡述百家爭鳴方針

我熟悉許良英就是那時開始。我是1947年才有推翻國民黨的政治要求，在南京秘密入黨，也於1952年夏天到北京，任務是陪同一位來華研究國家地理的蘇聯學者工作，出訪各地，與地理學者談話，我綜合成“沙依奇柯夫博士論地理學上的幾個基本問題”，通過許良英交《科學通報》發表。

1955年，許良英因曾在杭州介紹一位胡風親信方然入黨，受到懷疑和停職審查。儘管結論許良英是清白的，但此事使得許良英厭煩院部工作。他要求調入哲學研究所，從事科學哲學與科學思想史研究，得到批准。並在這段時間，他參加了以于光遠為首的自然辯證法研究規劃的編制和《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刊物的編輯出

版，心情愉快。他還和範岱年合作寫作《科學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一書，較深入闡述“百家爭鳴”方針，首次提到“實踐是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任何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必須遵守的原則”，點名批判艾思奇傳播李森科“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的謬論，於1957年4月出版。多年後美國科學院一學者（P. M. Perrolle）評介了此書中的許多論點，認為“對今天中國仍然非常中肯，”並請人譯成英文1982年在紐約出版。英譯本引言指出，“此書就兩個很重要問題提出強有力見解，使本書具有重大的現代意義，這兩個問題是：基礎研究對於科學技術目標的作用；作為科學發展一個先決條件的學術氣氛”。

3. 打成極右分子，編譯《愛因斯坦文集》

1957年《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開始了大家意想不到的反右派運動。許良英天真地認為社論失信於民，違反毛澤東原意，在哲學所發言駁斥社論，外傳他還撕毀那天社論報紙，於是就被定為中國科學院第一個右派並且是極右分子，要下放黑龍江密山農場勞動，每月發生活費29元。許良英認為自己革命十幾年，只因幾天錯誤，就被當成反革命，思想不通，又以自己有嚴重關節炎，經受不住東北冬季嚴寒，決定“自謀生路”回老家，掙勞動工分，養活自己和老母。愛人

王來棣受株連，被開除出黨。

許良英誠心改造自己，當了多年農民。1961年，摘了右派帽子，他出於對當代最偉大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的崇敬、熱愛，主動報名承擔《愛因斯坦文集》翻譯工作。“文革”動亂中，地下黨被懷疑有叛徒、特務。1968年，許良英被押到浙大審查批鬥，坐牢11個月，又被故鄉臨海縣城西區扣上“反革命總根子”罪名批鬥凌辱。許良英以死抗拒，喝農藥敵敵畏2小瓶，失去知覺。經衛生所醫生搶救，12小時後才蘇醒過來。

1972年，上海“四人幫”爪牙、革委會寫作組長朱永嘉派人騙取許良英翻譯的愛因斯坦文稿（以下稱愛稿），抹去許良英名字，以別人名義刊出征訂廣告。許良英趕到上海，嚴正交涉不成，乃請科學院竺可楨、吳有訓副院長，秦力生副秘書長以科學院名義向國務院申訴成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與北京商務印書館協議，上海內部出版，北京公開印行，並上報國家出版局。許良英得部分勝利，決定擴大譯稿為3卷本，約範岱年、趙中立、張宣三合作。1973年冬去北京，專為愛稿工作，商務提供他予支稿費50元/月。以後一段在京時間，許良英接觸很多老友，耳聞江青等人玩弄權術詭計的醜行，1974年後從多年的個人崇拜中解脫出來，認識有很大轉變。

1976年，中國經歷不平凡的變化。主要是4月，天

安門廣場廣大群眾激情悼念周恩來總理活動，許良英每天停留兩三小時。他深深感受這樣一條真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人民覺醒了。不久，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就擒，許良英非常高興，但中了風寒，咳嗽不止，在看到經過 14 個寒暑努力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樣書時，開始咯血，真可謂嘔心瀝血十餘載，喜摘碩果會有時。他隨後在結核病院治療 3 個月痊癒。第一卷樣書印行 25000 冊，不到半年就售罄，可見其受社會歡迎程度。

許良英的真才實學和刻苦鑽研精神早為科學界領導多人讚賞。1978 年，他回到科學院，安排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世界近現代科學史，1979 年 1 月右派問題得到改正平反，恢復黨籍。這段時間我亦在北京，與他有往來，為編輯《竺可楨文集》（1979，科學出版社），由我主要撰寫的《竺可楨生平與貢獻》一文初稿，請許良英和黃秉維先生修改，他倆均用心審改，增加內容，以後以編輯組名義發表。許良英又引用此文材料，加署我為合作者名列在前，撰“竺可楨傳略”一文（載 1980 年的《中國科技史料》第二期）。1981 年地學部委員會選舉我為地學部副主任，自此我又常來北京，經常能與他謀面。

4. 深刻愛國憂民，促進民主化

許良英有非常深刻的愛國憂民思想。開放改革基本

國策使我國經濟發展帶動現代化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1981年黨中央曾通過“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決議。1989年2月，我倆商討聯合一批學者給中央領導寫信，要求加快民主化步伐。信稿由許起草，我完全贊成，共同找了幾位科學家加入簽名。因我即回蘭州，所以信後來主要由許良英組織簽名。他請八十多歲的著名物理學家錢臨照、王淦昌領銜在信上簽名，共42人署名，多數是有成就的著名自然科學家。信是寫給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政協主席李先念、總理李鵬等的，建議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切實保證公民言論、出版和新聞自由，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的青年，盡可能增加教育和科研經費，提高知識份子的生活待遇等4項。科學家群體共同發表政見，在中國歷史上少見，在國內外產生巨大的影響。趙紫陽認為信內容沒有問題，指示科學院各級黨組織，不要找簽名者談話，以免他們感到壓力。3月18日，中央統戰部長閻明復約許良英夫婦、施雅風、呂東明吃飯談話，較充分聽取意見，許良英還交給閻明復一份1977年以來因言論被治罪16人名單。

但僅一個多月後，天安門前出現眾多大學生悼念胡耀邦集會，《人民日報》發社論稱學生運動為“有計劃的陰謀”與“動亂”，激怒了學生，以更大規模的遊行

要求收回社論。部分學生偏離理性，自5月13日開始絕食鬥爭，震撼全國，各地回應聲援。許良英深為憂慮，在知識界一次會上發言，認為要看到中國民主化是一個漫長過程，這次運動已取得相當勝利，不應要求過高，不值得絕食犧牲自己，他倡議緊急呼籲學生停止絕食，撤離廣場，回校以新形式促進民主進程，得到會上多數同意，但沒想到後來還是發生了六四事件。

5. 探源愛因斯坦奇跡年，闡釋民主人權思想

許良英在學術上有二大貢獻，一是主持編譯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收入410篇文章，1976-1979年，商務印書館）及《走近愛因斯坦》普及本（2005年遼寧教育出版社），使這位20世紀世界上最高聲望的科學家在中國廣為人知，產生巨大影響。許良英撰有“愛因斯坦奇跡年探源”一文，並編有愛因斯坦年譜，說明愛因斯坦中學生時，就思索空間、時間問題，研究磁場的以太狀態，但畢業後失業，雖然每年都有論文在高水準《物理學雜誌》發表。後在瑞士聯邦工業大學師範系學習物理，26歲於1905在瑞士專利局為技術員時，用業餘時間3-9月7個月內完成6篇論文，提出4項開創性科學發現。1905年由此被稱為愛因斯坦奇跡年。這個奇跡年一百周年後的2005年被定為世界物理年，德國就直

稱為愛因斯坦年。何以在短時間內愛因斯坦有如此驚人的創造？許良英認為原因有三：對自然界奧秘的驚奇和探索的執著和決心，敢於向舊傳統和權威挑戰的反叛精神，和最重要的是有深邃的哲學探索精神。

許良英的第二項貢獻就是對民主思想與實踐深入闡示。許良英自述：“雖然青年時投身于民主革命，向國民黨政府要民主，實際上根本不懂民主的真正意義。以為代表多數人民的共產黨掌了政權就民主了。經歷三次民族大災難後，70年代中期猛然醒悟，然後通過不斷的認真學習，總算搞清楚民主概念的內涵”。1993年許良英撰文綜述人權概念與民主理論：民主一詞起源於2500年前，古希臘雅典城邦，希臘文 *demokratia* 意思是人民的統治，即民主。許良英總結，古希臘至今行之有效的民主理論的基本內容：(1) 人人生而平等，每個公民都有不可侵犯和轉讓的權利，即人權。公民是國家的主人，不是任何權貴的臣民。(2) 主權在民，全體公民通過“多數決定”原則進行統治，但在任何情況下，處於少數地位的公民依然享有公民各項權利，不得被剝奪。(3) 這種統治只能通過公民自由贊同來建立，不可使用暴力或其他強迫手段。由此，通過定期的公民自由競爭和選舉，少數派可轉成多數派，多數派可成為少數派，一切取決於選民的意願。(4) 任何政府官吏和人民代表都是人民

的公僕，始終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政府首腦和人民代表都由公民選舉產生，並直接向選民負責，發現有不稱職的，可隨時按法定程式罷免。要實行民主，必須有如下各項保證條件：1) 公民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可發表不同的政治見解和對領導人的批評，而不受到迫害與報復。2) 嚴格實行法治，終止以人治和以權代法的歷史。3) 實行權力制衡，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防止絕對權力的出現，杜絕專制獨裁的可能性。4) 嚴禁軍隊幹預政治，軍隊只聽命於政府首腦，杜絕軍事政變的可能性。總之，民主是自由、人權、法治融為一體的，而人權又是民主的基礎和前提。正如法國“人權宣言”所指出，“對人權的無知、忽視或蔑視，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許良英已花 10 年以上時間對民主思想深入研究，要撰寫一本專著，最近聽說已近完成，希望能順利出版。

中國如何能走上民主化道路呢？中國長期在皇權專制思想控制下，由於封建權力思想的根深蒂固，要權力掌握者寬容地對待不同意見者，無論從上到下都不易做到。要改變這種狀態，許良英認為：“民主的實現，不可能指望自上而下恩賜，只能通過自下而上的奮鬥去爭取”。“中國民主化道路應該是理性的、和平的、非暴力的，爭取民主的道路，將是漫長而崎嶇，需要有韌性有遠見，

不可浮躁，急於求成”。“首先要有一批具有獨立思想和獨立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開展具有風險的民主思想啟蒙運動，要深切地感到民主啟蒙的艱難和緊迫，我們必須回到和發揚‘五四’精神，堅持以民主與科學治中國的決心，堅持任重而道遠的民主、人權思想啟蒙”。許良英一次又一次為祖國民主化突破各種阻力，忍受各種打擊，大聲疾呼，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外也有很高的聲譽。2008年4月，美國物理學會授予許良英以薩哈羅夫獎。

6. 三位恩師好友，譜寫情誼讚歌

許良英一生結交了許多好友，其中突出者3人。一是他恩師核子物理學家王淦昌院士。1942年，許良英大學畢業。王先生認為他治學誠實 (honest)，理解力強，有創造力 (creative power)，要留他為研究助手。但當時許良英急於找黨的關係而婉言辭謝後去桂林。1944年，桂林淪陷，許流浪于黔桂邊境。王先生在貴陽日報登廣告，招許良英回浙大。1945年初，許良英到湄潭任物理系助教。1974年夏秋，“文革”中江青發動“批林批孔”運動中，停發許良英原為編《愛因斯坦文集》予支稿費的每月50元，許良英的生活一度陷於絕境。王先生聞悉，主動致函給他，說以後化名“王京”，每月從四川寄來30元。當時王先生承擔原子彈氫彈絕密任務，居然要包許良英

這樣“老右派”的生活費，其甘擔風險，愛生如子的熱情，令人不勝欽佩。在王先生 80 壽辰時，許良英約集熟悉王先生的知友撰文祝賀，編印了一本精裝文集，其中有葉篤正院士感念王先生教他大氣電學的文章。

二是浙大心理學老教授陳立，工業心理學開創者，解放前曾公開講辯證唯物論與自然科學關係。1999 年許良英從一友人處得知陳立教授評反右運動對許良英政治結論是“缺乏政治道德的”，他即給陳先生寫信。後來，陳複以 4 頁長信，語重心長地說：“我讀你的信，真是心驚肉疼，你太天真，天真無邪，但又反映不懂事故，奈何！”許良英告訴陳先生，“我現在所做的不過是學習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那個說真話的小孩。我是台州人，台州曾養育出不怕‘滅十族’的方孝儒這樣硬骨頭，也鑄成我永不思悔改的‘花崗岩腦袋’，因為不懂世故會惹禍，許多人對我避而遠之，先生卻願意親近我，…實在是我一生的大幸”。在談治學問題時，陳先生說：“重要的還是人品問題”。從這一點，與許結交。2002 年，陳先生滿 100 歲，給許良英一封長信，提出一個科學研究指導思想的創見：“反對科學方法制度化”。提出“方法是為科學服務的，是科學決定方法，不是方法決定科學”，準備以此寫成論文。這時陳先生還指導 3 個研究生。不久，不慎摔跤，骨折，又引發心血管病，102 歲逝世。

三是社會科學家李慎之。李先生原在新華社外文部，與許良英同被定為“極右分子”。平反後曾任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美國研究所所長。1998年起與許良英以文章與通信交流思想，5年間通訊40多封，成為至交，相見恨晚。李先生家學淵源，對中國傳統文化素養很深。1999年8月信中說，他“悟出”了“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專制主義”。許良英寄李先生一篇《“89”十年感言》，李先生又寄許良英以《風雨蒼黃五十年》，這是一篇在知識界引起強烈震盪、令人拍案叫絕的傳世佳作。2003年初，李先生以10頁長信提出一個不同於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的論點，認為“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是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決定，”許表示贊成，可用一系列歷史事實支持他，李先生計畫寫一系列論文，可惜是年3月猝然病逝，留下無法彌補的遺憾。

施雅風：1942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史地系，中國著名地理學家、冰川學家，曾任中國科學院冰川凍土研究所（現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所長，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2011年2月13日逝世。

許良英先生九秩賀

方勵之

許良英先生九十歲了。我同許先生相交為友，至今也已三十六年。我在中國生活時，同許先生往來不少。但交往的內容卻相當簡單，大多圍繞兩件事：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愛因斯坦的物理及人生。

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是強弩之末。大學已招生上課，我教普通物理，一開始就說到伽利略、牛頓和愛因斯坦的時空觀念。¹然而，當時的文革輿論，對愛因斯坦大批判還沒有停。愛因斯坦的政治帽子是“本世紀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愛因斯坦的“小傳”被總結為一句話：“他一生三易國籍，四換主子，有奶便是娘，見錢就下跪”。²批判的主力是上海的“理科”（“李柯”）大批判組，它由一位學者兼黨棍牽頭。《文匯報》上有整版的“李

1 見文革複課後用的物理教材，後出版為《力學概論》（方勵之，李淑嫻，1986）

2 許良英，在美國科學協進會（AAAS）上的書面講話（1994），後以“愛因斯坦的民主人權思想對中國的影響”發表在《北京之春》1995年2月號上。

柯”批判文章。幸虧愛因斯坦死得早，不然，按當時的氣勢，可能會被押到上海，戴上“最大反動權威”紙高帽遊街，因為愛因斯坦於1922年到過上海，要消毒。

北京的學者大都不買上海大批判的賬。輕視他們，就如愛因斯坦說的“一個人能夠洋洋得意地隨著軍樂隊在四列縱隊裏行進，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我輕視他”。³廣義相對論的引力波的研究，在北京已展開。我和我的科技大學同事在合肥，也開展了宇宙學研究，儘管不時有“洋洋得意的軍樂隊”騷擾。

許良英先生則在系統地編譯愛因斯坦的文獻，物理學的，哲學的，社會政治思想的，都有。我早知道許先生也是物理同行，也在中國科學院工作。但一直沒有機會碰過面，不認識。一則因為許先生長我十六歲，朋友圈子不相交。又因許先生於1957成為右派後，失去科學院工作，回浙江老家務農，離開了學術圈子。

我和許先生的相識是通過一個字。一天，我的科技大學同事解俊民教授問我，binary 應當如何譯？他說這是許良英先生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譯稿上看到

3 Albert Einstein, *Ideas and Opinions*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54), p. 10.

的，原譯為“雙譜線”。我想，如果是愛因斯坦文章中的 binary，一定是指“雙星”。一查原文，果然不錯。用雙星光譜的時間變化可以證明，不同顏色的光在宇宙空間中的傳播速度一樣。它是支持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的一個有名的觀測。應當提到，這項觀測是前北京天文臺台長程茂蘭先生（1905-1978）在法國里昂天文臺任職期間做的。⁴ 後來，我寫信告訴許良英先生“binary”的譯法。許先生說他接到信時非常高興，就寫信邀請我去見他。

此後，凡我有機會去北京，就會去看望許先生。他那時還沒有恢復科學院的職務，正式的身分仍是一個“回浙江老家務農”者。他一個人住在位於八面槽的商務印書館。他有一間不太小的辦公室，堆滿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用的資料。許先生的編譯愛氏文獻，始於 1962 年，即他還在浙江務農種田期間。我在八面槽，看到《愛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三卷共收有愛氏的論文、講詞、談話及書信等 410 篇，130 萬字。許先生如何為中文版的愛氏三卷文集工作的，我是一個目擊者。直到 1978 年他才複職，到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近現代科學史研究室工作。

4 Tcheng Mao-Lin, *Annales d'Astrophysique*, 4 (1941) pp. 97-117.

《愛因斯坦文集》很成功，不僅一掃上海大批判為愛氏戴的紙帽子，而且成為一時之啟蒙。它對 70 年代末的“平反”“改正”也有推力。⁵

1978 年秋，中發 55 號文件，即為 1957 年的“右派分子”改正文件，尚未正式發表，但已經在知識份子中開始流傳。按此文件，因“右派”和“右派言論”而被開除中共黨籍的人，都將自動恢復黨籍，再度成為中共黨員。

10 月初，在桂林召開“微觀物理學思想史討論會”。內容是討論物理學哲學。在桂林的三天會議中，“微觀物理學思想史”並不是中心話題。會議組織的溶洞蘆笛岩遊，也有許多人不去，因為地洞或山洞只能引起對黑暗的歲月的回憶。討論會的實質熱門話題是 55 號文件。

與會者中不少是“右派分子”或“漏網右派”。其中不少人同我類似，不再認為中國共產黨代表社會的先進力量，也不再認為馬克思主義值得作為人生信仰。問題是，要不要接受按 55 號文件恢復的黨籍？這成了桂林會議的會外會的一個中心議題。

有人準備無條件地接受恢復黨籍。

5 許良英，在美國科學協進會（AAAS）上的書面講話（1994）。

有人不贊成。認為應當“接受恢復黨籍，入黨以改造黨。”

我記得，許良英先生也屬後者。

後來的發展證明，“入黨以改造黨”，在中國不通，或還未通。但對比戰後共產國際所屬各共產黨的結局和結局的方式，就會有對“入黨以改造黨”的歷史應驗概率，有一個結論。

八十年代的自由化大潮時，許先生的故事就更多了。只講一個“秘密”。1985年底，我幾乎第二次被開除黨籍，安徽省委已向我暗示了，只等中央紀委書記王鶴壽來合肥正式公開宣佈。最主要的自由化罪行是我在浙江大學的一次演講。“內幕”如下。

1985年，是愛因斯坦逝世三十周年。是年三月在浙江大學舉辦學術討論會，由中國科技史學會物理學史分會和中國物理學會引力與相對論天體物理分會共同主辦。許先生是“老浙江”，辦會很容易。我也被邀作學術報告。會外，浙江大學學生邀我講講“開放改革”。後來，該演講被科大研究生印成小冊子，散發全國。被中共中央黨校發現，呈報中央。終於事發，紀委決定開除方的黨籍。由於胡耀邦的作用，推遲了一年。到1987年我終於被開除黨籍時，該小冊子仍是罪行之一。所以，該演講可在中共中央1987年一號文件的附件中

看到。

“秘密”是，浙大“開放改革”演講中的許多觀點是許先生的。而且，當時浙大學生和研究生是要請他們的老學長許先生講，並未找我。而是許先生要我去講。原因之一是，哪怕在浙江，許先生的浙江話也有許多學生聽不懂。而我說的是播音員標準的普通話，下里巴人。所以，我被開除黨籍後，許先生有一點不服氣，為什麼不同時開除他？中央也不調查，方勵之浙大報告的“黑手”，不折不扣的“黑手”，是許良英。

許先生的其他故事。留待他 95 歲，100 歲時續寫。

本文的目的是祝壽。至此，還沒有寫一句頌讚語，謹借如下兩句為許良英先生九秩賀：

贊天地之無窮兮，頌人生之長勤。

方勵之：1956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天體物理學家和當代中國民主和人權宣導者，曾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和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物理學教授，2012 年 4 月 6 日逝世。

良師益友、嚴師諍友

——略記與許良英老師交往片斷

吳洵高

我是 1943 年秋在桂林與許良英先生相識的。當時我因不滿現狀，思想異端，高三時被學校除名，無處安身，在憂鬱彷徨之際，經另一老師介紹與許先生通信認識，當時他正在另一中學任教。1942 年他大學一畢業，就毅然放棄留校工作的難逢機遇，不惜長途跋涉到桂林，一心想尋找地下黨的組織關係，獻身革命。我已記不起來與他通信次數和內容，不外向他傾訴我的遭遇和對時局的不滿；現在唯一有印象的是：當時我年輕幼稚，好高騖遠，竟東拼西摘，寫了一篇關於物理學量子論方面的文章，寄給他指教，如今回想仍感汗顏。然而許先生並沒有哂笑我的膚淺幼稚，而是認真修改指正；每次寫信，他也都一一回復。然而在桂林始終未見一面。1944 年，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桂林淪陷，就完全失去聯繫，不知其下落。

1945 年我考上浙江大學。抗日時浙大遷貴州遵義，

而一年級分部則在距遵義百餘裏更偏僻小鎮——永興，窮鄉僻壤，舉目無親。開學不幾天，我正在食堂用餐，忽然有位陌生的老師，直呼名字尋我，我一時驚愕茫然，原來他就是心儀已久的許良英先生，孰料竟在這裏邂逅相遇，此情此景至今仍歷歷在目。

自此，可以說我人生的軌跡，如同幾何曲線上出現拐點：上下起伏，順逆進退，以至榮辱休咎無不與之關聯，幾影響我的一生。

通過許先生又結識了與他情同手足的周志成先生，他倆當時都是物理系的助教，都是核子物理學家、後來的“兩彈”元勳王淦昌的得意門生，桂林失陷後兩人下落不明，王先生還特在貴州報紙上刊登尋人啟事，召他們迅速回校。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正是抗日戰爭又是國內戰爭，極其動盪年代，中國人民正處在水深火熱中。他倆都憎惡蔣介石專制獨裁統治，懷著一顆熾熱的心，把拯救人民苦難放在首位。我的記憶裏當年許先生就十分欣賞魯迅的那句名言，要肩扛起沉重黑暗的閘門，放苦難人們出去。他還很欣賞普羅米修士，為人類上天竊取火種，由此甘受天帝懲罰：每日寧遭剖腹鷹啄肝臟痛苦的犧牲精神。

許周兩先生雖有相同的理念和志趣，然而性格又略有差異：一“剛”一“柔”，剛柔相濟，也相得益彰。

周志成性格外向，為人開朗、熱情、隨和，總是眯眯笑容，有時還會忘卻自己已是教師身份，和同學一樣，引吭高歌：“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而許良英，似屬性格內向，持重沉著，他當時喜歡吹口哨，常輕輕地吹出《黃河大合唱》、《馬賽曲》、《國際歌》等，來宣洩內心情緒。他不隨和，不模稜兩可，眼裏容不得一點砂塵。雖說人不可貌相，但也有說“貌如其人的”。在我的眼裏：周先生如同楊柳青年畫裏的人象，線條柔和，笑口常開，和藹可親。而許先生，則如木刻板畫中人物肖像，線條遒勁清晰，力透紙背；沒有過渡色，而是黑白分明。最近一次和他見面，是2000年秋，當時他除了頭髮花白，額角幾道紋路更深一些外，模樣幾乎與他六十幾年前一樣，面龐清臍有神。人們初次與他接觸，有時未免會有點拘謹，然而沒多久，就會感到他坦誠，胸無城府，外鋼內柔，極富同情心，特別是對弱小群體，被迫害的人，尤其是被政治迫害青年人，至今仍然如此。

※※※

許先生在桂林雖沒有找到地下黨的組織關係，他是一個革命理想主義者，會自覺地以所謂“布爾什維克”標準律已，這種精神又源於他的理性。

從大學開始，他一邊攻讀物理，一邊迷戀於馬克思

主義學說。抗戰時，沒有電燈，夜間只能靠承傳兩千年來不變的植物油燈照明，馬列主義書當時屬禁書，挑燈夜讀，他幾乎把當時在學校中秘密流傳搜羅到的馬列書籍讀遍。就和攻讀物理學一樣，不一知半解，而是窮源溯流，非弄清楚不可。他曾經提及當時“悟道”的最後境界：就是生死問題，說他經過十數天的日夜深思熟慮，思想鬥爭，終於下定決心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這一理念，並要象布魯諾一樣為真理，不惜奉獻自己的生命。真有點像“禪宗”的參禪，“大徹大悟”，不同于一般世俗信徒，信教只是求今世來生。“心有靈山”，自然即使沒有找到組織關係，仍以一個他心目中理想的、甚至可能頗為浪漫的革命者嚴格要求自己。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反專制獨裁爭民主成為勢不可擋的潮流。12月1日在昆明3名學生被國民黨殺害，引起全國反內戰爭民主的浪潮。永興雖地處偏僻，然消息傳來，仍群情激昂，集會申討，通過發表抗議宣言申援昆明同學。此時校內國民黨、三青團分子，見眾怒難犯，一反過去那種公開對抗破壞的手法，利用新同學間相互陌生，竟自告奮勇主動請纓起草“申援宣言”。文稿出來，文言文體，滿篇“嗚乎哀哉”“之乎者也”陳詞濫調，不知所云，當為大家否決，推人重新起稿。許良英、周志成身為教師，不便公開露面，實際上

他們一直關心這一鬥爭，通過一些進步同學指導這一鬥爭。新《宣言》就出自許周之手，這是一篇討蔣的檄文。這是我第一次接觸並知道許良英參與指導學生運動的經歷。此後，凡浙大歷次學生民主運動無不有他的身影。發生在 1947 年底、全國性反迫害“于子三運動”，震源就在浙大，它震驚中外，使得蔣介石不得不幾番出面“垂詢”，幹預滅火。許良英就是這場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42 年許良英在桂林並沒有找到地下黨關係，1946 年夏，他甘冒風險乾脆直奔重慶，到當時還允許公開存在的中共《新華日報》社，申請入黨，幾經周折，終於如願以償。嗣後浙大地下黨的建立，浙大民主學生運動持續蓬勃發展，都與他有密切關聯。此後他還歷任浙大地下黨支委、支書、總支書記，中共杭州市地下黨青委、學委，也可以說是“職業革命家”了，遠離他少年時立志要成為象愛因斯坦一樣的科學家的夢想。

※※※

1949 年蔣介石獨裁政權終因民心喪盡，敗退臺灣，政權更迭，以實現建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為號召的共產黨成為執政黨。許良英離校任共青團（當時稱“青年團”）杭州市委委員、學生部長，直到 1952 年調至北京中國科學院工作，也可稱謂當時的不因循守舊的“團派”幹

部。當時我也離校到共青團工作，與他經常見面。從此，就再不是師生關係尊稱他“許先生”了，而是以“同志”相稱。“同志”，“同志”，人人都稱“同志”，不分職務大小，不論級別高低，大家“平等”，當時確是一種新氣象。然而細究起來也並不儘然：比如打天下坐江山，就得論資排輩；伙食要分大中小灶；還有看文件聽報告，今天稱之為“知情權”，是一種政治待遇，又得看是那一級別，等等。對此若稍有微詞，輕則為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思想，要深挖思想根源，重則自當別論。

在共青團工作，除少數幾個年歲較大一點，革命資歷稍多一點，級別稍高一點，官架子頗大一點的領導外，全是青年，“學生部”尤其如此，許先生與他們相處也甚融洽。

1952年，經過思想改造運動，已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校長，生怕科學院出版物出現所謂“政治思想錯誤”，指名調他晉京“政治把關”。但不久他又把這個差使另交他人，1953年任《科學通報》編輯室主任。《科學通報》雖大多登載一些科學成果、論文，但它同時也是科學院的喉舌、視窗，是科學院發表一些政策性、方針性的機關刊物。需要有像他這樣既有馬列主義水準，又有科學基礎人把關。

1953年底，我也隨之調至科學院編譯局工作，與

許先生雖不在一個單位，但同一支部。機關工作，究竟不同於共青團工作，相處的就不再是純青年人，難免有一些人際間頗為複雜的關係。但他仍是書生氣十足，還是一個理想主義的革命家，既嚴格要求自己，也苛求別人。當時什麼整風、生活會之類名目又多，他又是兼職支書，因此特別對有些歲數稍大一點的黨員，雖無整人之心，提意見卻不留情面，如今看來，就是“左”了一些。然而他對科學家、老知識份子，如同在學校時一樣，視之為師長，甚為尊敬。當時他甚欣賞列寧的那句話：科學家同樣可以通過對本門學科的研究實踐達到共產主義。今天對列寧自另有評價，但比起斯大林（史達林）、毛澤東敵視知識份子，列寧似高出一籌。許先生對當時科學院東北分院黨的一把手指手劃腳幹預科學家，甚不以為然。他對當時蘇聯科學院那套把科學研究生搬硬套，處處貼上馬列主義標籤，特別是對李森科的偽科學，對給摩爾根學派動輒戴帽子、打棍子的粗暴行為嗤之以鼻。

1955年禍從天降，毛澤東親自一手炮製的全國最大的冤假錯案之一——“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竟連累到他，還是“欽犯”，在毛澤東那裏掛上號的。“停職檢查”！接受批鬥審查，終於“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他與胡風集團根本沒有關係。折騰了幾個月，又“因禍得福”，換環境，離開《科學通報》，他選擇了到哲學研

究所，從事研究科學哲學和科學思想史，既有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又與自然科學密切關聯，正合他的心意。當時他家住東城區，哲學所在西郊中關村，相距數十里，來往奔波，也甘於此。自然辯法研究一些討論會，還吸收我參加。

※※※

俗話說“禍不單行，福無雙全”，許先生在哲學所工作好日子沒過多久，“反右派”運動來了，這一回他所遭受的災難，恐非常人所能承受。

一黨專政，輿論一律，沒有民主，沒有監督，必定百病叢生。年年整風，年年依舊。1957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下力氣整風，毛澤東親自出馬號召黨外人士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人民日報》還辟專欄報導黨外人士鳴放幫助整黨，真以為“春天”來了。6月初《人民日報》突然發表《這是為什麼》社論，接著刊登批鬥民主黨派頭面人物巨幅報導。原來號召鳴放，“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全是假的。

許良英按捺不住，跳了出來，反對《人民日報》社論，認為這是執政黨言而無信，公然到處反對反右鬥爭，還天真地認為是有人反對鳴放政策。他那裏知道，正是毛澤東決定“收網”了。後來毛澤東還不無得意地說鳴

放是“引蛇出洞”，是“陽謀”不是“陰謀”。這真是政治上的墮落。

“反右”各單位都要按人頭比例湊出幾個“右派分子”批鬥。許良英可謂自投羅網。毛澤東還說黨內右派分子比黨外更危險。許良英更是在風口浪尖上了。8月間，科學院召開全院最大的批鬥大會，他的友人、門生故舊都是點名要起來揭發批判，我當然是首當其衝。但我遵守了一條做人的基本底線：那就是上綱上線在所難免，但絕不無中生有，落井下石。

翌日，《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刊登批鬥許良英的新聞報導，作為首批開展對黨內“右派”鬥爭的典型。

凡劃右派的一律是敵我矛盾。全國劃右派有50來萬（也有說遠不止此數，上百萬。如加上內控不公佈戴帽的，就更多。）許良英被劃極右分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發配到北大荒。而他堅決要求回臨海老家，自食其力，居然恩准了。當時許先生還有兩個年幼的兒子，只有靠其夫人含辛茹苦扶養了。

毛澤東喜用古人那套格言，什麼“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統統不過陳腔濫調而已。

許良英離京返鄉前一夕，我噙淚向他告別，但他仍鎮定自若，面無戚容，如同即將出差似的。

第二天上午，單位的黨委書記郭佩珊等就找我，厲聲責問昨晚你去哪里了？我知道他們已知我的行蹤，我當實告。他們還當場揭露我那天那日還去過幾次，為什麼不向組織報告。看來比國民黨特務還厲害。不久我也被開除黨籍，發配到“大躍進”的重災區甘肅，當時就流傳一句“寧可到天（津）涯海（上海）角，也不到新（疆）西（藏）蘭（蘭州）。”明成祖的“瓜蔓抄”，傳至清康乾盛世，相繼五百年又傳至毛澤東，一人得罪禍及九族，累及門生故舊，牽連的不止我一人了。

這樣我與許先生一別就是二十幾年。

※※※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垮臺。當月10日胡耀邦就提出著名的治國三策，其一就是“冤案一理，人心大順”。在胡耀邦主持下，1978年全國五十幾萬劃為右派分子的得到平反昭雪。許良英雖在1978年6月，回北京到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工作，但其“右派”直到1979年1月才得到“更正”。

許先生二十幾年來在臨海受盡折磨，甚至在一次批鬥會上，他不惜以生命捍衛自己的尊嚴。在農村繁重的體力勞動中，以驚人的毅力翻譯編纂了上百萬字的《愛因斯坦文集》。正如許先生講的：“愛因斯坦是牛頓之後

最偉大的科學家，同時又是一位具有深邃洞察力和獨立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一個關心人類命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真正意義上的人”。我想，許先生所以能度過那一段最艱難、最黑暗的歲月，也正是當時他通過編譯愛因斯坦著作中，深深被愛因斯坦人格魅力所吸引，被愛因斯坦精神所鼓舞。

撥亂反正後，許先生的事蹟在科學界、文教界引起巨大反響。原復旦大學校長、著名數學家蘇步青就把許先生的事蹟廣為傳播，特別是對那些曾受政治迫害的知識份子，勉勵以為榜樣。

然而，當時掌握思想意識大權的胡喬木、鄧力群等，他們感興趣的“榜樣”是那位“兩耳不聞窗外事”書呆子式的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陳某某，大肆宣傳報導，甚至把他的一些違背生活常識和最起碼人際關係也作為奇聞逸趣予以渲染。其目的無非把科學家仍當作黨的馴服工具，把科學仍淪為為政治服務的奴婢。1942年正是胡喬木代毛澤東寫了那篇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文藝要為政治服務，順理成章，今天科學要為政治服務，就毫不為奇。

※※※

1980年冬天，我出差北京，日裏辦事，趁傍晚空閒到東廠胡同許先生原居拜訪，事先也未打招呼。算來

相隔整整 23 年了，正是 1957 年與他揮淚相別的地方，還是那套四合院裏那間陰暗的廂房。我屏氣敲敲門，出來開門的正是許先生，他見了我十分驚喜，“哦”一聲，直呼我的名字，並大聲呼喊他的夫人王來棣，說我來了。真是“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真可謂劫後重逢，“相對如夢寐”。談了一會，他就邀請我上東四一館子店吃晚飯，點了不少菜，當時還是用糧票實行定量供應的年代，難得有此豐盛的晚餐。

據我所知許先生上館子請客吃飯，極為罕見，這次可能破格了。許先生很儉樸，平時從不上館子，偶爾因公外出午餐，也只是到附近小飯店，叫一碗與南方陽春麵類似的燴餅炒餅，外加一碗免費的“高湯”，真是“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1987 年春我曾為編寫一書稿，在許先生中關村新居住了一個來月，有時見親朋好友來訪，留吃中飯，許先生或夫人親自下廚，不過煮一碗卦面，面裏余一隻雞蛋，招待而已，晚飯則由鐘點工，燒幾碗家常菜。當年許先生仍穿一件只有農村中仍見到深藍色“的卡”中山裝，他夫人嫌土氣，指著穿夾克衫的我，對他說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許先生也不吭聲，只是抿著嘴笑。但確也從善如流，第二年秋我又一次去北京，他已換上了夾克衫。

寫到這裏，不能不引用他譯的愛因斯坦的一段話。

愛因斯坦說：“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依靠別人的勞動，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著的東西。我強烈地嚮往儉樸的生活，並且時常為發覺自己佔用了同胞的過多的勞動而難以承受。”

還說，“我從來不把安逸和享受看作是生活的本身。——這種倫理基礎，我叫它豬圈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並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是美和真。……人們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標——財產、虛榮、奢侈的生活——我總覺得都是可鄙的。”

這不也是許先生的真實寫照嗎？

許先生生活簡樸，1945年任浙大物理系助教，他的薪金除維持個人最基本、最低的生活費用外，還資助一些貧困學生上學，我也是其中之一。而他把主要收入部分，幾乎全部奉獻給當時他追求的理想革命事業，從來未想過有所回報。

1952年奉調北京，供給制改為薪金制。他的最大嗜好就是——書！收入的大部分，也用在這方面。以己度人，我幾次上北京，他送給我的禮品不是什麼土特產，而是書。使我幾次從北京回來，得拎一口袋沉重的書。

1980年冬這一次在北京與許先生在短暫會面中，

給我印象較深的是他提到當年中共中央書記處胡耀邦等立志改革，別開生面開設“科學技術講座”，由錢三強擔任第一講：《科學技術發展簡史》，講稿是由他和李佩珊執筆的。他把這一講一本小冊子送給我。翻開一看，赫然重新又提出幾乎被遺忘多年“民主・科學”這面“五四”大旗！歷來官方紀念“五四”偏重於所謂“五四”愛國精神。而從來“愛國”與“忠君”是捆綁在一起的：“忠君愛國”。愛國詩人屈原吟道“荃不察餘之中情兮”，皇上呀您怎麼不考察我對您一片忠心呀？憤而投江。這種“忠君愛國”就連綿兩千來年，1911年辛亥鼎革把皇帝給廢了，然而蔣介石又翻新創造了一個“黨國”，愛國必須先愛黨，愛黨必須忠於黨的領袖。毛澤東接過這個法寶，又連綿不絕，文革的“三忠於”達到頂峰，“忠君愛國”始終沒有絕種！許先生重提“五四”的“民主・科學”，當自有其寓意。

※※※

歷史不會完全重複，但歷史有時會極相似。中國數千年的歷史，總是明君少，庸君、昏君、暴君（有的還錯當為明君）多；在為數不少的朝代，總有幾個朝代會出現短暫的所謂“中興”。1976年至1989年在胡耀邦、

趙紫陽主政時期，一改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夜郎自大、閉關自守，而是改革開放，一時全國勃勃生機，一派欣欣向榮。

2007年9月23日，胡績偉老先生在回顧這段歷史，給許先生的一封信中首先提出“胡趙十年新政”。許先生接信後，十分高興，回信中說胡老的信“太重要了。提出‘胡趙十年新政’概念，對中國的近代史研究就是一個重要貢獻”。並提出“研究、宣傳這十年輝煌，應該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任務，它將推動批毛，批鄧，結束一黨專政的進程”。並且提議由胡績偉先寫一篇提綱性文章，來推動大家思考，撰文。而許先生自己則表示：“我作為一個與國家、民族共同命運的知識份子，一個受益者和見證人，當然必會盡自己一分力量，盡可能出力”。許先生與人交往中一直把胡績偉的這一觀點廣為傳播。

在給胡老的這封信中，他以史家筆法，對十年新政中胡耀邦、趙紫陽、鄧小平三人作了“太史公”式的評語，供胡老思考。

對胡耀邦，他認為：“耀邦是思想解放運動的引導者，改革開放的首創者和最堅定的實行者。他對毛澤東遺毒的撥亂反正，徹底平反冤假錯案，堅決抵制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所體現的大智大勇，確如1989年廣大學

生稱譽的，他是‘中國魂’”。

對趙紫陽，他認為“經濟上改革開放，他當立首功”。在指出其不足之處後，充分肯定和熱情讚揚趙在 1989 民主運動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是“六四”，“同情學生，堅決抵制鄧小平的軍事鎮壓，不認錯，不檢討，終生無悔，成為驚天地泣鬼神的民族英雄”。

對鄧小平，他認為在十年新政中“充其量只能放在第三位”。他說雖然鄧曾支持胡趙的創新，但後來揮舞“四項基本原則”大棒，許先生說這不過毛澤東“反右”六條標準的翻版而已。鄧小平每隔一年搞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或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並開創了史無前例的兩年罷黜兩位總書記和對數以百計和平學生進行血腥大屠殺的獸行”。許先生不無憤慨地說：“這樣的人竟被稱為‘總設計師’，真是歷史的悲哀，人性的墮落”。

然而，當時曾提出“民主社會主義”名噪一時的謝某，還有一書竄紅的辛某某，竟罔顧事實，把胡趙十年新政，納入到所謂“鄧小平思想”體系，把胡趙說成只是鄧小平的助手而已。是胡績偉首先創新提出“胡趙十年新政”這一重大概念，想不到如同搶注商標似的，辛某隨後提出所謂“胡溫新政”，然而上面看來並不領情，國慶 60 周年，官方依次抬出毛鄧江胡四尊

大象，脈絡分明，鄧江胡才是毛的正宗傳人，祖宗之法不變，何來“新政”？胡耀邦破“兩個凡是”，主持“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討論，才能出“新政”，他人何能與之相頡頏？

※※※

許先生治學實事求是，崇尚理性，不盲從，不附會。前幾年理論思想界曾熱鬧一時，討論“民主社會主義”問題。有人還煞有介事說是列寧修正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晚年已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宣導“民主社會主義”。當然其中不少人是希冀當局在民主自由方面寬鬆一些，但不排除某些人，不惜偽造“遺詔”，別有意圖。

許先生對友人說，他在農村通讀了 39 卷《馬恩全集》，對馬恩思想有一個比較全面的瞭解。他說馬恩對民主社會主義的態度，最能說明問題的是 1875 年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和同年恩格斯給倍倍爾的信，兩者都否定民主社會主義。並對當時所謂的人民權利、普選、自由等作了嘲諷和批判，直到馬克思去世，並沒有改變他的論點。

當然，我想，馬克思是在 19 世紀，根據當時情況作出的判斷，今天也無需為之掩飾、修改，甚至憑空捏造。

許先生在大二（1938 年）就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即使後來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開除黨籍的艱難歲月，仍沒有動搖過對它的信仰。

然而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一個研究自然科學史的工作者，一個理論工作者，不能無視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等暴政，以及鄧小平主張的要一個人說了算的所謂強人政治，可以隨意罷黜胡耀邦、趙紫陽，他們的理論基礎就是馬克思主義核心“無產階級專政”。正如他與友人張宣三通信中說的，他是 1987 年徹底拋棄已信奉了 47 年的馬克思主義。在 1988 年 11 月在“全國現代化理論討論會”上，許先生驚世駭俗公然提出“馬克思的最大錯誤是主張專政，反對民主，是逆人類文明歷史潮流”。

1987 年，相隔八年，我再次來到北京，許先生就對我說：怎麼能把整個人類歷史單單歸結為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也不合事實。階級鬥爭必然導致專政；而專政又必然導致少數人專制獨裁。這方面，有時自然科學家反而會比一些社會科學家、一些號稱理論權威說得更透徹、更精練、言簡意賅。這就是許先生推崇的愛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強迫的專制制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這是一條千古不易的規律。”

這簡直同愛因斯坦有名的 $E=mc^2$ 一樣簡練。文革中自比秦皇的“天才的暴君”，不正是要傳位那些品質低下的王洪文之流一班無賴來繼承嗎？

當年我在北京，許先生、王來棣兩人已著手對民主這一課題進行研究。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譏諷有些人“言必希臘”，而許先生他們就是從希臘著手進行對民主的探討。

在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問題上，有人甚至牽強附會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聯合政府也扯進去。許先生認為當時毛是處在野地位，只是一種宣傳而已，從沒有認真實行過。正如他把自由主義定性為“政治上的腐化”，“嚴重的惡劣傾向”一樣，而面對外國記者卻高唱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能信嗎？

有人把 1949 年幾個黨外頭面人物安排在副主席、副總理、部長職位，認為這就是聯合政府。而事實上都是有職無權，毛澤東一語道破“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宋慶齡數次請求辭去有名無實國家副主席一職，遭拒絕，也只有她才敢這樣做！

※※※

“民主社會主義”的討論，並沒能繼續下去，就被叫停了。理論界似頗不甘寂寞，才叫停了這個，又冒出

了另一個——“普世價值”的爭論。

許先生也甚關心這一爭論。爭論不外分兩派：一派肯定，一派否定。否定派認為民主、平等、自由等等普世價值，是西方的，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別有用心，不可接受。據許先生當時從網上下載 55 篇文章中，“對普世價值持否定態度的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家，它充分地表現了當今人民的覺醒”。

“否定派”眾口一詞就是西方的，資產階級的，不可接受。而“肯定派”，在解釋“普世價值”，就眾說紛壇，有灑灑萬言仍不知所云。許先生認為“普世價值”，首先要弄清“價值”一詞的含義。根據在編譯《愛因斯坦文集》得到啟示，許先生說“價值”一詞在西方文化中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涵義。“價值”一詞譯自英文 value，它除了大家熟悉的意義“效用”（worth）之外，還有一個為當前一些人陌生涵義，就是：“社會倫理、道德準則（standards）”，它還常用複數（values）。愛因斯坦著作中就出現這一詞。許先生說“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s），是指全人類都遵守的倫理道德準則，它與有適用價值的措施行動無關。”

這個解釋，簡潔明瞭，省去許多口舌、筆墨。

依我看，許先生之所以關心這一爭論，是因為人與人之間關係並非只是階級、階級鬥爭的關係。許先生熱

情讚揚溫家寶總理 2007 年 2 月 26 日一次講話。在講話中提到民主、自由、人權等“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許先生說：“這是中國歷史上繼孫中山之後第一位以國家領導人身份對普世價值的肯定。”如果按官方的界定，溫家寶等是屬於第三代接班人，那麼許先生對第二代接班人中那位為鄧小平親自挑選的接班人反對普世價值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這位大人物觀點，如同文革中上海寫作班子一樣，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歪曲為哲學上“相對主義”。這位大人物說：“愛因斯坦先生在自然科學領域中所作出的相對論，我相信也可用於政治領域。民主和人權也是相對的概念，而且不是絕對的和普遍的。”許先生說這位大人物犯了雙重錯誤：首先是科學上的錯誤，他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並不是說什麼都是相對的。作為它的邏輯基礎‘相對性原理’是說：自然規律對於不同的運動狀態都是一樣的，也就是不變的，絕對的。因此，相對論實際上是絕對論，它揭示了自然規律不因運動狀態的變化而變化的絕對性。”其次，至於那位大人物稱之民主和人權概念，許先生說“這是人際關係中普遍人性的體現，不分民族、階級，不分東方、西方，都是一樣的，因此也是絕對的，普適的。”許先生這篇《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有幸在《炎黃春秋》

“一家言”欄目中刊出。

許先生還有一篇題為《民主是普世價值辨析》一文，是針對吳江否認民主的普世價值的《慎言“民主的普世價值”》一文的，就沒有這麼幸運能刊出。

21 世紀的頭十年，似乎有點點像 20 世紀初葉的清末民初，但那時思想理論界更活躍，終於出現一批如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陳獨秀、胡適、魯迅等等頂尖人物，那時大概沒有一個像“中宣部”這樣專門掌控意識形態大權的衙門，那時的“老佛爺”“大總統”似乎不像後來毛澤東這樣的一把手，事事親躬，既抓槍桿子，還得抓筆桿子，終於“我花開來百花殘”，21 世紀初十年，和 20 世紀初葉就不能相提並論了。

※※※

前幾年，有幸拜讀了傅國湧先生編著的《脊樑》一書，其中有一篇題為《愛因斯坦的影子：許良英的道路》一文，寫得很好。文中還把許先生身上體現出愛因斯坦精神和魯迅的精神融合在一起，說“許先生也和魯迅一樣對現實有著一針見血的深刻洞察力”。

的確，愛因斯坦是自然科學家，魯迅是文學家，然而他們關愛人類，反對專制暴政的精神是一致的。這裏不妨舉一個例子：比如愛因斯坦在 1930 年《我的世界觀》

有一段對以“愛國主義名義下胡鬧”的軍訓制度進行抨擊：“一個人能夠洋洋得意地隨著軍樂在四列縱隊裏行進，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對他輕視，他所以長了一個大腦，只是出於誤會：單單一根脊髓就可以滿足他的全部需要了。”其文筆又與魯迅雜文何其相似乃爾。

而魯迅 1925 年，寫了一篇《春末閒談》，從《詩經》“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的細腰蜂談起，說統治者恨不得有這麼一根如細腰蜂的毒刺，刺入被統治者的中樞神經，既活著又沒頭腦，還能給統治者提供服務。魯迅說：“甚至即使砍去了藏著的思想中樞的腦袋而還能動作——服役”和成為“戰爭的工具”，更好了，和愛因斯坦說的又何其相似乃爾。

這種沒頭腦的活工具，也大概和曾一時宣揚的“螺絲釘”精神差不多吧！

《脊樑》一書的書名，自然也是取於魯迅的一篇雜文，這篇雜文提出誰是中國真正的脊樑。在許先生的身上，既有愛因斯坦的影子，同時也應有魯迅的影子，兩者都是相近的。

許先生和魯迅一樣，敢於正視，敢想，敢說，敢做，敢當；和魯迅一樣，“橫眉冷對千夫指”，對正人君子總要剝掉他們的華裘；和魯迅一樣，針砭時政一針見血，善於反思，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他人留情，等等。這裏

特別要提及的，是他和年青人的關係，也和魯迅一樣，他的心總和青年人連在一起，認為青年總會超過老年，對被政治迫害的青年，更以極大同情和關懷。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為防止被迫害，通過他送到當時認為最安全的地方——解放區，少說起碼有 50 多人。1947 年白色恐怖一時籠罩整個國民黨統治區，許先生把幾個最有被捕危險的青年送到他的親友家躲避，恐怕這幾個人至今也未必知道是許先生親自安排的。這裏不能不想起魯迅先生《紀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等幾篇懷念被迫害青年的感情深切的文章。

同時，也不能不想到 1989 年 6 月 4 日天安門的大屠殺，竟和 1926 年 3 月 18 日也是在同一地方殘殺青年暴行，何其相似乃爾。而許先生和當年魯迅一樣，譴責這一暴行。眾所周知，“六四”事件中，被當局通緝的“首犯”王丹，始終和許先生友誼深切，這不是和魯迅先生與劉和珍、柔石等感情一樣嗎？

※※※

不敢賣老，我雖已步入耄耋，但在我眼中，許先生仍是長者，是我的老師。同時，我也想在許先生眼中，恐怕仍把我看成上世紀 40 年代的愣小夥。如今南北相隔，靠通信往來，不能面聆教誨。許先生幾次來信，總

是鼓勵我，說我給他寫的信“很有味”“讀起來總是一種享受”。因此他再一次建議我，“多寫寫文章，讓更多的人一道享受，共鳴”。真慚愧，因種種原因，辜負他的期望。但有時，我也稍寫點文字，請他修改。如同上世紀四十年代我寫的那篇幼稚的量子論文章一樣，他都悉心修改、訂正。

去年，我應施雅風老先生之約，寫了一篇關於紀念“五四”九十周年的題為《民主不分新舊談起》的文章，許先生又鼓勵我說“文章很好，道理講得透徹”。隨即他指出我的幾個錯處，其中一句我把“不自由毋寧死”錯成《馬賽曲》的歌詞，他指出“這句名言出於美國人 Patrick Henry (1736—1799)，他對於美國獨立戰爭前夕的 1775 年 3 月 23 日在佛吉尼亞人民代表大會上呼籲人民奮起反抗英國殖民統治，最後以氣壯山河之勢表達了自己的心聲：“難道生命如此珍貴，和平如此甜蜜，以致我們非要用鐐铐和奴役為代價去換取？”“我不知道別人如何行事，而對於我，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許先生又給我上了一課。

還有一處，我把蔣介石的“白色恐怖”和毛澤東“文革”的“紅色恐怖”相提並論，他指出“前者是小巫，後者是大巫”，不能相提並論。

許先生修改文章，有時起畫龍點睛作用。我記得我

參加編寫 1949 年前全國最後最大的學生運動——于子三運動史，許先生就不苟同一些人把學生運動，都歸之黨的領導，把功勞記在黨員個人身上。他說“在任何群眾運動中，起決定作用的，首先是群眾自身的素質，地下黨組織和黨員充其量只能起著一種粘和劑和催化劑的作用。只有本身蘊藏著巨大能量的物質，催化劑才能促成其能量的釋放。”

※※※

1987 年我在北京時，許先生說“人生古來七十稀”，而按現在醫療條件，即使八十、九十也不為稀了。

今年是許先生九十大壽，我衷心祝願他更長壽，期頤百歲！

還是魯迅先生在某一篇文章中說的，他看病吃藥，期冀長壽，並不是完全為了自己，為了自己的親人，同時還為了那些“正人君子”，使他們因為他的存在，如骨鯁在喉、芒刺在背，使他們活得不舒服，這才是真正的戰士！

吳洵高：1949 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物理系，曾在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工作，離休前曾任南京 1014 所職工大學副校長。

許良英：中國科學界民主運動的先驅

王丹

一．從信仰到反叛

許良英先生于 1920 年 5 月 3 日出生在浙江臨海縣張家渡，1942 年他畢業於浙江大學物理系，其老師就是後來中國“兩彈一星”工程的主要功臣、著名核子物理學家王淦昌。1947 年先後出任中共浙江大學支部書記，杭州工委委員。1949 年以後任中共杭州市青委學生部長。¹

1952 年，許先生到中科院負責出版物的政治審查和宣傳工作。1957 許先生發表了批評科學院黨政機構官僚作風的言論，自然難逃毛澤東的“陽謀”，成為科學院全院批判的第一個“右派”，因為公開反對“反右”運動而被定成“極右分子”，開除黨籍和公職，回老家當了 20 多年農民。1962 年開始編寫《愛因斯坦文集》的研究工作。

1 李衛平：《許良英慨評八九民運》，香港：《開放》雜誌 2006. 6

1978年，許良英調回北京，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從事科學史，物理學思想史和科學哲學的研究。在思想理論方面，他也進行了積極探索。傅國湧高度評價他在1980年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科學技術知識講座第一講《科學技術發展的簡況》起草的講稿，認為許良英在那篇講稿中“率先提出了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的判斷”。²

許良英的自我剖析，反映了八十年代初中國對外的開放對他那一代知識份子產生的思想衝擊。他說：“60多年前被列寧判定已處於‘垂死’階段，以後又被毛澤東詛咒‘一天天爛下去’的西方世界，不僅沒有死去，反而顯現出旺盛的生命力，甚至出現了不可思議的人間奇跡：共產主義夢寐以求的消滅‘三大差別’（工人與農民的差別，城市與鄉村的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竟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初步實現，而我們這個‘到處鶯歌燕舞’的極樂世界，卻只能在神話和謊言中討生活。這個富有諷刺意義的鮮明對照，使我充分認識到科學和民主是人類現代文明的兩大柱石。是現代

2 傅國湧，樊百華等：《脊樑：中國三代自由知識份子評傳》，香港：開放出版社2001，P61

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³

二．從組織反右運動反思會到批評“新權威主義”

在八十年代風起雲湧的思想啟蒙運動中，許良英成為科學界中最勇於發言的代表人物。他的主張，基本上圍繞“科學”和“民主”兩個主題展開。

1980年10月9日，在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的成立大會上，許良英做了題為《關於科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的探討》的長篇發言，在第一部分中，明確提出：“政治上的民主和學術上的自由是科學繁榮的必要保證”。⁴在此基礎上，許良英還主張“實現現代化的最大思想障礙是封建遺毒”，“當前思想戰線的首要任務就是肅清封建遺毒”。⁵在整個八十年代，思想文化領域中，民主派與體制力量的交鋒中，一個突出的主題就是“反對封建遺毒”的問題。許良英是比較早就提出這個命題的人之一。

3 許良英：《序》，許良英：《科學·民主·理性——許良英文集（1977-199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P11

4 許良英：《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許良英：《科學·民主·理性——許良英文集（1977-199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P27

5 許良英：《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許良英：《科學·民主·理性——許良英文集（1977-199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P32

在八十年代的思想反思中，“民主”成為“主旋律”，理論界關於“民主”的呼籲與闡釋鋪天蓋地，但是有兩個與民主息息相關的概念卻顯得相對被忽視。一個是“自由”，一個是“人權”。這反映出那個時代的鮮明特色：急切擁抱普世價值，但是來不及對之進行深入的梳理和認識。在寫於1981年的《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的《結束語》中，許良英開始了他對“何為民主”的探討，提出“在政治民主保證下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就是一種尊重少數，保護少數的寬容精神”。⁶ 這樣的思想認識，隱含了“人權”的概念，可惜在當時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甚至作者本人也沒有進一步在這個方向上進行更多的展開。一直到了1986年，許良英對於“民主”的思考才開始推進到弘揚“自由”的價值上。1986年6月26日，他接受《光明日報》記者戴晴的採訪，題目開宗明義就是《為‘自由’正名》。在採訪中，他引用斯賓諾莎的話，肯定“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並借此公開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

而更加引起理論界關注的，是他對“民主集中制”的批判。民主集中制是社會主義政黨的組織原則，其

6 許良英：《科學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許良英：《科學。民主。理性——許良英文集（1977-199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P58

核心是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所有權力最終集中到最高領袖或寡頭統治集團手中。顯然，堅持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同時他指出，民主的原則是多數決定。中文文獻中都把“majority decision”誤譯成“少數服從多數”，是對民主原則的嚴重歪曲。在多數決定下，持不同意見的少數仍可保留自己的意見，堅守個人的應有權利。這樣尖銳的論點在輿論上引起轟動。當時各地的報刊摘要紛紛轉載，也可以看到那個時代思想的活躍和知識份子對於官方意識形態的挑戰。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就是在1986年11月，與方勵之、劉賓雁三人聯合發起“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會議的聯繫地址就在他家。這是“第一次由私人發起主辦，涉及大量知名人士的非官方的自由討論會”。⁷ 這次討論會因為獲得邀請的前著名右派分子錢偉長向中共有關部門寫信告密而流產。

1988年底中國知識界裏出現了反民主逆流，是吳稼祥、蕭功秦等人提出的“新權威主義”主張開明專制。許先生率先公開反對這股得到官方支持的思潮，他認

7 仲維光，《呼籲民主自由的科學史家——許良英》，博訊網：http://www.boxun.com/hero/zhongwg/9_1.shtml（2010.6.2）

為“實質上類似於1915年為袁世凱稱帝做準備的籌安會”，⁸還曾經委託當時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本科生的筆者，代表他去1989年2月在北京市委黨校召開的“新權威主義討論會”發表反對意見。

1988年11月10日，北京幾家民間學術機構聯合召開“全國首屆現代化理論研討會”，各個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幾乎都有出席。會上，許先生指出馬克思主義最大的歷史錯誤是主張專政，反對民主，導致二十世紀人類一大災難。在此之前，他還發表了《駁民主緩行論》一文，針對有人提出中國經濟落後，文化水準低，缺乏民主傳統，因此實行民主容易導致動亂等觀點逐一進行批駁。這篇文章在思想界引起比較大的迴響。

三．知識份子聯名信

作為一個科學史學家，許良英先生念茲在茲的是民主理論的宣揚與實踐。如果說“五四精神”的主軸是民主與科學的話，許先生可以說是“五四精神”的身體力行者了。更加難能可貴的是，與其他啟蒙派知識份子不同的是，作為當年的地下組織負責人，許先生具有對政

8 許良英：《為王丹辯護》，許良英：《科學・民主・理性——許良英文集（1977-199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P334

治形勢的清晰判斷。在八十年代末期的自由化浪潮中，他因為發起組織了一次簽名活動而成為了科學界民主運動的推手。

1989年1月，方勵之寫公開信給鄧小平，要求釋放政治犯。北島等33位作家聯合回應。隨後，許先生和他的大學同學，冰川科學家施雅風先生發起呼籲政治民主化的聯名信，要求政治體制改革，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終止因思想定罪的歷史。聯名信由錢臨照，王淦昌兩位先生領銜，簽名的有42人，多數為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學家。科學家群體共同發表政見，在中國歷史這是第一次，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989年4月到6月，北京等地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進而發展成全民民主運動。許良英先生公開支持學生的愛國熱情，不僅出席學生組織在人民大學舉辦的紀念“五四”活動，還參與組建了“首都知識界聯合會”。“六四”屠殺發生以後，許先生也公開抨擊當局的鎮壓行為，因此而長期被中國公安部門監視，並曾經受到人身自由的限制。但是他從來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的立場。1995年是聯合國制訂的“寬容”年，許良英先生再次聯絡一批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知識份子，聯名發表呼籲書，要求當局呼應寬容異議人士，保障言論自由，推動政治改革。這是1989年以後第一次比較具有

規模的知識份子抗議行動。

對於筆者來說尤為印象深刻的是，1995年我因為參加公民上書運動而第二次被捕入獄。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許先生挺身而出，在1996年公開發表了《為王丹辯護》一文，抗議當局對我的審判。當時在獄中得知許先生的聲援，對我來說是巨大的溫暖，也鼓勵了我堅強面對環境的險惡。

四．反思

2001年，在國內被剝奪了言論權的許良英在香港的明鏡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文集《科學・理性・民主》。在為這本書所寫的序言中，他回顧了自己八十年代的心路歷程：

當時我依然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雖然已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許多論點已經過時，或者本來就是錯誤的，但以為加以必要的修補和改造，馬克思主義還會有生命的。可是事與願違。承襲毛澤東衣鉢的鄧小平，從1981年開始，每隔一年發動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或‘清除精神污染’運動。1987年，主張寬容的總書記胡耀邦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遭罷黜，使我心中僅存的對共產黨的一線希望和對馬克思主義的一點殘餘信念徹底破滅了。1988年11月在全國現代化理論研討會上，

我第一次公開提出，馬克思的最大歷史錯誤是主張專政，反對民主，並認為整個人類的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導致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暴政，也導致中國五四民主啟蒙運動在五四後一年就夭折了。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回到五四，開展民主啟蒙運動。⁹

這段回顧值得研究八十年代知識份子思潮的人再三玩味。因為這不僅僅是許良英個人的反思，更是一代年輕時候曾經信仰過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的反思的代表，也折射出了八十年代的一幅思想和政治畫面。

王丹：1987年進入北京大學學習國際政治，後轉入歷史系，1989年中國學生民主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2008年獲得哈佛大學歷史暨東亞語言學博士學位，現任《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等職務。

9 許良英：《科學・民主・理性——許良英文集（1977-1999）》，香港：明鏡出版社 2001，P11-12

“嚮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

——為許良英先生90歲而寫

傅國湧

1957年7月29日，《人民日報》第二版頭條顯著位置刊出“本報訊”，題為《許良英的靈魂浸透了右派思想》，上面還有一行眉題：“公然反對黨對右派分子的反擊”。8月3日，《人民日報》第二版刊登一篇“新華社訊”《許良英李德齊是黨的叛徒》。那一年，許良英先生37歲。

很多年以後，許良英先生回望和反思反右運動時，幾次提到1957年的自己仍是崇拜、迷信毛澤東，更沒有對極權體制本身產生懷疑，他質疑的只是黨怎麼可以出爾反爾，既號召知識份子來提意見，人家提了意見，卻突然變了臉，這樣做，“不道德，連起碼的民主也沒有，太粗暴了。”在“鳴放”當中，他本人並無右派言論，他因反對反右運動而成為右派。所以《人民日報》指控他——“這個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真面目的充分暴露，還是在黨中央提出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戰鬥號召之後。”

他常說自己真正覺醒，對這個制度、對毛澤東產生

根本性的懷疑，是在 1974 年開始的，他意識到自己和同時代的知識份子並不真正懂得什麼是民主。從那時起他一步步踏上了追求民主的道路，背離了他年輕時所投身的這個革命陣營，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爭自由、爭民主的重要象徵。但是，透過《人民日報》對他的批判，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即使在 1957 年春夏之交，他就具備了一定的民主思想萌芽：

“許良英認為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初期有許多好的東西，如自由、平等、博愛、個性解放等等，值得我們繼承。並認為只有繼承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才能‘使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能迅速趕過資本主義國家’。他說這是他學習了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後的‘心得’。並到處宣揚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他曾對科學出版社的一位同志說：‘資產階級舊民主好，蘇聯所以發生斯大林事件就是因為缺乏資產階級民主’”。

“他四出奔走點火，曾經向科學院院部、幾個研究所、中央團校等十多個單位的二十多人散佈對中央、對人民日報反右派社論的不滿言論；向他們宣傳資產階級的所謂‘民主’，鼓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字報。他認為黨中央、領袖和任何人都不配被信任，只能相信他自己的‘獨立思考’。科學院黨委書記對他進行教育後，他仍然

堅持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的立場和觀點，說要堅決反對黨中央這樣做法（指反右派鬥爭）”。

報導還說，批判會上，“留學美國的科學家舉出了美國勞動人民沒有民主自由的許多事實，來駁斥許良英所十分欣賞的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

我認識許良英先生很晚，直到 1995 年才接觸到他的文章、著作，並開始與他通信，15 年來我們通信不輟，也有過多次的見面交談。時間的流轉不可抗拒，許先生今年 90 歲了。時代的浪花翻卷不定，變幻莫測，而他就是一塊經得起潮起潮落的礁石，始終平靜地屹立著，不為物喜，不為己悲，持續地做他要做的事，不為外界環境的變化所動，視世俗的浮名功利如無物，堅持獨立的思考，堅守他的價值選擇。

他生於 1920 年，在他成長的時期，“五四”的浪花已經消退，在偏遠的浙江臨海，他從“九一八”之後開始關注民族的危亡，身曆“一二九”以來一系列學生運動，成為浙大乃至杭州地下黨的主要負責人，直接參與領導了于子三運動。1949 年以後，他覺得革命已經完成，要回到科學研究中去，不久就遭遇鋪天蓋地的反右運動。在被放逐回故鄉種地的歲月裏，他編譯了《愛因斯坦文集》。因為選擇革命，他曾疏遠了物理學，令他的恩師王淦昌惋惜。愛因斯坦的研究也

許稍可告慰他年輕時做一個物理學家的夢想。在經歷“文革”的生死考驗之後重回中國科學院，他已年近花甲，大好的時光都已消逝。正是從上世紀 80 年代起，他站到了時代浪潮的中心。今天回過頭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整個激蕩的 80 年代，正是他與比他年輕的摯友方勵之等人舉起了科學、民主、自由的旗幟，帶動了那個年代的啟蒙思潮，並直接影響了年輕一代的大學生，他們身上蘊含的學術和思想力量，毫無疑問是那個年代最珍貴的因數。方勵之曾對一位美國的教授說，自己的民主思想源自許良英，令他意外。如果說，1989 春天，他與許多自然科學家聯名發表的公開信，成了 89 民運壯麗一幕的重要序曲之一，那麼“六四”的血腥殺戮是許先生晚年最大的心傷。憑著他正直的個性、敢於直面現實的品格，在萬馬齊喑的 90 年代，他一次次地為人權、民主大聲疾呼。在淋漓的鮮血面前，多少知識份子或改弦易轍，或保持沉默，或顧左右而言他，敢於說真話、直指真相的舉國上下寥寥無幾，許先生就是其中骨頭最硬、乃至看上有點迂的一個，所以他多次說自己就是安徒生童話中那個直言皇帝無衣的小孩，他的老師、心理學家陳立百歲高齡時還為他這個學生擔心。

1992 年他在《未來與發展》雜誌發表的《沒有政

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是“六四”之後第一次有人在媒體上公開地呼籲民主，為“和平演變”的合理性辯護，儘管文章發表時做了一些刪節，但還是遮不住逼人而來的鋒芒，被中宣部視為嚴重的政治事故。同一期發表的還有李銳、胡績偉、于浩成等人的文章。1993年春節時，李銳先生還當面說他的這篇文章“闖了禍”。也就是這個時期，在經過無數血的教訓之後，通過對自己革命生涯的痛苦反思，他逐漸領悟到中國的民主化是個漫長的過程，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首先要有一個思想啟蒙階段，民主化的道路應該是和平、非暴力的，要避免重複暴力革命的老路，從地下黨陣營走出來的他反對年輕人重複地下鬥爭、秘密組織那一套。同時他認識到，中國實現民主需要有一批獨立的知識份子，不依附任何權貴和勢力集團，具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通過思想影響社會。這些思路他在90年代初就已形成，我與先生初識時，他也曾鄭重地將這些觀點告訴我，對我產生了深深的震撼。隨著時光的推移，現實依然是那樣的嚴峻，許先生的思考就愈益顯示出它的可貴和沉重。這些看上去似乎尋常的結論，不是象牙塔中得來的抽象原則，而是他從風風雨雨中一點點悟出來的，既包含了他的生命體驗，也有他在世界文明史中所得到的啟發。1994年，他為改善中國人權狀況發出的聯名信，1995

年他發起的寬容呼籲，1996年他為王丹的辯護……在幽暗的夜空中，這些聲音代表了一個時代最有血性、最有擔當、也是最真實的一面。

許先生迄今走過的90年，見證了我們這個跌宕起伏的大時代，他的命運幾乎已完全融入時代的命運中，抗戰背景下的流亡大學，國共地下鬥爭，勝利的歡呼聲，拍案而起的反右運動，顛倒山河的“文革”，曾經抱有希望的改革10年，89風雲，“六四”的血腥……我常常想，通過他這個個體生命，我們可以清晰而具體而看到時代風雲的變幻不定，看到家國命運的坎坷曲折，看到熱血如何被褻瀆，青年如何被忽悠，他們的理想如何被利用。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像先生這樣正直無畏的知識份子如何承擔起本民族的命運，無論在何等黑暗、殘酷的年代，都沒有被征服，而是堅持獨立的思考，最終回歸人類文明的正道。這正是一個民族最為可貴的精神財富，它比什麼驚世的功業、藏之名山傳至不朽的名作都要可貴。通過許先生和他那一代知識份子的選擇、命運，我們對歷史、對社會、對人生、對人性都可以有進一步的理解。

許先生對民主和中國命運的思考從來沒有停下來，他與李慎之先生多年的通信，他與胡績偉、劉緒貽等先生的通信，都可以證明他的坦率、真誠和認真，他們之

間有共識，也有分歧，而他在任何時候都能堅持直言不諱，這樣的品格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知識份子中所稀缺的。也因此，有人不喜歡許先生，因為他太直了，有時直得有點讓人無法接受。90歲的許先生仍然保持著純樸的天性，沒有被政治扭曲，也沒有被變態的社會污染，他活得真實，活得坦然。他沒有任何面具，沒有任何裝飾，他活在他自己的生命裏，在他一切都出於自然。每一次到中關村看到許先生，總覺得他沒有變化，總是那麼平靜，那麼踏實，那麼篤定，因為他的世界是確定的。他一再地在文章中說，要有一顆平常心，做一個平常人。這樣的話他也無數次地對我說過。他自己做到了，從少年到白頭，他幾乎都是這樣想，也是這樣做的，從沒有因為自己理想的高遠，或知識上的優越，而在內心產生高高在上的精英心態。他認為，民主社會的建成要靠民主觀念的普及，而不是靠個別先知去建立的。每一次看到他，一個平凡的老人，滿頭白髮，說話時有激情，有時還會有憤怒，說到開心時笑得很純真。說到種種人事的評價，他都毫不隱晦自己的觀點，90歲的先生依然不知世故為何物。知識界在“六四”後的大面積潰敗，說到底，就是人們太世故，太懂得利害了，太會算計、太功利了，究其原因，缺乏平常心是一個重要因素，一旦環境有了壓力，就守不住良心的底線，紛紛轉向，四

處分流。

與同時代的知識份子相比，許良英先生對年輕時信仰的馬克思主義告別得早，而且徹底，在這個問題上他與劉賓雁先生有分歧，與其他許多可敬的老人也都有分歧。他為共產革命奉獻了青春和熱血，他的信仰在 1974 年起發生轉折，1987 年開始全面拋棄馬克思主義，1988 年，他在一次現代化理論討論會上公開指出馬克思最大的歷史錯誤是主張專政，反對民主。會後李銳先生當面責備他批判馬克思，在日記中還說他“偏激”。他沒有想到的是，20 年後，李銳親口告訴他：“現在我和你一樣。”這些曾經的馬克思主義者最終都離開了他們熱忱信仰過的主義，這是一代知識份子走過的道路，也是中國 20 世紀以來的道路，這條路滿布傷痕和創口，至今未能癒合。

在對民主的認識上，同時代的知識份子中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清晰，他可以用 20 多年時間來研究民主的歷史與理論，現在還在跋涉中。這一點曾令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十分感佩。1989 年春夏之交，我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多處看到張貼發表在《世界經濟導報》上的“民主要義”八條，後來才知出自先生的筆下。他在逐步摒棄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重建了對民主的信仰，從來沒有因為現實的令人失望而有所動搖。

2008 年 8 月 7 日，美國總統布希參加北京奧運會

開幕式前夕，在泰國曼谷發表演講時說，“我們呼籲實現開放與正義，不是為了把我們的觀念強加於人，而是為了使中國人民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正如中國科學家許良英所說：‘嚮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許先生很意外，布希竟然引用他的話，當我問及這句話是在哪里說的，他也記不得了，因為長期以來，同樣的話說過多次。其實，這句話源自《紐約時報》2006年8月22日一篇題為《北京的愛因斯坦傳人——一個為真理奮鬥的叛逆者》的採訪報導。布希之所以會引用他的話，可能與他此前不久（2008年4月）獲得美國物理學會頒發的“薩哈羅夫獎”有關，這個學會擁有4萬4千位成員，來自工業界、大學和國家實驗室，都是物理學家和相關專業人士。這是美國物理學界對這位中國同行在民主、人權方面努力的肯定。儘管在自己的祖國，許先生數十年來所作的一切，今天似乎都看不到結果，但是他總是樂觀地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

傅國湧：獨立歷史研究者，研究寫作領域包括中國近現代史，著有《1949年：中國知識份子的私人記錄》、《百年辛亥：親歷者的私人記錄》、《追尋失去的傳統》等。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祝賀許良英先生90華誕

王德祿

許良英先生今年 90 華誕，怎樣為他祝賀對我來說頗費心思。許良英對我的影響是終生的。許良英對中國、對社會、對思想界到底有什麼貢獻？哪些貢獻能比較久遠地影響歷史的進程？我認為許良英有五大貢獻是較為重要的並會產生持續的影響：一是關於科學史，二是關於愛因斯坦的研究，三是關於民主與啟蒙的研究，四是關於反右運動的歷史反思，五是關於普世價值。

一、衷心的祝福

關於給許良英祝壽的想法已經有 20 年了。1989 年 2 月，因考慮到 1990 年許良英 70 歲，我和武文生想編一本紀念文集，當把這個想法徵求一些朋友意見時，有的朋友說“周培源、王淦昌等老先生都是在 80 壽辰時搞得紀念活動，出了文集，現在時機不適合，等許先生 80 壽辰時再說吧”。2000 年 5 月，許良英 80 壽辰，我去許良英家商量怎麼辦，許良英不同意搞得太複雜，最

後還是採用了以浙江大學老校友老同學為主的一次餐敘，出席這次餐敘的有：許良英王來棣夫婦、葉篤正、黃宗甄、範岱年、李佩珊、武文生和我等人。2009年，許良英89歲，當時我聽人說生日“做九不做十”，90周歲要提前一年過。當時想搞一個主題活動，許良英提出這個主題活動要以“中國向何處去？”為主題。他給了我一些關於這個主題的資料，我看了後，感到這個主題不是很合適，提出應該以普世價值為主題。因為關於普世價值剛剛舉行了一個研討會，許良英發表了精闢的觀點。這件事也就放下了。最近聽說許先生的學生王作躍在美國提出要給許先生搞一個祝壽活動，陳恒六、劉兵也去了許先生家，希望能給他過90歲生日。許良英總算答應了，同意若干朋友和弟子寫一些回憶文章，屆時搞一個生日聚會。

二、第一次面見許良英

我是石油大學1977級學生，做畢業論文時，我選擇的方向是物理學史，選定的題目是《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傳記》。

1981年12月初，我們到北京調研實習，我去拜訪了許良英先生。因為之前我對許良英瞭解，所以見到許良英時我感到很親近，就和許良英談了我的許多想法。

1981年暑假時，我看了盧梭的《懺悔錄》和《論社會不平等的起源》兩本書，看了以後心裏很激動。在跟許良英交談時，就把我的一些想法表達了出來。當我說到中國應該有一場啟蒙運動時，許良英表示很高興，並說他和我持有同樣的觀點。在談話中我也表達了對民主、自由的嚮往。當時山東一些追求民主自由的青年正在搞一個民間刊物，叫《海浪花》，我和其中的一些人有個人的接觸。在與許良英的談話中，我也表達了對這些民間刊物的一些看法。這次與許良英見面，許良英對我有很大鼓勵，大大增加了我關注科學的社會作用、關注社會政治的勇氣和信心。

三、許良英與我的核和平研究

從北京回到石油學院後，我更加活躍，與許多同學談到了許良英。當時社會上正是思想解放活躍的時期，我甚至與很多外系同學專門召開了許良英《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自然辯證法通訊》1981年2月第1期）一文的研討會。

我畢業到涿州工作後，幾乎每個月都去看許良英。記得我寫了一篇評論文章，《論寬容》，請許良英提意見，許良英非常認真，逐字逐句地為我修改。

畢業後，我花了很大精力繼續研究物理學史，尤

其是對原子能社會史的研究。許良英翻譯的《愛因斯坦文集》（三卷本）中有大量當時的文獻。尤其是，當物理學家裏奧·西拉德得知納粹有可能發明原子彈時，就與愛因斯坦商量，促成了愛因斯坦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寫了一封信，建議美國要重視原子裂變的研究，由此開啟了原子彈的“曼哈頓計畫”。當美國在日本使用原子彈前後，這些原子物理學家又極力反對使用原子彈。

大學畢業後我就一直在研究這段歷史，並不時到許良英家，與他交流研究心得。1985年《自然辯證法通訊》要在廈門召開科學社會學學術會議，許良英建議我去參加這次討論會。我就準備了參會文章《原子科學家反對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的鬥爭》，這是我早期的學術論文，文章寫好以後，我請許良英審閱，許良英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應該說這次會議使我接觸了很多北京的學者，也打開了我的活動範圍，使得我一年後借調入北京。在80年代上半葉，我一直堅持研究科學的社會功能，研究核戰爭和核和平問題，而這些研究主要得自許良英的鼓勵和指導。在那時候，愛因斯坦成了我當時最主要的精神支柱。在當時，我發表了以下文章：《核和平之父：裏奧·西拉德》（《自然辯證法通訊》1988年第1期），《核科學與核和平》（《自然辯證法通訊》1986年第3期），《奧

本海默案件：美國的科學與政治》（《走向未來》1987年第2卷第2期）。

四、“雙百方針”的歷史研究

我到北京後，在《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負責科學社會學專欄工作。這時，我遇到的第一個重大的社會活動就是紀念“雙百方針”三十周年座談會，我和李真真負責會務。1986年5月13日，座談會召開。許良英、範岱年、羅偉、金觀濤等參加了會議，許良英的發言是：《“雙百”方針帶來的喜悅和悲哀給我們的啟示》。許良英的發言對我震動很大，我沒想到“雙百”方針及其後來的“反右”運動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帶來了這麼大的影響。我和李真真就以“雙百”方針的歷史回顧為主題，開始了專題研究。這個研究定位在政策研究，而且主要是知識份子政策，在研究過程中，最令我吃驚的是，所謂“百花齊放”的典故，來自於武則天在冬天裏令百花齊放，這是典型的封建專制主義，而且達到了登峰造極，它不但專制人，還要專制大自然。當時那麼多的歷史學家，如郭沫若、陳伯達、劉大年、黎澍等，對這個典故的歷史意義很清楚，但是他們卻並沒有將這個典故的政治含義說出來，反而成為“雙百”方針政策的主要詮釋者。

1986年，人們的思想比較活躍，方勵之提出應該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當方勵之徵求許良英意見時，許良英大為贊同，他們邀請劉賓雁加入作為發起人。方勵之、許良英和劉賓雁聚在一起，談論如何發起“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方勵之在聚會時起草了這個討論會的通知，討論會具體聯絡地址是許良英家。由於我和李真真當時正在做“雙百”方針和“反右”運動的研究，就當然地承擔起這次“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的秘書工作，負責聯絡、發信、徵稿。這件事被錢偉長捅到上面，引起軒然大波，再後來就導致了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三人被開除黨籍。我至今也覺得納悶，反右學術討論會，本來許良英是主要策劃人，卻把王若望開除了黨籍。後來得知在向鄧小平彙報這件事情時，將許良英誤說成王若望，從而使許良英逃過了一劫，這更使得歷史與現實之間顯得多麼荒謬！

我和李真真完成《“雙百”方針的歷史回顧》後，許良英給了我很多鼓勵和支持，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見。後來《“雙百”方針的歷史回顧》發表在《走向未來》雜誌（1988年3卷2期）。

關於雙百方針，我後來又寫過好幾篇文章，還和李真真寫過一本關於“雙百方針”的書，也編輯過一本“雙百方針”的文獻集，當時科學出版社答應給出版，並希

望許良英寫一個序言。許良英於 1988 年 8 月 30 日專門寫了《“雙百方針”文獻集》序。其中寫道“王德祿、李真真同志在編輯本書的過程中，曾同我交談過。我向他們提供過一些歷史線索。因此對他們這項工作，我是瞭解並支持的。本書在兩年前有幾個出版社願意接受出版，但都因同一眾所周知的原因而未果。現在能夠出版，絕非易事，需要我盡力，當然不該推卸”。遺憾的是，關於“雙百方針”的書和文獻集至今未能出版。

五、關於民主啟蒙和民主的研究

許良英是研究科學史和愛因斯坦而出名的，改革開放以來，許良英逐步對民主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感興趣。1988-1989 年，許良英與我經常談到民主理論和實踐的研究，我那時候才瞭解到許良英準備用畢生精力研究民主理論和實踐問題。當時我也有心做這方面的研究，後來由於各種原因我在這方面的研究就不多了。

在 1989 年學生民主運動期間，我經常去許良英家。他的一個觀點給我印象很深。“每代人的經驗都要每代人自己去體驗獲取”。他對學生的絕食等激進行為表示不贊同。因為許良英是搞學生運動出身的，當時他比大部分知識份子都更冷靜和理性。

鄧小平南巡講話，為中國改革開放吹來了一股新風。

當時香港一個新辦的雜誌在北京約了一組稿件，我參加了這個工作。通過範岱年的幫忙，約了一些著名專家寫了文章，後來香港那個雜誌沒辦，這組稿件就發表在《未來與發展》雜誌上（1992年第5期10月出版）。我當時每週去一次《未來與發展》雜誌編輯部，協助他們組稿，所以這組稿件很快地在《未來與發展》雜誌上發表了。許良英的《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能成功》也在這組稿件中，發表後，這篇文章影響最大。

2009年9月30日我去醫院探望許良英。交談中，許良英談到了他自己正在寫作中的《民主的歷史與理論》，進展比較緩慢，他為此十分焦慮。許良英說這本書涉及到很多發達國家的民主進程，預計全部寫完還需要四、五年。關於中國的部分，王來棣已經寫完。

關於《民主的歷史與理論》的寫作方法，許良英表示想採用司馬遷在《史記》中採用的夾敘夾議的寫法。我提出是否可以把一些已經完成的章節先行列印出來，徵求各方意見，許良英說那樣會容易被人抄襲。我又提出能否可以一章一章地以文章的形式發表，他說願意那樣做，但是在國內不給發表。許良英認為這本書對中國的未來意義很大。

近十年中國很多老人成為“兩頭真”，年輕時真誠地投身革命，老年時真誠地反思革命。許良英先生是這

些“兩頭真”的老同志中，反思做得最徹底的。他從1974年開始，走出愚昧，用了三、四十年的時間研究民主，今年已經90高齡，仍然孜孜不倦地研究民主理論，他的這種精神十分值得我們敬仰和追隨。

六、許良英的五大貢獻

為慶祝許良英九十壽辰，我花了很多時間考慮許良英對中國、對社會、對思想界到底有哪些貢獻，能比較久遠地影響歷史的進程。我認為有五個貢獻是長遠的持續的，並將日益發揮重大作用：一是關於科學史，二是關於愛因斯坦的研究，三是關於民主與啟蒙的研究，四是關於反右運動的歷史反思，五是關於普世價值。

（1）關於科學史。許良英從小就對科學十分著迷，1957年，許良英合著的《科學與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許良英、李佩珊主編的《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由科學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組織科學家為書記處成員和國務院領導講授科學技術知識，第一講就是由錢三強講授科學史，講稿是許良英和李佩珊起草的。在講稿中反復強調的一個論斷就是“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2008年，許良英被美國物理學會授予薩哈羅夫獎，許良英被認為

是科學家履行社會責任、捍衛人權的典範。

(2) 關於愛因斯坦的研究。許良英從小就十分崇拜愛因斯坦，初中二年級就為愛因斯坦的故事所吸引。18歲時精讀了愛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觀》。書中很多道理對許良英的一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1957年反右運動時，許良英被定為極右分子。他選擇回鄉務農“自謀生路”。1962年于光遠給許良英寄來《關於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重要著作選擇擬目》，要許良英參加編譯工作，許良英表示願意參加這項工作，從此許良英走上了研究愛因斯坦的道路。許良英成為中國乃至世界不可多得的愛因斯坦研究學者之一。《愛因斯坦文集》共三卷，這套文集出版，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影響了很多年輕人的思想，胡耀邦看了之後也向人們大力推薦此書。

(3) 關於民主理論。許良英八十年代初關於民主的最主要的文章是《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1989年1月，許良英與老同學施雅風發起42人簽名的要求政治民主的聯名信，在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1992年許良英發表在《未來與發展》雜誌上的《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能成功》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1989年以後，許良英與夫人王來棣全力以赴研究民主的歷史與理論，這些研究成果必將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4) 關於“反右”運動的歷史反思。1986年，許

良英等三人發起“反右”30周年學術討論會，這個倡議引起了全國的軒然大波，由於政治的干預，這個會議沒有如期進行，但是理清“反右”運動的歷史真相，一定是走向民主的基石。

（5）關於普世價值。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年，1978年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了人們的思想解放，2008年發生的汶川地震，使得普世價值的討論驟然熱了起來，許良英積極參與這場討論，澄清了許多混亂的概念，指出普世價值中的價值實際上就是道德準則或道德標準。許良英在《炎黃春秋》雜誌上發表了《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2008年8月7日，美國總統布希來北京參加奧運會的路上，途經泰國曼谷時發表演講，在演講中引用了許良英關於普世價值的觀點，“正如中國科學家許良英所說：‘嚮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

在許先生這一代人中，對中國未來走向有很多憂慮，認為中國的自由民主之路還很遙遠。記得90年代許良英和李慎之思想交流密切，李慎之經常流露出失望的情緒，他為社會上人心浮躁，青年人不關心政治而傷心。許良英對李慎之說，“表面上，中國這塊幾千年來沉積成的板塊是堅不可破的，但在整個人類文明洪流的不斷衝擊下，早已在逐漸融化中，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王德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人心是不可侮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許良英對中國未來充滿信心的根基。

值許良英先生九十華誕，特撰此文，以示祝願。

王德祿：1982年畢業於中國石油大學物理系，曾任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人員，現任北京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所長。

許良英先生對我的教誨和影響

武文生

1988年夏天，我有緣認識許良英先生，經常得到他的教誨；之後，通過許先生又先後得識王德祿先生、華貽芳先生，他們三位是對我的人生和思想發展影響非常大的人。值此許先生九十壽辰之際，謹回憶一些經歷片段，以表祝賀。

睿智的民主啟蒙者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思想啟蒙的年代。許良英先生是我重要的思想啟蒙者。我於1985年8月31日進入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應用化學專業讀書，當時北大氛圍較自由，學生思想活躍，使我很受益。除本專業的學習之外，我因喜愛文史，選了社會學等多種選修課，在北大圖書館廣泛涉略多種書籍、刊物，尤其是人物傳記和科學史、科學社會學著作，尤愛讀科學家傳記。當時，《自然辯證法通訊》影響較大，也是我最喜愛的刊物之一。記憶中，1986年夏天我首先讀到的是屈徹誠和許先生合作的論文，《關於我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批判愛因

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系統梳理了“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官方組織對愛因斯坦批判的歷史，使我對“文革”的無恥、荒誕和對人類文化的破壞有了較深入的認識。之後，我延伸閱讀創刊以來的《自然辯證法通訊》，許先生的著名論文《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我讀了多次，還曾複印收藏，其核心觀點使我深受震撼：“科學能使物盡其利，民主能使人盡其能；一個能使物 and 人都充分發揮作用的社會，必然會有無窮的生命力。因此，可以說，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顯然，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說，要實現現代化，科學和民主是根本，是關鍵”。

1988年5月4日，是北大校慶九十周年。在此前後，安排了很多活動。當天上午，在學校大講堂舉行了“慶祝北京大學建校九十周年大會”，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啟立（北大校友）出席。下午，我在北大“三角地”的佈告欄上看到一張不大的紙，上書“方勵之與北大青年見面，地點：賽凡提斯像前；時間：下午三點半”。在半信半疑之間，我到了賽凡提斯像前，見到方勵之先生和夫人李淑嫻老師席地而坐，旁邊圍坐著一群北大青年，再外邊則是站著的“人圈”。這是北大“草地沙龍”的第一次活動。

1988年5月11日的“草地沙龍”，邀請許先生與

北大學生交流，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許先生。5月10日，我參加一個關於中國知識份子問題的沙龍後，一位國政系87級的同學（後來才知道他的名字王丹）通知我，明天下午三點在賽凡提斯像前有活動。在5月11日的日記中，我較為詳細地記錄了這次活動：

下午二時四十五分，趕至賽凡提斯像下，但尚未有人來。不久劉剛（原物理系研究生，現在中科大研究生院工作）來了，告訴我今天請許良英先生來講，他們還要約請王若水、吳祖光等來講。三點多許先生來了，他面貌消瘦清矍，一副學者派頭，但看上去面容蒼老，個子也不像在相片上見到的那樣高大。

許先生簡單介紹了自己的經歷：四十年代加入中國共產黨，為浙江大學地下黨支部書記，以後在黨組織和中科院工作，1957年被劃為右派，回家做了二十多年農民，對中國現實比較瞭解。他說他原來很左，覺悟也很遲，1973年左右才開始覺悟，但在遭厄運的二十多年中通讀了《馬恩全集》，《毛澤東選集》讀了五遍、《列寧選集》購齊的也通讀了，自信對馬克思主義有一點發言權。許先生有感於中國人民意識之缺乏和錯誤觀念的流行和影響之深遠，遂立志寫一本書《民主論》，還未動筆，今天是將其基本思想拿來與大家討論，徵求青年人的意見。

許先生認為民主的基本內容有四點，即：（1）多

數決定；(2) 保護少數；(3) 人民代表直接選舉；(4) 人民監督政府及其官員。許先生還針對現在社會上所流行的許多錯誤觀點作了剖析：(1) 民主緩行。其理由為中國人口多，文盲比例高，缺乏民主傳統，許先生以經濟條件不能決定民主化前途、民主建設不能等文化素質高時才進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也沒有傳統作了批駁；(2) 精英統治。許先生認為精英統治就是貴族統治。

許先生認為現在所要做的是民主的啟蒙工作，否則中國的改革是沒有前途的，會陷入匈牙利等國的困境。但後來的討論有些偏離主題，而深入到了市民經濟（商人社會）才會有民主的課題。而許先生則對經濟問題不大感興趣。

1988年6月1日，北大地球物理系研究生柴慶豐（1983年入北大地球物理系大氣專業學習，1987級研究生）在北大附近被幾個社會人員毆打並用刀捅死，引發北大學潮，主要關注師生安全，並呼籲民主自由，當時稱作“柴慶豐事件”。在“柴慶豐事件”後期的一個晚上（可能是6月9日），在北大“三角地”的一次聚會中，我再次見到北大校友劉剛。劉說當時有便衣跟蹤他，我帶他到我們宿舍住宿，並進行了較多的交流，才知道劉剛就是“草地沙龍”的主辦人。劉剛覺得我關心民主，對科學史有興趣，提出我應去拜訪許良英先生，並告訴我

許先生的位址和電話。

1988年8月7日上午，當時北大放暑假，我去中關村812樓拜訪許先生。我介紹了自己的情況，包括家庭和在北大學習的情況，也談了我和劉剛的相識，較多地談了當時發生不久的“柴慶豐事件”。許先生談話的重點是他將要寫作的《民主論》和相關工作。對於一位沒有預約就初次上門求教的大學生，許先生放下手頭的工作，耐心地和我交談了近3個小時。當時我想，可能有三個原因，一是我是劉剛介紹來的，許先生對劉剛較為瞭解；二是我是北大學生，許先生對北大學生有較高的期待；三是我是技術物理系的學生，當時的系主任胡濟民教授是許先生浙大老同學。後來，我才知道，許先生平易近人，注重思想啟蒙，他花很多時間與人交流思想，尤其是對於愛思考、有獨立見解的青年學生。記得當天是陰天，我穿的是T恤衫和短褲，許先生還關切地問我衣服是否穿少了，使我很感動。

初次拜訪許先生，使我如沐春風，在日記中寫著，與許先生“交談後感到獲益很大”，覺得這是一位真正值得我尊敬、請教的師長。我8月8日返鄉探親，9月5日返校，9月7日下午即再次拜訪許先生。當時談話的內容包括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國家的黨內改革派、對電視片《河殤》的評價、緬甸民主運動的形勢等，許先生送給

我一份8月28日的《科技日報》，刊有許先生的文章《〈愛因斯坦文集〉中為什麼會有這些錯誤》，是對方勵之先生《評〈愛因斯坦文集〉》的回復。此後，我經常去許先生處拜訪、請教，基本上1-2周要去1次。我向許先生介紹自己的學習、讀書情況，也向許先生介紹北大的一些動態；許先生送給我他最近寫的文章，並向我推薦他認為重要的書籍和文章，有時我在許先生家讀書，會呆大半天，許先生和他的夫人王來棣先生經常留我在他們家吃飯。

許先生當時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研究民主的歷史和理論問題，他認為中國需要長期的民主啟蒙，準備組織一個關於民主理論研究的學習小組。他可能覺得我讀書面較寬，關心歷史和理論，基本素質還可以，希望我參加，我覺得這是個非常難得的學習機會。但1989年的形勢發展，出乎所有人的預料，許先生設想的民主理論學習小組並未實際組織起來。許先生知道我經常逛書店，就交給我200元錢，囑我為他代購關於民主研究方面有價值的新書，但這個任務我完成的並不好。

許先生在民主啟蒙方面做了大量的開拓性、先導性工作。他曾送給我《為“自由”正名》、《從一個譯名反思民主意識》等文章，我認真讀了，在一些思考的關鍵點上豁然開朗，尤其是消除了我的一些糊塗認識。後來，我與王德祿先生交流，他認為許先生受物理學家的科學

訓練，後來又長期從事科學史研究，他的思考和文章，直指問題的本原。

當時北大的思想很活躍，很多元，也很混亂。記得當時有幾位青年教師在校內開講座，鼓吹德國、日本式的“現代化”道路。我雖在講座現場遞條子，提出反對意見，但並未足夠認識到其危害性，我告訴許先生後，他嚴肅地指出這是反民主的思想逆流，要認真批駁。其後有人提出所謂“新權威主義”學說，也有北大青年教師參與其中。許先生明確指出，這是開歷史倒車，是飲鴆止渴。他還積極鼓勵我們年輕人寫反駁“新權威主義”的文章。1989年1月，在許先生的鼓勵下，我們幾位北大同學去參加在北京市委黨校召開的關於“新權威主義”的一個討論會，並在會上發了言。應《深圳商報》一位記者的約稿，王丹（他已轉入北大歷史系88級學習）和我把會上的發言整理成文，在該報刊出。這是“六四”後導致該報被停刊整頓的原因之一。

我在北大上學時，一直對科學史、科學社會學感興趣，曾讀了不少相關的書籍和刊物，如《自然辯證法通訊》發表的許多論文，我都讀過，也讀過很多科學家的傳記。我有機會向許先生請教後，曾徵詢可否報考他的研究生，許先生說他已經停招研究生。我曾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閱讀許先生和李佩珊先生主編的《20世紀科學技術簡

史》，尤其是許先生執筆的前言、後記，關於科學發展的社會環境方面的論述，尤其是“政治民主和學術自由是科學繁榮的必要保證”的思想，使我受益非淺。

我雖然對科學歷史、科學社會學很感興趣，但思想認識也很龐雜。當時氣功熱很流行，“人體特異功能”成為一些“科學家”的研究熱點，錢學森就提出所謂“人體科學可能是一場新的科學革命”的說法，當時迷惑了不少人。1987年“氣功大師”嚴新曾在北大大講堂做所謂“帶功報告”，清華物理系的教授現場發佈他們的“儀器檢測結果”，我參加了這場報告會並輕信其結果。一次我去拜訪許先生時，同他談到這些情況。許先生批評我思想太糊塗，我當時很天真，認為這是有科學依據的，與許先生發生爭執，他很嚴厲地批評了我，同時送給我他批駁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的論文、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申振鈺女士主編的《關於人體特異功能爭論的資料》。我讀了這本資料，才瞭解了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爭論的前因後果，為自己的盲信而感到後怕。此後，我對種種打著“科學”名義的現代迷信，鑒別能力大為提高。

堅韌的人權呼籲者

許先生既將中國的民主啟蒙作為長期的任務，也抓住時機積極促進民主，尤其是為保障人權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9年初，許先生說他最近比較忙，有一件比較重要的事情，但暫時不能告訴我。3月初，我讀到他起草並發起的42位知識份子呼籲政治民主化的聯名信，才明白這就是許先生說的“重要事情”。這是眾多中國的自然科學家首次共同表達他們關於政治改革的要求。我後來知道，許先生在起草這封信時，曾長時間思考、反復斟酌，徵集簽名時，他與每人都要深談1-2個小時，力求達成思想共識。42人聯名信是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的先聲。

1988年下半年，王丹與北大學生社團學海社談妥，成立北大學海社中國社會問題研究部，他任部長，請我作為高年級的學生積極參與、支持他的工作（當時我是大四學生），我同意了。王丹以此名義開始組織“民主沙龍”，基本上每週一次，就一個主題約請一位學者與大家交流。我們還嘗試編一本刊物《新五四》，許先生對我們的活動是積極支持的，受聘為《新五四》的顧問之一。

1988年前後，我曾有段時間想做職業民主活動人士，自認為這肯定有危險，不適合結婚，並因此而婉拒一位中學女同學的求愛。許先生曾是中共地下黨員、老資格的學生運動領導人。他多次同我講，在抗日戰爭和三年內戰時期，當時“國統區”學生運動的領導人和積極分子，都是成績優秀、真正追求民主自由的青年學生，只有國民黨的特務才是職業學生。今天的北大學生追求民主，也應

學好功課。中國的民主啟蒙主要依靠有獨立思想、業務能力突出的知識份子。受許先生的影響，我放棄了做職業民主人士的念頭，在此後的人生歷程中，在不同的職業崗位堅持學習，努力提高業務能力。許先生有鑒於中共搞秘密活動的教訓，認為追求民主必須用民主的方式和手段，始終堅持民主啟蒙是公開的、思想性、非組織化的活動。許先生經歷中共建國後多次殘酷的政治鬥爭，在反胡風、反右、“文革”中多次經歷“九死一生”的考驗，有豐富的人生閱歷，但始終保持赤子之心，他一直非常愛護青年學生，堅決反對某些人不負責任的激進主張。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不幸去世。我下午去許先生家，他對胡耀邦的去世很悲痛，和我一起追憶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錯案、發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推進改革開放、保護知識份子方面的歷史貢獻，使我加深對胡耀邦的認識。4月19日晚，我在北大“三角地”主持第十六次“民主沙龍”，主題是“緬懷胡耀邦同志的豐功偉績”，我講的內容主要是4月15日下午與許先生共同追思胡耀邦時總結的九條。這次“民主沙龍”結束後，北大同學群情振奮，組成了北大學生自治會（籌委會），這是當時首次成立的學生自治組織的雛形。

學生民主運動爆發後，我積極投身其中，4月22日在天安門廣場參加了胡耀邦追悼會。因為受許先生影

響，我始終保持冷靜克制的態度，堅持和平理性的方式。在當局發表《人民日報》“4.26社論”後，政治形勢較緊張，他送給我一本《于子三運動》，認為大學生們應該保護來之不易的民主運動成果，著重搞好校園民主建設，如選舉學生自治會等；學生應該適時復課，不應無限期罷課；要充分認識到政治的殘酷性和當局者的鐵血手段，青年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不能做無謂的犧牲。我將許先生的意思轉達給一些要好的同學和朋友，多數人同意。但因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搞政治的，加之臨近畢業，一直認為自己是學生民主運動冷靜的積極參與者，也沒有要當運動組織者的願望，在學生民主運動中是邊緣化的，許先生的意見未能影響到更多人，也未能對學生運動的走向產生大的影響，我一直引以為憾。

5月10日晚上，中國人民大學青年教師主辦“五四”七十周年紀念會，許先生參加會議並最後一位發言。他提出學生的基本任務是學習，不可長期罷課，希望各校立即復課。並告誡學生運動要保持自己的純潔性。王丹曾告訴我，有人給他出主意，發動絕食。我把這一消息告訴許先生後，他堅決反對絕食，認為青年學生的生命是最寶貴的，學生運動的組織者必須對參與者的生命安全負責任，絕食激化了矛盾，後果難以預測；而且必須認識到最高當局者在政治鬥爭中是殘酷無情的，奉行鐵腕

手段，已經下決心鎮壓，學生不能對他抱有幻想。我把許先生的意見儘快轉告了王丹，但王當時沒想到後來會有三千人參加絕食，只是說他與別人共同發起絕食，不好失信。5月13日學生絕食開始後，許先生一直為絕食學生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擔心。他身患心臟病等多種疾病，外出活動較少。5月18日晚，他應邀參加知識界聲援學生會議，並在會上第一個發言，強調這次民主運動已取得空前的偉大的勝利，我們必須緊急呼籲學生停止絕食，並撤離廣場回學校。絕大多數與會者贊同許先生的意見，決定成立“知識界救援團”，勸說學生停止絕食。

當局者出動幾十萬大軍，悍然鎮壓八九民主運動釀成“六四”血案後，許先生表現出錚錚鐵骨的中國知識份子風采。1990年冬天，在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組織的新春聯誼會上，因許先生是“敏感人物”，主辦者未安排許先生發言。許先生主動申請發言，痛批“政治流氓”何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政治空氣稍有鬆動，幾位朋友想在港辦一本刊物《東方》，想在京約請一些學者就《今後十年中國改革的前景與問題》開展筆談，許先生花力氣寫了《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稿子組好後，因原已溝通好的資金未到位而使籌辦刊物流產，後設法改在中國未來研究會主辦的《未來與發展》分兩輯發表，許先生的文章在第五期發表，

他指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人們從現代迷信中清醒過來，於是有十年改革開放的局面。改革的目標，1981年曾確定為：建設一個‘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現代化國家。人們為這個目標所吸引，對未來充滿希望。可是，由於根深蒂固的幾千年封建傳統的作祟，民主始終是寸步難行。特別是1989年6月4日那場史無前例的人間慘劇（發表時被編輯改為“震驚中外的天安門事件”）之後，民主自由被視為洪水猛獸，堅持主張民主的人被斥為‘敵對分子’。時間仿佛又回到了‘反右’和‘文革’年代，棍子、帽子滿天飛，稍有獨立思想的言論、著作一概被禁，而騙子、流氓、娼妓的胡話、夢囈卻使權貴們如獲至寶，正義之士無不為中華民族的厄運而唏噓。現在，從南到北驟然又吹起了強勁的改革之風，人們為之雀躍，似乎又出現了希望，但是這次改革，談的只是經濟改革和發展生產力，而回避政治改革，更是諱言民主。這種拐腳的改革能否成功，殊堪懷疑”。許先生這篇文章發表後，人們爭相傳閱，被宣傳當局視為嚴重的政治事故。

其後，許先生不斷為中國的人權、民主呼籲：

1994年3月8日，許先生夫婦等7位知識份子發表《為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

1995年5月16日，許先生起草並徵集45位知識份

子簽名的《迎接聯合國寬容年 呼籲實現國內寬容》發表；

1996年10月30日，王丹被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處八年徒刑後，11月10日許先生發表《為王丹辯護》。

在這些呼籲書發表後，許先生多次被軟禁，他並沒有退縮。但他後來意識到，當局者對他這樣德高望矍的老知識份子，不敢太過分，但對參與簽名的年輕人，處罰則嚴厲得多。為了保護年輕人，後來他較少採用這種方式。

不斷探索的自由思想者

自我有機會向許先生請教以來，讀了他關於民主理論、科學史等方面的重要論文，1991年讀到許先生的思想自傳手稿（寫到1958年他被打成“極右分子”回農村勞動時期止），其後又讀到《科學、民主、理性——許良英文集（1977-1999）》、《八十三封書信——許良英、李慎之書信集》等，使我對許先生的人生經歷有了較全面的瞭解，尤其是認識到他作為自由思想者的思考和探索，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價值。

自1978年“右派”平反後，許先生以全部精力和心血研究科學和民主問題，他認為，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而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一個共同的本質就是崇尚理性。關於科學精神的研究，集中體現在許先生關於愛因斯坦思想和

科學史的研究。許先生數十年長期從事愛因斯坦研究，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他主持編譯了《愛因斯坦文集》，並對愛因斯坦的思想進行了深入研究。他 1983 年 11 月在美國波士頓大學科學哲學討論會宣讀的論文《愛因斯坦的理性論思想和現代科學》，著重剖析了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提出愛氏的主導思想是“理性論的實在論”，“它的實質是：相信自然界的統一性和真理的客觀性，相信人類的理性思維能力，相信科學和人類的必然進步”。

1986 年 2 月，為祝賀著名科學史家錢臨照先生 80 壽辰，許先生完成了論文《歷史理性論的科學史觀芻議》。他提出，“人類進行科學活動的歷史，仿佛像一個向著未來和人類精神活動的各個領域無限展開的網路”。許先生認為：這個網路在縱向有著比較鮮明的線索，從各個側面反映了歷史發展的一些共同的特性，他稱之為“歷史的經線”，包括：歷史的變動性、歷史的制約性和相對性，歷史的繼承性和積累性（科學知識以及整個文明，是人類各個世代創造並代代相傳而逐漸積累起來的歷史產物），歷史的無限容納性（凡是對科學知識、科學思想的開拓和深化有所貢獻的，無論屬於哪個民族、哪個階級，崇尚哪種價值觀念和信仰，堅持哪種哲學觀點，在歷史上都有其應有的地位，應該得到肯定，因為這些貢獻有助於歷史的前進）。許先生認為，“就歷史的

橫截面來說，貫穿在各種科學活動中，普遍存在著一些基本概念，它們是一切科學探索的動力。”他稱之為“理性的緯線”，包括：世界統一性的信念、世界可理解性的信念、人類的經驗和理性一致的信念、科學和人類必然進步的信念。他特別提出，“人類間這種感覺經驗的一致性和理論性思維的一致性，既是歷史事實（實際上是由於人類具有共同的生理結構），又是一種信念。沒有這兩種一致性，科學就失去客觀意義，就不成為科學。這表明：‘人人生而平等’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兩條真理，也正是科學賴以生存的生理和心理基礎”。這是許先生關於人類共同的“人性”的深刻理解，正是在此基礎上，他將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完美地結合起來。

關於民主的研究，則要艱苦的多。許先生和夫人王來棣先生不顧年高體弱，自 20 世紀 80 年代後半期開始民主歷史和理論研究。他們制訂了全面的研究計畫，著手系統梳理自古希臘雅典民主制、近代啟蒙運動以來英國、美國、法國等建立民主政治的實踐，深入研讀斯賓諾莎、洛克等先哲關於民主、自由、人權方面的著作，分析近代中國民主政治方面的探索，著手寫作。

1989 年初，在多篇論文中，許先生提出，民主政治的內涵包括四個主要方面：

（1）確認人人生而平等，每個公民都有不可侵犯和

轉讓的權利，即人權。公民是國家的主人，不是任何權貴（無論是個人還是寡頭集團）的臣民或馴服工具。

（2）確認主權在民的原則，全體公民通過多數決定的原則來實行統治。不言而喻，處於少數地位的公民依然受到法律保護，依然享有公民的各項權利。

（3）這種統治只能通過（全體或多數）公民的自由贊同來建立，不可使用暴力或其他強迫和非法手段。由此，通過定期的公民自由競爭和選擇，少數派可能成為多數派，多數派也可能成為少數派；一切取決於選民的意願。

（4）任何政府官吏和人民代表都是人民的公僕，始終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政府首腦和人民代表都由公民選舉產生，並直接向選民負責。如發現有不稱職的，可以隨時通過法定程式予以罷免。

他認為，要實行民主制度，必須有四條重要保證：

（一）公民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公民可以公開的發表各種不同的政治見解和對領導人的批評，而不受到迫害和報復；（二）嚴格實行法治，廢止任何形式的人治；（三）實行權力制衡，防止絕對權力的出現；（四）嚴禁軍隊幹預政治，軍隊只聽命於政府首腦。

與此同時，許先生首先從若干基本概念入手，進行系統的梳理，做正本清源的工作。1986年，他提出為“自

由”正名；1989年，他著文《從一個譯名反思民主意識》澄清關於民主制的基本原則的誤解。

許先生對歷史的洞察力，使他對許多問題有深刻的認識。1992年經濟改革再次顯出生機以後，有人以亞洲“四小龍”為例，認為單純的經濟改革是可行的，許先生在《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中明確指出，“在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如果沒有政治上的民主，政權和官吏受不到廣大人民和獨立輿論的監督，必然‘官倒’猖獗，腐敗成風，社會矛盾必然日益激化，以致不可收拾”。他並辛辣地嘲諷，“如果人僅僅是經濟動物，生產力的增長是社會進步的唯一指標，那麼值得稱道的並不是亞洲‘四小龍’，而是希特勒當政時的德國。……1933年1月希特勒當上德國總理，1933-1938年5年內，國民生產總值增長68%，平均年增長率11%。……。根據這一‘偉大功績’，我們應該高呼‘希特勒萬歲’了…”。最近重讀此文，聯想到一段時間以來關於所謂“中國模式”的叫囂，令人十分感慨。

許先生治學嚴謹，他的論文，必須是廣泛收集關鍵資料，深入研讀和思考後才下筆，他的文章數量並不多。尤其是1989年以後，許先生的文章在中國大陸報刊無法發表。他的思考，很多反映在他同友人的通信中。僅我所知有限的資訊，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紀

前十年，他和百歲老人陳立先生、李慎之先生、戴厚英女士、劉緒貽先生等就有大量探討思想、社會、歷史的通信。其中，李慎之先生去世後，許先生和李先生的通信，經李先生公子李三達和南京鄧伍文先生編輯為《八十三封書信——許良英、李慎之書信集》，兩位致力於民主啟蒙的自由思想者，在五年多時間裏，以通信的方式進行深入的思想交流，傳為知識界佳話。進一步收集許先生同知識界人士的通信，將是研究當代思想史很有價值的資料。

我在北大讀書時，曾受美國革命時代的思想家湯瑪斯·潘恩很大影響，曾研讀當時能找到的潘恩的全部著作，並將潘恩視作自己的啟蒙導師。潘恩在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中，都曾是重要的啟蒙思想家，但他的經歷十分坎坷。記得我與師友交流時，曾將許先生比作中國民主啟蒙運動的“湯瑪斯·潘恩”。

許先生在評價愛因斯坦時，曾飽含深情地說：“只要稍微深入地瞭解愛因斯坦的思想和為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在治學和處世上，他都有始終如一的崇高的目標，處處顯示出高度的原則性。他在真理面前虛懷若穀，只有老老實實的服從，沒有虛偽的自尊。他用銳利的批判眼光去分析一切，也用同樣銳利的批判的眼光來解剖自己。他知錯必改，聞過則喜，從不文過飾非。

他的所謂‘多變’，就是他的知錯必改的光明磊落態度的表現，是出於對真理的虔誠的尊崇，是對自己終生信守的原則的堅持。而這正是一個真正理性論者的本色”。這恰是奉愛因斯坦為精神榜樣的許先生的寫照。

1988年有緣向許先生當面請教以來，許先生對我的思想發展有非常大的影響，對我的工作和生活也非常關心。我的理想曾是追隨許先生從事民主啟蒙工作，後因造化弄人，我以商業諮詢為業，對於民主啟蒙，也就有心無力，實在愧對許先生的關懷和期望。許先生年逾九十，仍與王先生辛勤筆耕，進行民主歷史與理論研究。作為晚輩，祈願許先生再健康工作十年、二十年，更願他關於民主理論的研究著作，成為中國民主啟蒙的利器！

武文生：1985-1989年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學生，曾受教於許良英先生，現在中國大陸從事商業諮詢。

真正的仁者只有傲骨沒有傲氣

——祝許良英老師九十大壽

陳恒六

許良英老師今年九十歲了。我們幾個做學生的覺得應該寫些什麼作為祝賀。我已經二十多年沒寫過什麼東西了，拿起筆來沉甸甸的。我知道我應該寫點兒什麼。我必須寫點什麼了。

我在 1981 年春天有幸認識許老師，至今已經 29 年了。而從 1981 年春至 1987 年秋，那六年我和許老師的聯繫是非常密切的。我就寫寫那六年的事情吧。

一、朝聞道，夕死無憾矣

認識許老師時，我是北師大物理系三年級的學生，許老師是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的研究員。最初，我是聽同班同學段強說起許老師的，他特別佩服許老師，因為他是愛因斯坦迷，而許老師是中文三卷本的《愛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編輯和翻譯者。段強是我大學時代的好朋友，我們曾經一起發起組織了北師大交叉學科研究會。

參加的人除了段強和我之外，還有哲學系的王本功，數學系的王謙毅和生物系的郭玲等人。當時段強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力，後來他曾擔任過北京市的副市長，那是後話。在段強的影響下，我也開始認真閱讀《愛因斯坦文集》。老實說，真正讀出味道的只有第三卷。第三卷收集的是愛因斯坦關於社會政治理念的文章。就這樣，我在段強的帶動下，成為一名堅定的愛因斯坦的“粉絲”，順便也就成了許老師的“粉絲”。一天，我在圖書館樓梯上遇到段強，他興奮地對我說：“快去三樓期刊閱覽室，許先生在《自然辯證法通訊》上又發表了一篇文章”。我快步沖上三樓，找到許老師的文章，如饑似渴地讀了起來。《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這真是一篇振聾發聵的好文章。我一口氣讀完，再也忍不住我內心強烈的衝動，提筆給許老師寫了一封表達我內心震撼的信。因為不知許老師的通信地址，只好把信寄給雜誌社，委託編輯代為轉交。大約過了兩三個星期，我那時的女朋友郭玲告訴我，許老師約我去面談。原來許老師兒子許成鋼那時的女友呂匡輝也在北師大讀書，且和郭玲同班。想必是許老師收到我冒昧的信後，向匡輝瞭解我的情況，而匡輝肯定也幫我美言了幾句，於是促成了我和許老師的見面。我真幸運！如今事情已經過去了29年，我仍清楚地記得同許老師第一次見面的情景。事先約好，去

友誼賓館五號樓見許老師，匡輝和郭玲的同班同學李小青和徐燕聽說了，也要去見見許老師，於是我就在她們四個同學的陪同下一起去見許老師了。那一天，許老師和我們談了很多，也談了很久。我則通過三件事向許老師講述了我對科學和民主的理解和體會。

一是談了通過自己的表哥和哥哥因思想言論被沒有民主沒有法制的社會剝奪生命和自由的悲慘命運，使我深切地感到沒有民主法制的社會是黑暗殘暴的社會，表達了自己對民主社會的嚮往和對沒有民主法制的黑暗社會的憤恨。同時也對許老師高舉科學民主的旗幟，為建設民主社會不懈努力的崇敬之情。

二是談了自己通過閱讀《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對愛因斯坦這位偉大的科學家的社會政治思想的理解。愛因斯坦不僅僅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他還是一位有良知，且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知識份子。中國需要像愛因斯坦那樣的科學家，需要像許老師那樣的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知識份子。

三是談了自己通過參加競選人民代表的活動，對建設民主社會實踐活動的體會。1980年下半年，改革開放後第一次人民代表普選工作開始了，全國許多高校的學生為了維護自身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自發地舉行了競選人民代表的活動。我積極地參加了這一民主活動，

並在這次活動中被北師大選區的選民推舉為人民代表五名正式候選人之一。我向許老師談了兩點切身體會：首先是同學們對行使自身民主權利非常關注；其次是同學們還特別關注那些和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事情。因此我認為，建設民主社會應從兩件事著手：一是人民代表必須真正由人民選出，二是人民代表必須關注人民的切身利益，代表選區人民說話。

許老師則鼓勵我認真思考科學民主問題。

這次見面，這次談話，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轉捩點，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座名副其實的里程碑。古人說，朝聞道，夕死無憾矣。我那天真有這樣的感覺。

二、認真讀書，獨立思考

認識了許老師之後，我經常去見許老師。為了能更多更直接地接受許老師的教誨，我決定報考許老師要招收的碩士研究生。1982年春，我如願以償考取了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物理思想史專業的研究生。許老師還聯合了另外六名學者一起，作我和另外兩名同學的指導老師。那六位導師分別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趙中立老師，中國科技大學的方勵之老師，清華大學的何成鈞老師，中科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的範岱年老師，浙江大學的汪容老師和北師大的劉遼老師。另外兩名同學則是劉

兵和王作躍。

在追隨許老師讀研究生的三年時間裏，許老師在我們身上傾注了太多的關愛和期望。是許老師塑造了我的人生價值觀。在許老師身上，我才真正明白了什麼人才配稱為社會的良心。什麼叫士可殺不可辱，什麼叫氣節，什麼叫民族脊梁。

記得許老師曾特別和我們三個學生談話，說做歷史研究最基本的一條，就是要像司馬遷寫《史記》一樣，做到秉筆直書。許老師還特別談到，人不能有傲氣，但不能沒有傲骨。他強調做人做學問都要獨立思考，不能迷信，不能人云亦云。

許老師帶學生的方法與其他老師有很大不同。對我影響很深的一個做法是他每週組織一次的讀書討論會。我和劉兵、王作躍每次都參加，有時同屆的科學哲學專業的兩個同學田雲光和徐蘭也參加，還有許老師前兩屆的研究生屈傲誠和熊偉，以及後來比我們晚一屆的研究生仲維光也來參加。我記得還有社科院研究生院科學哲學專業的研究生胡新和，北大哲學系的研究生吳國盛也都參加過許老師組織的讀書會。參加讀書會的人一般事先會報一本書，回去認真研讀，然後再向與會的人講述書的主要內容以及自己的感想，大家再發問討論。讀書會氣氛熱烈，有時也會爭論。我就是在許老師組織的讀

書會上學會讀書的。而且回到研究生院我和同學郝致京還另外組織了一個參加人更為廣泛的讀書會。我在讀書會上結識了許多朋友，很多人後來成了要好的朋友。

我在許老師的指導下，比較系統地閱讀了科學史學科的創始人哈佛教授 G. 薩頓的科學史理論。後來我和劉兵、仲維光一起，在許老師的鼓勵下，翻譯了一系列薩頓關於科學史的論著。1984 年薩頓誕生 100 周年。我們又在範岱年老師和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的李昆峰先生的支持下，翻譯出版了薩頓論科學史的論文專集。後來我們還翻譯出版了薩頓的名著《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以及《科學的歷史研究》。當時我們幾個同學的英文水準還很低，但在許老師的鼓勵下，在趙中立老師、何成鈞老師還有中國石油大學的戈革先生的幫助下，我們還是完成了介紹薩頓科學史理論的任務。

在許老師的讀書會上我還認真研讀了劍橋教授 C. P. 斯諾的兩篇演講論文《兩種文化》以及《科學和政府》。後來我和劉兵一起把這兩篇論文以《對科學的傲慢與偏見》為題，在金觀濤先生和梁曉燕女士的支持下，作為當時頗有影響的《走向未來》叢書中的一本翻譯出版了。現在趙中立老師、何成鈞老師、戈革先生都已經去世了，我發自內心地感謝這些無私幫助過我們的老師。在這裏我也想向範岱年老師、李

昆峰先生、金觀濤先生、梁曉燕女士表示我由衷的感激之情。

正是在許老師組織的讀書會上，通過研讀歷史文獻，我逐漸形成了畢業論文《愛因斯坦和原子彈》的主要想法。我深切認識到，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愛因斯坦是在高度社會責任感的驅使下，為了防止法西斯納粹德國率先擁有原子彈來對付民主國家，才毅然寫信給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建議美國儘快開展原子彈的研製工作。這是愛因斯坦反對法西斯專制，嚮往民主國家的一個重大舉措，其意義是極其深遠的。畢業後，我在許老師的鼓勵下，把畢業論文中這一部分的觀點專門加以整理，以“從愛因斯坦對待原子彈的態度，看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為題，在嚴家其先生的支持下，發表在《政治學研究》雜誌上。

無論是研究愛因斯坦，還是研究薩頓、斯諾，都是力圖研究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記得 1985 年春天，在許老師的指導下，我們還借紀念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論文 80 周年之機，在杭州浙江大學成功地舉辦了愛因斯坦研究討論會。可惜許老師因操勞過度，一隻眼睛突然失明，醫生診斷為視網膜脫落。雖經醫生精心治療，但從此許老師的視力大不如前，嚴重影響了他的閱讀寫作和研究工作。那時許老師才 65 歲。25 年過去了，許

老師一直頑強地堅持閱讀寫作研究。每次去見許老師，看到他仍然借助放大鏡艱難地看書，心中都萬分感慨。許老師真是一個一輩子都在認真讀書，獨立思考的學者，真是一個一輩子只有傲骨沒有傲氣的真人。

三、知易行難

三年時間飛逝而過，1985年春天我順利地通過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師從許老師做研究生的這三年時間，是我一生中最快樂最充實的三年。儘管那時生活條件還很艱苦，但我的心情卻非常好，內心充滿歡樂。記得那時我經常騎著自行車，穿梭奔馳在玉泉路的研究生院，中關村許老師家，清華何老師家，石油大學戈革先生家。還經常去位於友誼賓館的自然辨證法通訊雜誌社去見範岱年老師、金觀濤先生、李昆峰先生。那時我還經常在許老師和何老師家吃午飯。我無比懷念那些快樂充實的日子，許老師親自下廚煮的麵條和牛尾湯的滋味，我至今記憶猶新，回味無窮。

畢業後，我在許老師的親自過問下，被分配到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近現代研究室工作。為此，許老師還專門為我找到中科院研究生院當時的常務副院長吳塘去交涉。我真的很感謝許老師對我的關愛和栽培。

我在科學史所只工作了兩年。雖然還是在許老師的

親自指導下工作，但我的感受卻遠不及給許老師當研究生的時候。寫幾件事吧。

第一件事就是我剛才說的 1985 年在杭州浙江大學召開的愛因斯坦研究討論會決定出版一本《愛因斯坦研究》論文集。我 1985 年夏天分配到科學史所後，開始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仿照薩頓編輯出版科學史雜誌 ISIS 的方法，為愛因斯坦研究編制一份已經有的研究愛因斯坦有關文獻的索引。在許老師的親自指導下，我花費了許多時間，好不容易弄好了，科學出版社也已經完成了編輯校對出版印刷工作。書都印好了，樣書也看到了，就要發行了，突然不知什麼人卻下令封存所有印好的書。許多學者的研究成果毀於一旦，出版自由被無端踐踏，令人非常氣憤。我為這本書所做的努力也全白費了。我生氣之餘，也很喪氣。許老師為此也挺生氣。

第二件事是我到科學史所工作之後，在許老師的支持下，選報了一個研究課題，以當時歐美同學會的 1000 多名會員為調研訪談的物件，系統分析這些留學生回國之後發揮的作用和個人的命運。為此我還專門申請到了一筆中科院的科研基金。我和當時在中科院政策研究室工作的郝致京一起設計了調查問卷，發了 1000 多份調查問卷，回收了 200 多份問卷。許多人在接受我們訪談時只是說些冠冕堂皇的官話，沒什麼真話實話。坦白說，

我很失望。花了許多時間精力，而效果卻完全達不到預期的效果。我自己對此很不滿意。許老師也不太滿意。

第三件事是我個人的私事。我大學一畢業就結婚了，但結婚三四年了，卻一直沒有地方住。只能靠親朋師友的關係四處臨時借住。我借住過我侄子位於建國門外雅寶路的房子；我也通過岳母的關係，借住過位於定慧寺六一中學的宿舍；我也通過何老師借住過他女兒女婿在北大六公寓的宿舍；我還通過中科院研究生院學生處的關係，畢業後仍借住在位於中關村 42 號樓的研究生院研究生的宿舍。那幾年我每年都得搬家，真是不勝其煩。分配到科學史所後，我向所裏提出要住在科學史所的單身宿舍裏，那時科學史所的研究生不管畢業的還是尚未畢業的，都住在位於貢院西街 1 號和東總布胡同 19 號甲的單身宿舍裏。可科學史所的領導就是不批准我的要求。我一氣之下，看好有一間宿舍是空著的，就在幾個同學的幫助下，把門撬開，強行搬進去住。科學史所管事的人，揚言要把幫我搬家的同學扭送到公安局派出所去，還揚言要對我進行紀律處分。這使我很不開心。許老師也挺不高興。

其實，最讓我不滿並最終導致我下決心離開科學史所的原因是 1987 年初搞的所謂的“清除精神污染”和隨後而來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那是改革開放以來，我經歷過的第一次政治運動。在這次運動中，我所熟悉

並尊敬的方勵之老師被開除出黨。在科學史所組織的政治學習會上，一些人對許老師進行政治攻擊。最讓我震驚的是，這些攻擊許老師的人，並不都是因為不贊成許老師的思想觀點，而是因為許老師平時對他們的要求太嚴格，影響了他們評職稱等個人原因。當然也有一些人是屈於政治壓力，說出的違心之言。科學史所的一些人還催著許老師辦理了離休手續。所有這些，都讓我極度失望。

通過參加這場運動，我認識到許多運動中的鬥爭，並不是政治思想鬥爭，而是摻雜了許多個人利益和恩怨。讓我特別敬佩的是，許老師面對那些平庸小人的攻擊鎮定自若，嗤之以鼻。要知道，我到科學史所工作很大程度是想追隨許老師，做許老師的助手，受許老師的教誨。那時，我正積極參與中科院科技體制改革的探討，還是中科院青年改革諮詢小組的成員。科學史所的小環境讓我非常失望。於是，我就和許老師商量，準備離開科學史所，並在 1987 年秋天，正式調到中科院科技政策局工作。

四、師門辱教，愧對恩師

自從 1987 年秋天，我離開科學史所，調到中科院政策局工作以後，我和許老師的聯繫比以前少多了。一方面是因為日常工作繁忙；另一方面是因為 87 年底我兒

子出生了，這使我的生活壓力增加了許多。為了減輕自己的生活壓力，1988年我就離開了中科院機關，下海去聯想公司（當時叫中科院計算所公司）工作。1989年我又被聯想公司派到香港工作。再往後1990年我又離開了聯想公司去了美國。這以後和許老師的聯繫就更少了。

從81年春認識許老師，到87年秋離開科學史所去中科院政策局，在那六年的時間裏，我和許老師聯繫密切。在許老師身上，我學到了太多太多的東西。我真正懂得了為什麼說知易行難。真正明白像許老師那樣堅持自己的信念，幾十年如一日，不離不棄，無怨無悔的人實在是太少了，也實在是太難了。記得我曾經讀過學者羅爾綱寫的一本書，書名就叫《師門辱教記》。大意是說作為學生辜負了老師的栽培和期望。我從87年以後一直就是這樣的心情。我辜負了許老師對我的精心栽培和殷切期望。我對不起許老師。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敢單獨去見許老師。每次去見許老師，我都要拉上以前的同學劉兵或者王作躍，和我一起去。好在許老師對我特別寬容，每次都只是略加鞭策，沒有嚴加斥責。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同學劉兵和王作躍，他們都堅持從事科學史研究，並在各自的研究中取得許多成就。劉兵還在做關於科學史理論和方法論方面的研究。這是對薩

頓研究的繼續。王作躍還在從事科學家的社會責任以及科學與政府等方面的研究。這是對愛因斯坦研究的深入，是對 C. P. 斯諾研究的擴展。衷心希望他們能在各自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績，不辜負許老師的培養和關愛。

更令我特別高興的是許老師雖然已經九十高齡，但身體仍然非常健康，精神依舊十分敏銳。每次去見許老師之後，我的心情都久久不能平靜。從許老師身上，我才真正明白：為什麼說，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我從許老師身上真正懂得了什麼叫無私者無畏，什麼叫君子坦蕩蕩。

我衷心祝願許老師健康長壽。衷心希望看到許老師畢生為之奮鬥的科學民主精神在中國生根開花結果，發揚光大，充分發揮其健康的社會功能。

仁者壽！許老師是真正的仁者。許老師一定長壽。

陳恒六：1982 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1985 年獲得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科學思想史碩士學位，曾任職於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科技政策局、聯想公司、新浪公司，現任職於一房地產企業。

嚴師小事，學問大事

——寫于許良英老師90誕辰之際的幾則回憶

劉兵

在人生中，確實是存在有機遇的，而且，有時還會因當時並不能夠透徹理解的一些機遇而改變生活和發展的軌跡。1982年，當我從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考取了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自然辯證法專業物理學史方向的研究生，並有機會跟隨當時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任職的許良英老師學習時，就應該是我一生中這樣一次難得並且對我後來的發展至關重要的機遇，儘管當時我並沒有能更充分地理解這一點。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時常會設想，倘若當初不是跟隨許良英老師讀研，而是在可想像的可能性中，是跟當時學界其他老師讀研，那麼我很可能會走上另外幾乎完全不同的學術發展道路，如果以我今天的立場來看，那肯定是我現在所不願面對的選擇。每當這樣設想時，甚至會有一絲後怕，因為，畢竟當時對於學界瞭解太少，與幾位同門的師兄弟事先就對許良英老師有較多瞭解不同，我能有許良英老師作為

指導教師完成研究生的學業，實在是命運帶給我的幸運，恰恰是因為有跟隨許良英老師讀書的這段經歷的影響，才使我能夠被培養出現在的這種學術意識，沿著一條我覺得與別的老師指導下學習都會有所不同的道路來發展。我設想，在這樣的事後認識的背景下，倘人生還能有再次選擇的機會，我肯定還會再次選擇許老師作為導師。

在我的理解中，許良英老師最突出的特點，或者說個性，是他的率直、正直、坦誠，剛正不阿。這種個性體現在許老師為人處事的方方面面，既體現在他的政治立場、對社會各種現象的態度和行動上，也體現在他的學術研究和對學生的指導中。在這裏，我想回憶幾件過去學習中與許良英老師的教導有關的“小事”。這些小事在我學術成長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以此，在許老師 90 誕辰之際，向老師表達深深的謝意。

在學期間，我們幾位師兄弟，在許老師家裏參加了定期的討論班。在討論班上，經常是大家就自己所讀的書進行討論。這樣的討論，特別是許老師帶領我們的討論和指導，對於我們學會如何讀書，有着重要的影響。其實，讀書的有效方式，並不只在於記住書中的內容，更在於因閱讀而啟發自己的思考。至今，我在清華給學生們上專業課，也依然沿襲著當年許老師帶我們讀書的路數，重點強調對於讀書方法的學習。在這樣的過程

中，我也發現，當下許多學生，其實對於如何讀書的學習，實在是太有必要卻又很有欠缺的訓練。

大約在 1986 年初，在讀書討論班上，我們談到當時自然辯證法學界的一些傾向，並想根據我們當時的理解，對之做出我們的評論。對於我們這些茅廬都尚未初出年輕學生的大膽，許老師採取了鼓勵和支持的態度。於是，我、王作躍、陳恒六、仲維光和熊偉，先是就自然辯證法界“權威”查汝強的兩篇文章中的一些自然科學錯誤，寫成了一篇商榷文章，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上。後來，又分別對一些我們認為有問題的自然辯證法研究傾向和觀點，對查汝強和其他一些學者的文章寫出並發表了商榷或批評的論文。其中，除了許老師的指導之外，我還在我們的 7 人導師組中另外一位老師，方勵之先生的指導和幫助下，針對何祚庥有關宇宙學的觀點，寫成了一篇批評的論文（對“‘有限而無邊’是否就‘不可超越’”一文的質疑），於 1988 年發表在《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上。但令我頗有遺憾和不解的是，何祚庥後來曾對許多有關文章發表了激烈的反駁，但對我的這篇批評文章，卻似乎視而不見，一直沒有反應。在此期間，我們寫的這些文章，在當時比較傳統的自然辯證法學界，帶來了一個爭鳴討論的小小高潮。前不久，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的一位博士生，還在其博士論文中，

專門回顧了這段歷史。後來，曾有持不同看法的人指責說我們這幾個年輕學生是在老一輩學者的觀點分歧和恩怨中當了老師的“槍”。我覺得，其實恰當的說法應該是，因為我們在老師的指導下，形成了與老師相近的觀點，並想把這些觀點表達出來，並得到了許老師的鼓勵、支持和幫助，才会有這些爭鳴文章的寫作和發表。我們應該為自己當年能有機會在許老師的指導下參與學術討論，參與學術發展而感到自豪！

但是，除了在研究工作大力支持和鼓勵我們這些年輕學生的“闖勁”，許老師對我們的工作又是要求極其嚴格的。還是在學習階段，我和陳恒六、王作躍、仲維光等同學一起，曾一邊研讀，一邊翻譯了一些國外學者的文章和著作。特別是科學史家薩頓的作品，以及斯諾關於“兩種文化”的名著。而且，研讀和翻譯薩頓著作，也成了延續到現在仍是我主要研究領域科學編史學的工作的開端。

在翻譯的過程，許良英老師，以及我們的7人指導老師組中的趙中立老師、何成鈞老師，還有石油大學的戈革先生，都曾以幾乎同樣極度仔細、認真的方式來校改我們初學翻譯的文稿。在稿紙上，老師紅筆的校改經常讓人幾乎看不出原譯的樣子。正是以這種方式，我們有幸能在初學翻譯時，除了學習必要的翻譯技巧之外，還及時地意識到了翻譯的艱難，培養了對待翻譯嚴謹認

真的態度。後來在我也作了教師之後，當我再看我的學生的翻譯作品時，我發現最多的問題，其實主要出現在這種對待翻譯的態度上。當然，由於時間和精力的原因，現在我遠遠沒有能夠做到像許老師和其他老師當年如此仔細修改我們的譯稿那樣校訂我自己學生的譯稿，對此，實在是感到無限的慚愧。

我還記得有一件與翻譯有關的事，是在我研究生畢業後幾年，在工作時，當有機會參與一套翻譯和寫作的書的出版時，我曾和許老師說，我想選編並翻譯一本國外學者論述科學史與教育的文選。當時許老師就批評我說，你要想在這麼短的時間裏選編出有價值的文章，怎麼可能？於是我放棄了這個準備急就的工作。現在回想起來，當年許老師編譯至今影響巨大的《愛因斯坦文集》，花費了多少心血，相比之下，我當時那種對做選編和翻譯工作過於輕視的態度，實在是過於輕率，於學術有害。至今，在遇到類似的事情，當年許老師的批評，總是隱隱地在心中提醒著自己。

在做碩士學位論文時，許老師非常開放地鼓勵我們自己去找選題。我因為在大學期間學習的是低溫物理專業，想繼續利用這一有利背景，以超導物理學史研究作為學位論文的方向，也得到了許老師的認可。而且，許老師又再一次展示了他謙虛又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他

說，在歷史方面，我可以指導你，但因為我不懂超導物理，所以你要再找一個超導方面的專家來合作指導你。於是，我又找到了北京大學物理系的章立源教授作為畢業論文的合作指導老師。但是，在論文的寫作中，許老師在歷史問題，歷史研究方法乃至於文字細節上，依然對我進行了最為細心的指導。能夠像許老師這樣，為了學生，為了學術，而毫不計較，這樣的言傳身教，實在是作為學生而能遇到的幸事，是我作為學生能學到最好的為人之道。

如今，我也成為了教師，恩師許先生當年指導我們的過程中的點點滴滴，都實實在在地影響著自己今天的教學。在年節時，當我能帶著自己的學生，帶著自己學生的學生去看望許老師時，我希望許老師當年教給我們的如何做人、如何學習、如何研究的教誨，能夠通過我，在我的學生，在我的學生的學生中傳遞下去。

就做老師來說，許老師永遠是我的榜樣。我希望許老師更健康，更長壽，能夠看到他治學的影響，體現在一代代更多的後學身上。

劉兵：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1985年獲得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科學思想史碩士學位，現任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肩住黑暗的閘門”：

我所知道的許良英老師

王作躍

1986年夏天的一天，我懷著激動的心情，從中國科學院位於北京西郊玉泉路的研究生院，來到中關村812樓704室，去看望我的導師許良英先生。在此前不久，我接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歷史系的通知，告知我被錄取為科學史的博士生，並得到四年的獎學金資助。這次是臨行前最後一次看望許老師，具體細節已記不清楚，但許老師講的一段話卻銘記在我心中。他告訴我，他很高興我能有這麼好的機會到加大去繼續學習，希望我能夠在科學史學術研究上作出優秀的成就，並引用了魯迅的一段話來描述他對自己和我們這些學生的期望：“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¹

1 魯迅這句話出自他的文章“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最初發表在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號上，網上版見南方網：<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zt/youth/forerunner/200404280880.htm>，2010年8月察看。

今天，在慶祝許老師九十歲生日的日子裏，在慶祝他為中國的科學、民主、自由、和人權事業的貢獻時，在回顧他多年來對我和整個一代年輕知識份子的深刻影響時，我不禁又一次地想起魯迅的這段話，也想起許老師最喜愛的愛因斯坦對自己的民主主義政治理想的表述：“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² 愛因斯坦的話可以說是對魯迅“合理的做人”所作的一個最好的解說。在我的心目中，許老師，像魯迅和愛因斯坦一樣，真正做到了勇於去肩住黑暗的閘門，為把世界建成一個寬闊光明的地方，為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奉獻了自己的一生。關於許老師坎坷的生平、重要的著述和深遠的影響，其他師友的文章和許老師自己的 2001 年文集《科學・民主・理性》³ 已有詳盡的記載。作為一個科學史研究者，我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夠系統地把許老師放在中國近代科學與社會歷史的廣闊框架裏來考察，但目前限於時間和篇幅，在這篇短文裏，我將從一個學生的角度，主要記述一些多年來我從許老師那裏得到的教誨、受到的影響以及我所親歷的與許老師有關的一些歷史事件的有意義的細節，來表達

2 許良英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年，第 43 頁。

3 許良英，《科學・民主・理性》，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 年。

我對他的敬愛。

像無數個同代人一樣，我最早是通過愛因斯坦知道許老師的。1978年，我考入新鄉師範學院（現河南師範大學）讀物理，第二年是愛因斯坦誕辰一百周年，記得讀到報紙上整版的文章，記述北京舉行的紀念大會和周培源先生在會上的長篇主題發言（後來才知道該發言稿是周培源先生請許老師幫助起草的）。⁴當時系裏也很重視這個機會，開了大會，並有系裏的老師做學術報告，介紹愛因斯坦的科學貢獻和最新的物理學進展，包括統一場論等。但對我來說，真正接觸愛因斯坦，是在此後不久讀到趙中立和許良英先生主編的《紀念愛因斯坦譯文集》。⁵我當時正在上原子物理課，講到玻爾量子論，說原子內的電子有不同的軌道，一個電子還可以從一個軌道躍遷到另一個軌道，但該電子在兩個軌道之間躍遷時，是在幹什麼，被認為是不能問的問題。這個問題引起我極大的困惑。讀《譯文集》時才知道，愛因斯坦當

4 記得當時新鄉師院的院長叫聶補吾，1937年畢業於北大數學系，但對狹義相對論一直有興趣，在新鄉的愛因斯坦紀念會上講話時，說相對論仍然有可商榷的地方。印象中別的物理老師對此並不以為然。只是到了後來，才從許老師的另一個研究生、我的師兄屈徹誠那裏聽到，聶是在當年中國反對相對論的人裏少有的對相對論從科學上質疑的一位。

5 趙中立、許良英編譯，《紀念愛因斯坦譯文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

年也對玻爾的量子論存有疑問。儘管愛因斯坦的質疑與我的困惑是完全不同的性質—愛因斯坦是從物理和哲學的深度對玻爾量子論質疑，而我主要是學習這個理論遇到了困難—但當時讀到他們之間的爭論對我來說無疑是一個解脫，使我意識到量子論並不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理論。從此我開始萌發對愛因斯坦和物理學史的興趣，而通過這個《譯文集》、閱讀《自然辯證法通訊》、以及系裏對物理學史、物理學哲學有興趣的薛曉舟教授的介紹，很快知道許良英先生是國內愛因斯坦和物理學史研究的專家，並開始注意閱讀先生在這一段時間所發表的文章。

大概是到了三年級的時候，開始萌發了要從物理轉向物理學史的想法。但具體如何學習物理學史，心裏沒有數，就想到了許良英先生，決定給他寫一封信，請教如何學習物理學史。信寫好發給先生在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的地址。這時我的心情其實很矛盾，一方面覺得像許先生這樣的大學者，不可能會給一個本科生回信，另一方面當然又非常希望得到許先生的指教。

當很快就接到許先生的回信時，當時的激動的心情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很可惜許先生的這封信到現在已經找不到了，但信中關於如何學好物理學史的忠告，我

仍然清楚地記得。許先生說，要學好物理學史，首先要將兩個方面的功課學好，一個是物理學本身，另一個是英文。這段話，言簡意賅，一針見血，為我指出了進一步努力的方向。我認為，即使在今天，許先生的這段話，仍然是學習物理學史的最好的建議：學好物理學是研究物理學史的基礎，即使是做物理學與社會的外史研究，有與沒有一個好的物理學基礎，還是會有很大的影響；如果不把英文（或其他外文）學好，就只能局限于中文的文獻，不能擴展國際視野，不能與國外同行交流。後來回想起來，許先生這段話不僅告訴了我什麼是重要的，也告訴了我什麼是相對來說不那麼重要的：他沒有提到馬列哲學、或自然辯證法等其他當時的學者一般會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必修課。

在信中，許先生還提到他曾經翻譯過一本美國物理學家琳賽和瑪根瑙所著的《物理學的基礎》，認其為學習物理學史難得的好書。⁶ 可惜，我在新鄉師院找不到該中譯本，但幸運的是，在學校圖書館居然找到了英文原著，就下功夫花了很長的時間把它研讀完。結果，正如許先生所講，我獲益匪淺。即使今天，該書仍然不失

6 琳賽和瑪根瑙著，許良英譯，《物理學的基礎》，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原版是Robert B. Lindsay and Henry Margenau, *Foundations of Physics* (New York: Wiley, 1957).

為學習物理學思想史的一本佳作。對我來講，研讀該書還有一個收穫，我的英文大有長進，可謂一舉兩得，成了回應許先生忠告的好途徑。

到了 1982 年，我上大學四年級的時候，就開始尋找物理學史方面的研究生招考資訊，希望在此領域繼續學習。讓我喜出望外的是，趙中立先生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自然辯證法教研室開辦了一個物理學思想史的碩士班，為本校培養師資，並聘請了六個校外的學者一起組成了一個七人導師小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許良英先生，還有《自然辯證法通訊》的範岱年、清華的何成鈞、北京師範大學的劉遼、中國科技大學的方勵之、和浙江大學的汪容等教授。看到此招生資訊，我就馬上積極準備考試。記得考試的科目有物理、哲學、政治、和英文。考試完畢，只有忐忑不安地等著。沒想到，居然被錄取了，當時的心情只能用“欣喜若狂”來形容了。這意味著我不僅可以繼續深造，而且有機會跟隨我仰慕已久的許先生學習。

只是到了北京以後才陸續從師兄們那裏知道，自己其實險些“落榜”，而且是許先生拍板決定“救”了我。據說，當時物理學史要招三名研究生，報考的有幾十個人。最後按考試總分算，有四個考生分數相近且遠遠超出其他人，而我恰好就是第四名，但與第三名胡

新和幾乎不相上下（記得第一名是劉兵，第二名是陳恒六）。正在大家為此作難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老師們提出一個解決方案。當年他們也在招自然辯證法的研究生，專業方向與我們的相近，是物理學哲學，準備招兩名，但在他們的考生中，只有一個考的比較好。他們就向趙先生提出，你們在第三、第四名中挑一個，另一個我們要。最後，這個選擇給了許先生。據師兄們的說法，許先生說“我要年紀小的那個”。當時我是我們四人中年紀最小的，這樣我就幸運的留下來了。多年後，我曾經向許老師問起此事，他更正說，他當時考慮到不僅我是最年輕的，而且我在所有考生裏物理和英文都考得最好。這段歷史，今天回想起來，不僅感激許老師的知遇之恩，而且也為當時的學者們融洽的關係和靈活的做法感歎，不知在今天是否還有可能。⁷

在研究生院與許良英、趙中立等老師學習科學史

7 後來趙中立老師告訴我，如果當時哲學所的承諾有變的話，他是準備爭取把我們四人全部招收的。當時的社科院研究生院就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的隔壁，所以後來胡新和與同學朱約林其實是經常到我們學校，和我們以及另外兩位在同一教研室但屬於科學哲學專業的徐蘭、田雲光一起上課的。共同的學習和生活經歷和志趣使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關於趙老師和許老師的友誼，見柯遵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趙中立先生追思會紀錄”，《科學文化評論》，第7卷，2010年第三期。

和科學哲學，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興奮、最愉快、最有收穫的一段時光。其間，閱讀並和師友們討論兩位老師還有範岱年老師等編譯的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是最有意義的活動之一。⁸ 另外一個難忘的經歷是我們三個研究生在許老師、趙老師、和何成鈞老師的指導下，分工合作寫了一篇關於科學史先驅喬治·薩頓 (George Sarton) 生平、思想和影響的論文，在 1983 年在香山舉行的第一屆中國科技史學會物理學史分會大會上提交。在所學課程裏，許老師教的物理學思想史文獻選讀給我印象最深。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討論班的形式。許老師要求學生閱讀大量的原始和研究文獻，並鼓勵大家講出自己對文獻的總結和看法，從而養成獨立思考的能力和習慣。正是通過這個討論班的學習和閱讀《愛因斯坦文集》，我選擇了量子力學史作為我的碩士論文領域，最終研究的是 1925-1926 年間圍繞著海森堡的矩陣力學和薛定諤的波動力學等價性問題所發生的爭論。經過研究，我得出結論，認為這場爭論實際上是以愛因斯坦和玻爾為首的兩派物理學家之間關於因果性等問題所發生的綱領性爭論的一部分。

作為我的論文導師，許老師對我從選題到文獻研究

8 許良英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1979 年。

到論文寫作都給與了熱情的鼓勵和支持，並借給我他自己收藏的大量的中、英、德文著作供我使用。他並謙虛地告訴我，他自己不是量子力學史的專家，所以要我去請教其他學者，包括中國石油學院的戈革教授、北京大學的胡濟民教授、和當時在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董光壁老師。後來上述三位老師組成我的論文答辯委員會。在答辯會上，戈先生表示不贊同我論文的某些結論，但我並沒有因此而改變我的論點，而是根據我所掌握的史料對我的結論作了說明，最後答辯委員會通過了我的論文。⁹ 記得答辯後去見許老師，他對我敢於與戈先生在答辯會上進行學術辯論表示讚賞。對我來講，這不過是他一直教導我們要堅持獨立思考的一個結果。後來我把論文擴充改寫成一篇文章發表在《自然辯證法通訊》上，又承許老師悉心閱讀提出修改意見，對此我感激不盡。

在研究生院這段時間跟許老師學習到的，不光是學業，更多的是在為人和社會政治上的理念。正如愛因斯坦在回憶居里夫人時所講，“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

9 值得一提的是，戈革先生也並未因為學術分歧而影響我們的個人關係，後來在很多方面給我提供熱情幫助。

成就方面還要大”。¹⁰ 所有認識許老師的人都知道，他崇尚理性，疾惡如仇，把求真、誠實看的高於一切，視其為要求自己 and 衡量別人為人和學術研究的準則。從師兄們那裏，我們也瞭解到不少關於許老師早年、尤其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後回家務農、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的坎坷經歷，以及他與趙老師、範老師和其他導師指導小組成員之間的患難之交，並深為他們的友誼而感動。他關愛學生，與我們誠懇平等相待。每次到他那裏交談，都有如沐春風之感。

許老師並利用一切機會讓我們學生參與國際交流以開闊眼界。記得有一年美國物理史家、愛因斯坦研究專家、許老師的好朋友霍爾頓 (Gerald Holton) 教授來訪，許老師讓我陪同去長城遊覽，從而得益不淺。霍爾頓教授當時評價許老師的一句話到現在還令我印象深刻：他說他越瞭解許老師，他越覺得許老師是一個“剛正不阿的人” (“man of integrity”)。國際科學史學會主席、美國科學史家希伯特 (Erwin Hiebert) 教授訪華時，許老師特意安排他與自己的恩師王淦昌先生會面，並帶上我們幾個研究生一起也見到了王先生。

10 許良英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339頁。

我們這一屆研究生上學的時間，1982-1985，正好是許老師和方勵之老師等發動中國民主啟蒙運動、倡導科學與民主的時期，也是極左派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期，所以我們深切地感受到，在做好科學史學術研究的同時，作為知識份子，我們還有一個更大的社會責任：推動社會的思想解放、政治民主改革，為科學的自由發展掃清障礙。在這方面，許老師在1981年在《自然辯證法通訊》上所發表的《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對我和很多同代人有極大的影響。¹¹ 稍後，在八十年代中期，方老師在許老師的鼓勵和支持下在全國各高校所作的鼓動改革開放的演講更是激起了廣大青年學生參與改造社會的熱情。儘管作為學生，我們能做到的實際工作非常有限，但通過許老師等的言傳身教，通過對學術界思想交鋒的近距離接觸，我們確實學到了很多通過別的管道所學不到的東西。這些學術和思想上的積累終於在1986年所爆發的關於科學與哲學的論戰中得到了體現。

正如許老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所講，這場論戰部分起源於我們在許老師家裏舉行的定期非正式討論班。這

11 許良英，“試論科學與民主的社會功能”，《自然辯證法通訊》，1981年第1期，第3-6頁。

個討論班可以說是我們在研究生院的物理學史討論班的繼續，參加者除了我們這一屆的三個研究生外，還有許老師在自然科學史所招收的研究生熊偉（比我們早一年）和仲維光（比我們晚一年）。1985年我們這一屆三人畢業，我和劉兵留校做教師，恒六去了自然科學史所，但在許老師家的討論班仍然繼續到1988年。¹²我記得1985年底或1986年初有一天，我和劉兵在研究生院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查汝強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這樣的觀點：二十世紀科學的發展既證實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然觀，同時也說明科學的發展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引。查文並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基礎對相對論天體物理宇宙學的某些結論，如宇宙有限無邊，進行了批評，還給出了一整套他自己總結出的宇宙總規律。我們曾經上過宇宙學的課，包括方勵之老師相關的演講，覺得查先生的文章顯示出他對不少物理概念的理解有誤，從而對它們的哲學意義作出了牽強附會的解釋。後來在許老師家的討論班討論這個文章，大家進一步指出查文代表了一種把哲學凌駕於科學之上的傾向，在中國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裏，如不予以反駁，會助長政治幹預科學、重蹈以意識形態限制科學自由探索的覆轍。

12 見許良英致王作躍，1990年9月15日，王作躍個人收藏，下同。

在許老師的鼓勵下，當時我們五人就決定就該文給《中國社會科學》寫一個評論，指出其在科學理解上的錯誤。記得隨後我們在仲維光家裏又聚了一次，寫出評論的初稿，大家再一起討論定稿寄出。我還記得在此期間我們在中關村參加了一場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現代宇宙學的辯論，但遺憾的是，當方勵之老師以宇宙學家的代表出席參加辯論時，對方原定的辯論者卻臨時缺席。等到我們的評論以讀者來信的方式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時，我已經到美國去留學了，但對因我們對查文的質疑所引起的科學哲學的爭論仍然進行了跟蹤關注。關於這場爭論，已有不少研究發表，這裏就不贅述，只是轉述密勒（H. Lyman Miller）在他的《後毛時期中國的科學與持不同政見者》（*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Mao China*）裏對許老師和這整個爭論的高度評價：以許良英為首的科學家和科學史、科學哲學研究者們代表了一種捍衛科學自主性的努力，對整個八十年代的科學與政治關係的演化有極大的影響。¹³

如前所述，我 1986 年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UC Santa Barbara）留學，是得到了許老師的大力支

13 H. Lyman Miller, *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Mao China: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持的。令我欣慰的是，許老師因此與我的美國導師、物理學史家貝旦什（Lawrence Badash）教授也結下了友誼。貝旦什教授在美國致力於核軍備控制和維護人權的活動，曾任美國公民自由協會聖巴巴拉分會主席，所以也十分敬重許老師在中國推動民主、人權的勇氣。在他因患胰腺癌不幸於 2010 年 8 月 23 日突然去世之前，曾托我轉達他對許老師的良好祝願：“我要與大家一起，來慶祝許良英教授的九十歲生日，並慶祝他為了把我們的世界建成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所付出的一生的奉獻”。¹⁴

當貝旦什教授在 1988 年訪華時，受到許老師、範岱年老師和科學史所的李佩珊老師在北京的熱情款待，並介紹他認識方勵之老師。後來許老師寫信給我，說貝旦什教授在北京“大大稱讚你一番”，並“感謝我教育和訓練了這樣一位好學生送給了他們”。許老師然後說，“我並沒有對你做什麼工作，我所做的僅僅是鼓勵和支持你去獨立思考”。¹⁵ 這當然是許老師謙虛之言，但說明他對獨立思考的重視，而這與貝旦什教授的教學風格是一致的。到後來我自己當了教授，才更深切的感受到鼓勵和支持學生獨立思考確實是教學工作的精髓所在。

14 Lawrence Badash 致 王作躍電子郵件，2010 年 7 月 10 日。

15 許良英致王作躍，1988 年 5 月 22 日。

因此我在講授現代物理學史，講到愛因斯坦時，就經常提到許老師的一個精闢的觀點：愛因斯坦能夠做出巨大的科學成就，並不完全是因為他是一個天才，而更多的是因為他堅持獨立思考，有很強的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許老師是如何在我留學期間仍然幫助我做研究、並影響我的學術思想的。1994年我與貝旦什教授和我的同學彼得·鈕舍（Peter Neushul）到中國調研中國近現代科技史，尤其是海帶栽培歷史，在北京再次見到了許老師、範岱年老師和李佩珊老師。當貝旦什教授代表我們給他們每人贈送了一個印有大幅愛因斯坦漫畫的體恤衫時，他們幾位，尤其是許老師臉上所露出燦爛的、孩子般的笑容是我永遠難忘的。在北京期間，許老師介紹我們去採訪了幾位中國科學家，包括葉篤正和薛攀皋先生。後來我和彼得利用在中國收集到的資料，寫了一篇關於中國海洋學家曾呈奎和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的文章，其中的一個主要論點就是：科學在專制的制度下也許會得到一時的支持與發展，但長遠來看，科學的穩固發展，需要的光是財政上的支持，更需要一個民主的制度和自由的環境，以及由此而來的社會穩定。而這個觀點的形成一方面是建立在我們的史料研究基礎上，一方面也是受到了許老師的思想的影響。這篇文章

後來發表在國際科學史雜誌《愛西斯》(Isis)上，並獲得2003年度美國科學史學會的普萊斯－韋伯斯獎(Price-Webster Prize)。這是華人學者和近代中國科學題材第一次獲得美國科學史學會的獎項。在獲獎感言裏，我特意感謝了許老師對我們的幫助和對我的影響。¹⁶

總的來說，留美以後，我和許老師之間的聯繫主要是通過書信和我每次回國去看望他時的交談。例如，1986年底放寒假時，我曾短暫回國，聽到中國科技大學和北大等學校的學生，受到方勵之老師關於改革開放演講的鼓舞（儘管方老師不贊成上街），紛紛上街遊行反對官倒等腐敗現象。當我去看望許老師時，他告訴我他和方老師、劉賓雁正在組織一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並送給我一份會議通知書（我現在還珍藏著）。等我回到美國不久，就傳來了國內因為學潮罷免了保護知識份子的胡耀邦的總書記職務，並把方老師這位當年的內控右派再次開除出黨。當時我像很多留美學生一樣，對此發展感到不滿並參與了各種各樣的抗議活動。我也擔心許老師會受到迫害，但不久就接到他的來信，知道他像以往一樣，根本沒有考慮個人安危：“這次〔被開

16 見王作躍，“學習科學史的心路歷程”，《中國科技史雜誌》，第26卷，第2期（2005）：176-179。

除黨籍的]幾個人的名單上沒有我，將來總有一天會輪上的。好在我早已有充分思想準備，會泰然處之”。¹⁷

在這封信和隨後的幾封信裏，許老師提到他發表文章和出國學術訪問已經受到限制，但他和師母、中國近代史學家王來棣正在籌劃寫一本關於科學與民主的專著，並要我幫助他們收集相關的資料。在1988年1月14日的信中，他更是明確指出該書“重點不在科學，而在民主，準備對民主的概念、理論、實際[踐?]的歷史和現狀作比較系統的闡述，特別要對東方（社會主義國家）同西方做一個對比，探討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出路”。¹⁸ 記得這段時間，我在系裏上美國史和西方文明史的課並作助教，所以就給許老師提供了一些自己在學習這些科目中的收穫，包括英國大憲章的產生背景及其對西方民主發展的巨大貢獻。

在我珍藏的許老師來信中，1989年1月5-6日的信是最珍貴的歷史史料。在這封長達四頁的信中，許老師首先提到我托人帶給他的一本愛因斯坦掛曆，說“這本由希伯來大學和Einstein檔案館參與編制的有Einstein大幅照片的月曆，對我是太珍貴了”。在信中，

17 許良英致王作躍，1987年11月11日。

18 許良英致王作躍，1988年1月14日。

許老師講到他最近的一些活動：“今年是五·四七十周年和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半月前在自然辯證法常務理事會上，我提出應該隆重紀念這兩個節日，開展民主啟蒙宣傳和學術討論，吳明瑜、方勵之等都贊同。于光遠接受我們的意見，要把這作為 1989 年學會活動的‘主旋律’”。信是 1 月 5 日夜寫就，第二天，許老師又加了兩句：“寫好這封信，準備付郵，勵之來，給我看他今天寫給鄧小平的一封信，呼籲為慶祝建國四十年、五·四七十年、法國大革命二百年，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此信將公開發表，估計會引起輿論界注意”。¹⁹

眾所周知，方老師這封信不僅引起媒體關注，而且對當年的一系列思想政治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許老師自己也聯合四十一位其他科學家和學者發表公開信，回應方老師的呼籲，推動國內言論自由、政治民主改革。在 1989 年 4 月 14 日（胡耀邦去世的前夜）給我寫的信中，許老師提到這四十二人信，是“1 月中旬開始搞的，中間我病了，拖到二月中旬才發出”，並講到自己“最近已寫了四五篇紀念五四和批判新權威主義的文章”。²⁰隨後發生的震驚世界的天安門事件，對許老師無疑是一

19 許良英致王作躍，1989 年 1 月 5-6 日。

20 許良英致王作躍，1989 年 4 月 14 日。

個沉重的打擊。他深知民主改革是一個長遠的過程，不可急於求成，曾經勸說在天安門抗議的學生停止絕食，返回學校，但悲劇發生以後，他嚴詞譴責用暴力壓制學生運動。我們大家，包括很多認識許老師的國際科學史同行，都為他的安全擔憂，但他一如既往，泰然處之。

大約一年後，許老師在給我的信中講到自己在這段時期的沉重心情，說美國學者送他《愛因斯坦全集》第二卷作為他的七十歲生日禮物，但他“在這個窒息陰霾的日子裏，根本沒有什麼可高興的，生日也是如此”。許老師尤其抨擊當時對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壓制，提到他的兩本書——他的論文集《科學・民主・理性》和與方老師合編的《愛因斯坦研究》第一輯——都被禁，不能出版。²¹

面對種種阻力和高壓，許老師沒有屈服，也沒有消沉，而是繼續致力推動中國的科學、民主、自由和人權事業。1989年以後，許老師在人權方面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1995年組織四十五位中國知識份子簽署“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寬容”的呼籲書，得到國內外的廣泛回應。即使因此而受到種種

21 許良英致王作躍，1990年5月20日。如前述，《科學・民主・理性》後來在香港出版。

打壓，許老師決不退縮，繼續公開為民主和人權鼓與呼，並得到國際科學界的聲援。美國物理學會 2008 年授予許老師薩哈羅夫人權獎（Sakharov Prize），獎辭稱頒此獎給許老師是因為他“一生宣揚真理、民主和人權”（“A lifetime’s advocacy of truth,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當年四月份，美國物理學會在密蘇裏州的聖路易士市舉行年會，並舉行各個獎項—including 薩哈羅夫獎——的頒獎儀式。許老師因健康原因不能親往領獎，派大兒子、經濟學家許成鋼與會代他領獎，並特意邀請我和他在美的另一學生胡大年赴會參與授獎活動。在會上，我們深切地感受到美國物理學界乃至國際科學界對許老師致力於科學與人權事業的尊重和敬佩。正巧，在這次大會上許老師的好友霍爾頓教授也被授予派斯物理學史獎（Abraham Pais Prize），而霍爾頓教授在會上會下也一再跟我們講到他對許老師的敬重。後來，霍爾頓教授在托我轉致許老師的祝壽賀辭中，稱許老師是“這樣一個罕見的人，他既是一個優秀的學者，又是一個充滿勇氣的公民，更是一個堪為典範的人”（“He is that rare combination of a fine scholar, a courageous citizen, and an exemplary human being”）。²²

22 Gerald Holton 致王作躍電子郵件，2010 年 7 月 26 日。

會議期間，美國物理學會特意安排一個記者招待會，在會上我做了演講“愛因斯坦、薩哈羅夫和許良英：為人權而奮鬥的科學家”，介紹他們在實踐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捍衛人權上的歷史和相互聯繫。我最後講到，“給許良英教授頒發薩哈羅夫獎，不僅是對這樣一個在無畏地推動著人權的人，所給與的恰如其分的認可，而且是對所有那些在中國和其他地方推動以和平方式進行漸進的民主政治改革和推進人權的人們——無論是科學家或非科學家——一個令人振奮的激勵”。²³

同一年，我發表了根據博士論文擴充和改寫的英文專著《在衛星的陰影下：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和冷戰中的美國》，並把它題獻給我的兩個導師，許老師和貝旦什教授。在序言中我提到，在自己的科學史生涯中，“我受益于許良英教授最多，是他把我引向了科學史，給了我支持和鼓勵，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以自己對人權的倡導，在如何成為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份子方面，給我和其他很多人樹立了

23 Zuoyue Wang, “Einstein, Sakharov, and Xu Liangying: Scientists for Human Rights,” speech at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April 13, 2008, St. Louis.

一個榜樣”。²⁴

能認識恩師許良英先生、跟隨他研習科學史、並在如何做人、如何以各種方式推動科學、民主、自由和人權事業上得到他的教誨和影響，是我一生的榮幸。許老師真正是“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我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使得我們能夠“合理的做人”，能夠在科學史的學術研究上做出一點成就。讓我們以許老師為榜樣，一起在中國和所有地方來推動科學、民主、自由和人權，努力使得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得到尊重”。

王作躍：1982年畢業於新鄉師範學院（現河南師範大學）物理系，1985年獲得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科學思想史碩士學位，1994年獲得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歷史博士學位，現任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普莫娜分校歷史系教授。

24 Zuoyue Wang, *In Sputnik's Shadow: The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and Cold War America*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8), xii. 該書中文版《在衛星的陰影下：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與冷戰中的美國》於2011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另見王作躍，“美國近現代科技環境政策史研究：從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到奧巴馬”，《科學文化評論》，2010年2月，第7卷第1期，107-114頁。

科學史研究的良心

——記許良英先生言傳身教二十餘載

胡大年

我是許良英先生親自指導的最後一名碩士研究生。因赴美留學，我提前離開了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並未及在先生指導下撰寫論文。然而，我受到先生言傳身教的時間則遠不止在科學史所的兩年；在過去二十三年的學習和研究工作中，我一直受益於先生的教導與支持。至於開始受到先生著作影響的時間，還可追溯得更早。值先生九十壽辰，特撰此短文，重溫先生對我的言傳身教，並示先生嚴謹之學風與高尚的人品。

我是在 1979 年第一次接觸到許先生的著作。其間，我正就讀於文革後北京市恢復設立的第一批重點高中之一：清華附中。此時雖然課業繁重，且距我們這一屆的高考只有一年左右，我仍忙裏偷閒閱讀了不少課外的閒書。我的父親在中央黨校圖書館工作，他經常借些與科學或科學家有關的圖書給我看。那一年，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本書，一是艾芙·居里著的《居里夫人傳》，另

一本則為趙中立和許良英先生等編譯的《紀念愛因斯坦譯文集》。正是這兩本書，激發了我對科學家的生平與科學史的強烈興趣，而後者則引導我最終走入了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研究。此外，《中國青年報》為紀念愛因斯坦誕辰一百周年，曾在報上連載秦關根所著的《愛因斯坦傳》，這一科普式的小傳使我對愛因斯坦的生平更為著迷。後來得知，作者在撰寫此傳前，亦曾請教過許先生。因此，該書對我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亦可間接歸功於許先生。

1980年七月，我參加了高考。由於數學考試的意外失利，我未能考上自己的第一志願：清華大學工程力學系。結果，我被北方交通大學建築系錄取。這雖非我原先填報的志願（交大電子工程系），卻使我有機會學習多種力學課程，部分地滿足了我當時學習物理學的渴望。大學四年，我花了大量的時間閱讀物理學、物理學史和物理學家傳記方面的書籍與文章。我購買了全部三卷《愛因斯坦文集》，並仔細研讀過第一和第三卷。等到大學即將畢業、準備報考碩士研究生之時，我的興趣已完全不在所學的鐵道工程專業（大四的專業課曾有三門補考），而是報考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的自然辯證法專業，這是當年我所能找到的與我的興趣——科學史和科學哲學——最接近的研究生專業。當時，

建築系裏的老師和輔導員們對我居然報考哲學系的研究生都感到十分詫異。雖然經過努力的準備，但由於我不熟悉“自然辯證法”的專業課，此次考研失敗了。誰知，此乃塞翁失馬，為我三年後直接師從許良英先生留下了機會。

大學畢業之後，我被分配到國家計劃委員會標準定額局規範處，並在此處工作了三年。¹ 其間，我仍一直關注著與科學史相關的各種書籍、報導和活動，曾尋機旁聽了哈佛大學科學史系系主任希伯特（Erwin Hiebert）教授在北京友誼賓館的公開演講，以及一次在中央黨校召開的科學史學術討論會（當時主持會議的正是許先生的弟子，陳恒六先生）。正是在黨校舉行的這次會議上，我才第一次見到了許先生，不過當時並未敢上前搭話，只是坐在會場的後排，遠遠地望著。1986年底，我終於說服了我的局長，讓我參加研究生考試，條件是我答應只考一次。此次報考，我選擇了中科院自

1 據稱，正是我報考哲學系的舉動，引起了到交大建築系招人的國家計委的徐處長的注意，並因此更改了我原定的分配方向（鐵道部科學研究院）。可笑的是，當初我得知計委招人時（名額只有一個），也曾詢問過系裏負責分配的輔導員，不知我是否有此機會。誰知這位不過早我兩年畢業而後留校的學長，竟以輕蔑的口吻訓斥了我一番：“你也想去國家計委？那麼重要的國家機關，你又不是黨員，怎麼可能分配你去？”那意思很清楚：甯做夢了！

然科學史所許良英和董光壁兩位先生合招的物理學史專業。出於學習和研究現代物理學史的強烈願望，我特別珍惜這唯一的一次考研機會，利用一切工餘時間，對考試科目做了認真的準備。初試於 1987 年 2 月在當時位於東皇城根的科學史所內舉行。由於考試地點距我在頤和園北宮門的家太遠，且天氣寒冷，為了避免遲到，我在考試期間曾借宿于我父母在城裏的一位朋友家。在順利通過了初試之後，我又參加了由許、董兩位先生親自主持的復試，因而再次見到許先生。當許先生問我今後的研究意向時，我毫不猶豫地提出要研究愛因斯坦。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記得，兩位先生聽完我的回答後，曾相互對視，臉上露出會心的微笑。後來，北京鋼鐵學院畢業的范林和我被正式錄取為兩位先生的碩士研究生。此後，許先生曾專門找我和范林談過一次，說明他想主要負責指導我的研究工作。我不知道范林當時是否也想選許先生作為他的導師，但我記得他建議范林跟董光壁先生作論文，因為那時董老師在科學史所好像還沒有自己的研究生。

研究生學習的第一年，即 1987 年秋至 1988 年夏，我住在玉泉路科學院研究生院選課，但也定期到中關村與許先生見面，除了彙報自己的學習情況，也幫助研究所給許先生傳遞些材料等等。在經歷了 1986 年底的學

潮和 1987 年初胡耀邦辭職等重大事件之後，國內的政治氣氛趨於緊張、經濟形勢也很動盪，中國知識界關於民主與新權威主義的爭論也愈演愈烈。此時的許先生，正在積極從事對中國知識份子（包括他自己）進行民主思想的再啟蒙，為推動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些在許先生的自述和其他的回憶文章中已有詳述。在此，我只想提一下自己所親眼目睹的許先生在北大與學生交流的生動一幕。

那是在 1988 年 5 月間，北大學生組織的“民主沙龍”邀請許先生到北大三角地與學生們會面、討論。因年近七旬的許先生身體和視力都不好，為了先生的安全，組織者特意請許先生的研究生在他乘坐公車往返北大的途中幫助保護一下。為此，我和另外一位同學全程陪同許先生參加了此次活動。我們大概是在下午三、四點鐘抵達北大三角地的，許先生在草坪上席地而坐，並立即與先到的學生們開始交談。沒過多久，三角地周圍開來好幾輛麵包車和吉普車，從車上下來至少十幾位身著便衣的小夥子，他們很快散佈在三角地的周圍，並密切注視著許先生和其他參與者的言行。有些人則公然在附近架起了攝像機和帶長焦鏡頭的專業相機，對沙龍的活動進行錄影和拍照。面對顯而易見的監視，許先生坦然地回答了學生們的各種問題，並就

改革的進程、民主和新權威主義等坦率地談了自己的看法。

1988 年秋，我從研究生院返回科學史所，跟許先生和董老師學習專業課，主要是自己在家讀書和寫讀書報告。我不僅學習了關於愛因斯坦的文獻，而且還閱讀了威爾斯的《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 by H.G. Wells*）和肯尼迪的《大國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by Paul Kennedy*）。這期間，許先生也開始與我擬定論文的題目。許先生建議以“愛因斯坦的民主思想”作為我的碩士論文題目。這一建議顯然反映了當時許先生的思考和國內形勢的需要，同時也考慮了我的知識背景和興趣。我愉快地接受了這一經過許先生深思熟慮的建議。

1988 年歲末，我一面收集與論文題目相關的資料，一面也著手準備申請自費赴美留學。對於在研究生學習期間申請出國留學，我心裏是很矛盾的。本來，我的理想計畫是，先在許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碩士學位，然後出國留學。但是，當時國家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政策，卻迫使我不得不更改原定的方案。按照當時的規定，取得碩士學位後須服務至少 5 年才能自費出國留學，否則必須賠償國家一筆巨額培養費。像許多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同學一樣，我渴望儘早赴美進一步深造。因此，為了避

免5年的等待及更高額的賠款，² 我不得不採取相應的對策：提前申請美國大學的研究院獎助學金，一旦成功，則立即辦理退學和出國手續。對我來說，這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決定，因為我並不想中途放棄好不容易才爭取到的跟許先生學習的機會。此外，我也覺得很難開口向許先生說明我的有點兒自私的想法。我可以設身處地地想像，任何一位教授對像我這樣半途而費的研究生，都會很自然地感到失望和不滿。但是，在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當面向許先生談了我的想法之後，他雖然有些失望，卻還是對此表示理解，並且同意為我寫推薦信。使我深受感動的是，他在信中對我的學業和能力作了坦率而又客觀公正的評價，這為我赴美留學申請最後取得成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989年，是國內外形勢驟變的一年。這時的許良英先生，已成為中國知識份子中主張民主、人權的領軍人物之一。他不但在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常務理事會上率先提出，要在1989年“隆重”紀念“五四”七十年，“重點”宣傳民主和人權；並且於當年2月與中

2 此時，我已年逾26周歲，如再等5年，出國就有點太晚了。按當時的規定，碩士研究生畢業後未滿“5年服務期”而辭職自費出國的，須付的“國家培養費”要比本科（學士）畢業生應付的款額更高。

國著名地理學和冰川學家施雅風聯手，在自然科學家當中，發起“呼籲政治民主化”的聯名信，在國內外都引起轟動。³ 4月15日，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再次引發了學潮及一系列政治事件，最終當局於六月初動用軍隊鎮壓了以學生為主的示威和抗爭，並罷黜了同情學生的趙紫陽總書記。對此，許先生曾痛心地對我說，“中國的民主政治因此倒退了五十年！”

“六四”之後，許先生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但他卻謝絕了親友們勸他“躲避一下”的忠告，寧願“為中國民主事業做一個譚嗣同”。⁴ 為了中國的民主事業，許先生可以置個人安危於不顧，卻時刻惦念著他的學生的安全。就在“六四”後不久的一天晚上，許先生親自打電話到我家，同我商量更改原定的碩士論文題目。直到我告訴他，我已被美國俄亥俄州的凱斯西儲備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或 CWRU）的歷史系錄取，已準備退學和辦理出國手續，他才放心。由於“六四”之後公安局對申請離境人員的嚴格審查，大大延長了申請護照的時間，我一直等到9月中旬才得以動身赴美，那時 CWRU 已經開學一

3 許良英，“幻想·挫折·反思·探索一波濤一生的心路歷程”，刊于燕凌等編著，《紅岩兒女》，第三部（1949年以後）“一生都在波濤中”，第18頁。

4 同上。

周了。

我於 1989 年 9 月中旬飛抵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市，開始就讀於 CWRU 歷史系的技術與科學史專案。1991 年夏，我獲得碩士學位；翌年，又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並開始準備作論文。在與許先生以及在美國和德國的愛因斯坦專家們諮詢之後，我決定研究“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在中國”這一課題。這就需要查閱大量的原始中文文獻，而這一條件在 CWRU 是不具備的。為此，我決定隨我的美國房東搬往加州洛杉磯居住，以便利利用加大洛杉磯分校的中文圖書館。誰知，到了洛杉磯才發現，我們的住處距離加大洛杉磯分校很遠，交通又不方便，實際上不可能經常去該校圖書館查閱資料，而且該館在我的研究領域的中文藏書也不夠豐富。此外，我在 CWRU 的論文導師雖是一位極優秀的科學史家，但他的專長是化學史，並不能在現代物理學史、特別是愛因斯坦研究方面給予我很具體地指導。這些都促使我考慮轉學。

1993 年秋，我成功地轉入耶魯大學，師從國際著名的物理史和愛因斯坦研究的專家 Martin J. Klein 教授（1924-2009）。早在 1983 年，許先生訪美時就已同 Klein 教授相識。回國後，許先生曾撰文向中國讀者介紹了 Klein 教授，稱其為“現代物理學史研究的先驅”

之一，並高度讚揚了他在與湯瑪斯·庫恩的論戰中，“為維護科學史研究應有的嚴肅學風”所作出的貢獻。⁵我就是讀了這篇文章後，才第一次知道 Klein 教授的。十幾年後，許先生在來信中又指出，Klein 教授“是一位嚴謹而有思想的學者，他對 Thomas Kuhn 的批評是一針見血的。他的文章都是言之有物的，關於 Einstein 的研究也是如此”。⁶根據我同 Klein 教授長達 16 年交往的經驗，我知道他對許先生的學識和人品，也是非常仰慕的。兩位老先生曾通過我多次互致問候。在 Klein 教授任《愛因斯坦全集》主編期間，他曾專門指示出版社，先後將多卷新出版的《全集》寄給許先生。當時科學院圖書館（科圖）因經費困難，買不起這套《全集》，而許先生則高興地對我說過，他收藏的《全集》卷數，比北圖和科圖的還全。⁷

在耶魯，除了 Klein 教授，還有許多傑出的學者不僅向我傳授了豐富的知識，而且對我的研究工作給予了熱情的鼓勵和支持。其中一位，就是國際著名的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教授。1995 年春，我

5 許良英，“美國物理學史研究工作情況見聞”，《自然辯證法通訊》，1984 年第 5 期，第 53-61 頁。

6 許良英，致胡大年的信，1998 年 3 月 19 日。

7 許良英，致胡大年的信，1994 年 11 月 15 日。

選修了他的“中國近代史問題”研討班，該課程要求班上的每位研究生完成三篇（每篇至少 10 頁）課程論文。在頭兩篇文章中，我分別討論了 17 至 19 世紀之間的西學東漸以及數理學家魏嗣鑾的生平和科學貢獻。第三篇寫的則是許先生，題為“許良英：物理學家、歷史學家和民主主義者”；該文以《紐約時報》1994 年 3 月 11 日在頭版頭條對許先生起草的《為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所做的報導為切入點，介紹了許先生一生的坎坷經歷，並對其思想的演變歷程以及愛因斯坦的思想對許先生的影響，作了一個簡略的分析。這篇文章雖然在英文文法上還存在許多錯誤，但其思想內容以及所引用的豐富材料（其中很多都是許先生提供給我的）都獲得了史景遷教授的好評。後來得知，原來許先生在 1983 年訪問耶魯大學時也曾與史景遷交談過。十三年後，許先生回憶往事，當時對話的情形“猶歷歷在目”。1996 年夏，許先生來信向我推薦新出版的 *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Mao China*（H. Lyman Miller 著）一書以及史景遷教授為該書所撰寫的長篇書評，並請我代他向史景遷教授致意，稱其“是關心中國未來命運和主持正義的學者，是中國人民的真正的朋友”。⁸

8 許良英，致胡大年的信，1996 年 8 月 27 日。

1997 年秋，我通過了耶魯大學的博士資格考試（獲哲學碩士），從而可以全力從事論文的研究和寫作，研究方向仍為原定的“相對論在中國的傳播以及愛因斯坦在中國的影響”。如上所述，自 1992 年起，我就已經開始考慮這一研究課題。轉入耶魯之後，我仍繼續收集相關的資料並思考相關的問題，並於 1994 年春在 Klein 教授指導的“研究輔導（Research Tutorial）”課上，完成了一篇課程論文，在戴念祖先生“愛因斯坦在中國”一文的基礎上，對相對論在中國的早期傳播的細節，做了進一步地探索。然而，直到 1994 年底，我仍然不能確認一定能按此題目完成我的博士論文。⁹

現代物理學史中對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的研究始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發展到九十年代末已經產生了大量的專著和研究論文。在此領域，博士研究生已很難再找到一個新穎而又合適的研究題目。很多人一聽說我在研究愛因斯坦，便搖頭說，“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但當他們得知我研究的是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在中國的影響

9 胡大年，致許良英的信，1994 年 10 月 28 日。戴念祖的文章，曾刊于趙中立和許良英編譯的《紀念愛因斯坦譯文集》（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9），第 396—410 頁；亦見於《社會科學戰線》，1979 年第 2 期，第 74—85 頁。

時，則又連連稱許並對此表示了極大的興趣。題目雖好，但是否可行仍然是一個問號。我的導師 Klein 及其他關心我的耶魯教授，都曾關切地詢問我能否找到足夠的論文資料。當時，我自己對此也沒把握，但又必須及時給出一個答案，以便制定論文研究計畫和申請回國調研的經費。為此，我於 1994 年 10 月底寫信求教于許先生。¹⁰

先生在接到我的信後，立即作了回覆，指出，“‘Einstein 在中國的影響’，資料非常豐富，做一篇博士論文決無問題”。同時，他還安排轉寄給我他剛剛完成的一篇為“全美科學促進會”1995 年年會準備的發言稿，題目是“Einstein 的民主、人權思想對中國的影響”。關於相對論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史，許先生還在信中告我，“戴念祖 1979 年那篇文章，是我〔許良英〕建議他寫的，並幫助他修改定稿。他〔戴念祖〕僅花了兩個月左右時間，材料北京圖書館裏全有。早期材料，北大圖書館也會有”。¹¹

許先生所提供的許多資料和種種建議，都直接啟發和推動了我的研究工作。他的許多意見，也展示了一位秉筆直書、一絲不苟而又獨立思考的科學史家之風骨，

10 胡大年，致許良英的信，1994 年 10 月 28 日。

11 許良英，致胡大年的信，1994 年 11 月 15 日。

而這些都集中體現在關於他自己的老師束星北的一場爭論中。

非楷体

1994 底，許先生在給我的來信中提出，在研究中，也請你幫助我解決一個疑案。1979 年 3 月 9 日，我在浙江大學時的老師束星北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一文《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的日子裏》，說自己 1928-29 年間在柏林大學“愛因斯坦研究室”當了一年“研究助手”。開始我信以為真，1983 年他逝世後，我看了他自己填的幾份簡歷表，覺得根本不可能。1993 年出了一本紀念文集《物理學家束星北》，收了他這篇文章，我的 8 個疑點，以及別人反駁（並無說服力）我的信。待你開始搞研究時，我可把這本書寄給你，請你在 Martin 的指導下，設法查閱 Einstein 1928-29 年間的檔案，看有沒有束星北（Hsin P. Soh）當研究助手之事？當然，這也可作為你論文的一個內容。¹²

另起
段落

1996 年 5 月，許先生在來信中又再次敦促，

你的研究論文，希望對束星北究竟當過 Einstein 助手沒有這個問題作一可靠的答復。你的導師 Martin Klein 是 Einstein 全集的主編，你要查閱 Einstein 1927-28 年間全部檔案該很方便，並且可以向

¹² 同上。

Klein 和另幾位編輯專家請教，請他們幫助判斷。去年李壽枏公開發表束星北傳，肯定束當過 Einstein[的] 助手。同時又有人發起籌備束星北基金，要為此大肆宣傳。你應該通過自己的研究，在 Klein 教授指導下，來澄清這個問題。我的意見都已寫在 1992 年的信中（見去年送給你的非公開出版物《物理學家束星北》），希望你接下去加以研究。¹³

1997 年暑假期間，我駕車前往波士頓市，在波士頓大學 Mugar 圖書館檢索了愛因斯坦檔案（複製件），並於 8 月 15 日發現了一封束星北寫給愛因斯坦的英文信。¹⁴ 該信作於 1943 年 12 月 17 日，其中第一句話的開頭即寫道，“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中譯文為，“很遺憾我還沒有機會與您結識”。這句話足以證實許先生的懷疑：如果束星北到 1943 年尚未與愛因斯坦“結識”，他顯然不可能曾在 1928 年做過愛因斯坦的“研究助手”。¹⁵

13 許良英，致胡大年的信，1996 年 5 月 5 日。

14 Albert Einstein Papers (AEP), Special Collections, Mugar Library, 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MA, 56-173.

15 胡大年，《愛因斯坦在中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359-362。

9月13日，我將束星北致愛因斯坦信的內容，打印後函寄許先生（在此之前，我記得已經打電話告知先生）。9月20日，先生收到我的信後迅速回復，稱我“發現的這個材料非常有價值，足以否定《光明日報》1979年3月9日那篇《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的日子裏》的真實性”。許先生還立即將該信“轉寄王淦昌先生一份，請他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況”。¹⁶ 10月13日，先生又收到我寄去的束星北信的原件影本，第二天便帶著我的兩封信去看望正在北京醫院住院的王淦昌先生。王先生仔細看過信後，對許先生說，他知道“束先生要給Einstein寄論文”，“這篇論文是關於加速度的transformation問題”，他還幫助檢查過“其中的數學公式”，“至於信的內容，他並不知道”。王先生還認為，“那封信上的簽名，確是束先生的”。許先生在給我的信中指出，“當時王先生是浙大物理系主任，束先生想邀請Einstein來中國，按常理，應該同王先生商量，但束先生沒有這樣做。……中國當時深受戰亂之苦，束先生竟想請Einstein來中國度餘生，是異想天開”。王、許二先生都曾建議我繼續查找Einstein給束星北的回信，但迄今為止，仍未

16 許良英，致胡大年的信，1997年9月23日。

查到。¹⁷ 我以為，很有可能，愛因斯坦並未回信，其原因之一恐怕就是愛氏感到很難回復束先生的“異想天開”的邀請。假如愛因斯坦真有回信，而且束先生收到了，則束至少會在他 1979 年的回憶文章中提到。

根據上述束星北致愛因斯坦的信，許先生曾得出結論，不僅“1979 年《光明日報》上那篇文章肯定是不真實的”，而且“束先生從未見過 Einstein”。¹⁸ 當時，我是同意許先生的看法的。但十年之後，新發現的證據卻部分地改變了我的看法：束先生沒有當過愛因斯坦的助手，但他有可能在柏林見過愛氏。2007 年 7 月 19 日，我在柏林洪堡大學檔案館發現了一張束星北在該校註冊的卡片（見右圖），註冊日期是 1928 年 6 月 19 日，專業為數學（注意：束星北填寫專

Familienname		
Vorname	Soh, Hsin P.	
Staatsangehörigkeit	China	
Studienfach oder Beruf	Recht Mathematik	
Wohnung	bei, K. Probst, 99, 18 Neue Kant Str.	
Heimatadresse	Charlottenburg Kauking, (Ciangsu, China)	
Datum der Anmeldung	19/6/1928	Kursus Nr. 54/102

17 許良英，致胡大年的信，1997 年 10 月 19 日。王先生因兩個月前被一騎自行車的冒失鬼撞倒，致“胯骨開裂”，而住院。據許先生調查，束先生寄給愛氏的論文是：Relativity Transformation Connecting Two Systems in Arbitrary Acceleration, 后发表于 *Nature*, vol. 158, 99, July 1946.

18 許良英，致胡大年的信，1997 年 10 月 19 日。

業時用的是英文 mathematics，而數學專業的其他中國學生在填寫時則多用德文 Mathematik)。該卡片顯示，束星北 1928 年夏確實曾就學于柏林大學，但他當時的德文似乎並不熟練，而且只選過一門課（其他中國學生的卡片上，多數列有 2 至 4 門課），很可能在該校學習的時間並不長。可惜的是，我們還不知道束先生在柏林大學選修的是什麼課，因為所有卡片上都只列課號不列課名，而該檔案館的工作人員也不知道那些號碼所代表的課程。

許多人都知道，許先生是一位極為嚴謹的學者。任何人，無論他的權勢、地位、名氣、國籍以及與先生的個人關係如何，只要發現他們工作中的錯誤，先生都一定會給予嚴肅而尖銳的批評，絕不循私情。在許先生的學術生涯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我自己就曾多次幫他向《愛因斯坦全集》的主編 Klein 教授轉達他對《全集》中的某些評注所提出的批評和質疑；¹⁹ 又如，他最近撰文對席澤宗院士和李約瑟先生所作的批評。²⁰ 能夠像許先生這

19 僅僅在以下兩封信中，就提了三條意見。見許良英致胡大年的信，1996 年 1 月 5 日；1996 年 8 月 27 日。

20 參見許良英，“是愛因斯坦錯了還是李約瑟錯了？——與席澤宗先生商榷”，《科學文化評論》，2008 年第 8 期。

樣，為維護學術研究應有的嚴肅學風而秉筆直書者，實不多見。

更加難得和令人欽佩的，則是那些勇於面對自己的錯誤並公開承認和改正的學人，而許先生也是其中一位佼佼者。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看一看許先生是如何對待別人對他的嘔心之作《愛因斯坦文集》所作的批評的。眾所周知，三卷本的《愛因斯坦文集》，是由許先生領銜編譯，歷經十餘年嘔心瀝血的勞作才完成的；它也是先生在國內最廣為人知且影響最大的作品。全書共有 410 篇譯文，其中絕大多數是由許先生，以一個被遣送原籍、在農村接受勞動改造的“極右分子”的身份，獨自完成的。²¹ 通過長期艱苦的努力，《文集》在翻譯的信、達、雅三方面都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準，與近年來充斥於國內書市、粗製濫造的所謂“譯著”不可同日而語。然而，由於編譯者當時所受到的種種社會、政治和文化條件的限制，加上愛氏思想的複雜背景，該《文集》的早期版本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錯誤。1988 年，方勵之先生在《科

21 許良英，“一部多災多難書稿的坎坷傳奇歷程：《愛因斯坦文集》再版校訂後記”，《科學文化評論》第 4 卷第 6 期（2007）：62-70。譯文的篇數和字數，見第 69 頁。

技日報》發表書評，指出了《文集》中的兩個重要錯誤。許先生不僅愉快地接受了批評，承認它們是“反科學的時代污染，”而且還就導致這些錯誤的思想原因，作了極為深刻地自我剖析和反思。²² 在其耄耋之年，先生仍孜孜不倦地完成了對上述“時代污染”的徹底清理，於2009年底又出版了《愛因斯坦文集》的增補本。從此，先生終於可以擺脫對愛因斯坦的一種“負罪感”了。²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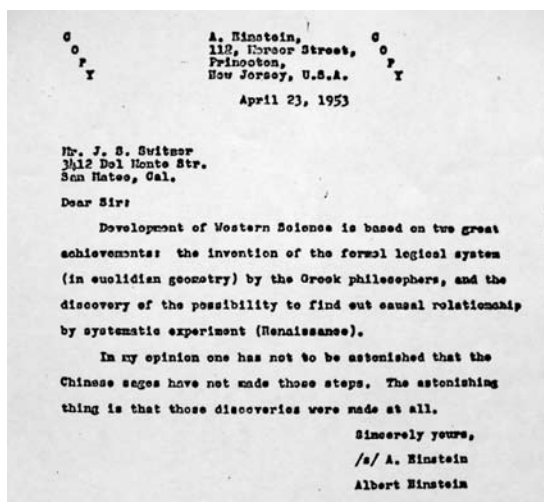
許先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風和虛懷若穀的高尚品德，更凸顯於其對一封只有四句話的短信的譯文數易其稿。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內學界關於“李約瑟難題”的討論，可以說是“長盛不衰”，僅在1980-1998年間，“已發表論文260餘篇，出版著作達30餘種”。²⁴ 到了九十年代末，更是將“中國古代有無科學”的問題“炒

22 方勵之，“評《愛因斯坦文集》”刊載於《科技日報》，1988年8月7日；許良英，“《愛因斯坦文集》中為什麼會有這些錯誤？”，刪節稿刊於《科技日報》，1988年8月28日，原稿則收入《科學·民主·理性—許良英文集（1977-1999）》，第182-185頁。

23 今年（2010年）夏天，許先生對筆者說過，如果不完成此清理，他將“永遠感到對不起愛因斯坦。”

24 引自劉鈍，“李約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約瑟”刊于劉鈍和王楊宗編，《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李約瑟難題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論著選》（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3頁註腳2。

得火熱”。²⁵ 恰好，在《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中，有愛氏專門為回答這一問題致斯威策先生的一封信（右圖為原信複製件的照片）。斯威策（J. S. Switzer）是一位美國陸軍上校，退休後到斯坦福大學歷史系攻讀碩士學位。其間他選修了漢學家 Arthur F. Wright 的閱讀課（Reading Course），探討“中國有無科學的問題（the question of



science or no science in China)”。為此，斯威策自作主張，將課上討論的主要問題記下來寄給了愛因斯坦，並得到愛氏的答復，從而為我們留下了愛氏之卓見。²⁶ 愛因斯坦回信的內容，大概因李約瑟在其 1961 年的論文“中國科學傳統的貧乏和勝利”（“Poverties and

25 同上，第 23 頁。

26 Arthur F. Wright, 致 Derek J. de Solla Price, 1959 年 10 月 20 日, AEP, 61-382.

Triumphs of the Chinese Scientific Tradition,”) 中全文引用而公諸於世。可以想見，該信自然會成為爭論的雙方都需要關注和利用的重要證據，特別是當該信的譯文出現歧義時。

為清楚起見，我先將愛因斯坦英文原信的內容復述如下：²⁷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最早出版於1976年1月，當時編譯者為譯文加了標題：“西方科學的基礎和中國古代的發明”，信的譯文為：

27 A. Einstein, 致 J.S. Switzer, 1953 年 4 月 23 日, AEP, 61-381.

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

需要說明的是，此譯文並非基於愛因斯坦的原信，而是譯自李約瑟的引文。²⁸ 李約瑟在引用該信時，不僅對愛因斯坦的英文做了少許修改和潤色，而且將原文的兩個段落並作一段。²⁹

由於將“these discoveries（這些發現）”誤解為中國古代的許多科技發現，許先生錯誤地在上述譯文中加了“【在中國】”三個字。³⁰ 後因發現海外的中譯本與此不同，許先生經過深思，意識到“這些發現”並非指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而是指信的開頭所說

28 許良英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 574 頁。

29 李約瑟對愛因斯坦的英文做了少許修改和潤色：見 H. Floris Cohe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 Historiographical Inqui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第 565 頁注 219。目前還不清楚，李約瑟為什麼要修改愛氏之原文。

30 許良英，“關於愛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譯問題—兼答何凱文君”刊于《自然辯證法通訊》，2005 年第 5 期第 100-101 頁。

的作為西方科學發展基礎的兩個偉大成就”。但是，由於先生仍誤以為“‘發現’的主體應該是中國賢哲”，為了避免與前一句相矛盾，而將最後一句理解為“虛擬式”，並在1983年第一卷第三次印刷時，將其譯文改為：“要是這些發現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事”。³¹

1998年以前，我並未注意到上述與“李約瑟難題”有關的討論，也不知道許先生1983年對譯文的改動。大約在1998年夏天，我在回國調研時拜會了董光璧老師和許良英先生。交談中，他們都委託我去愛因斯坦檔案查一查愛氏的原信。當年8月10日，我在波士頓大學圖書館不僅找到了愛氏的原信，而且發現了另外兩封相關的通信。一封是耶魯大學歷史系的漢學家Arthur F. Wright寫給他系裏的同事Derek J. de Solla Price（即著名的科學計量學家普賴斯）教授的，向他推薦愛氏的信，建議將其收入正在編輯的愛因斯坦書信集中，同時還介紹了該信的來歷以及斯威策先生的一些背景。另一封是普賴斯寫給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奧本海默（Oppenheimer）教授的，因普賴斯不知道誰在負責收集和編輯愛氏的材料，他請奧本海默

31 同上，第100頁。

代為轉交。³² 12月20日，我將上述3封信同時寄給了董、許兩位先生。在信中，我還寫道：

我與 Martin J. Klein 教授和 F.L.Holmes 教授討論過關於如何理解 Einstein 的回信，特別是信的最後一句話的問題。他們都認為，Einstein 信中最後一句話的意思是：“使人驚奇的是，那些發現，【不論在何處或被何人，】到底都被做出來了 (and that’ s enough!)”。由此看來，《愛因斯坦文集》中的中文譯文中，譯者在最後一句中所加入的“在中國”三個字，是因誤解原文而導致的誤譯。“在中國”三個字應該從譯文中刪去。

Klein 教授認為，Einstein 在其回信中並未就關於古代中國人是否做出了信中所述的兩個發現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斷。(Martin said that Einstein was not an exper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It is probably irresponsible for him to make such kind of judgment on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Einstein 的意思是：究竟誰做出的那些發現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們畢竟被做

32 Derek J. de Solla Price, 致 Oppenheimer, 1959年10月30日, AEP, 61-383. Arthur F. Wright 教授曾于1947-1959年間就職於斯坦福大學，1959年以後則任教于耶魯大學歷史系，他在耶魯培養的博士畢業生中包括現在世界聞名的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教授。(http://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F._Wright, 2011年10月11日查閱。)

出來了！³³

我在寫此信的前後，還曾打電話與許先生專門討論過最後一句話的譯文。正如先生自己在他的文章中回憶的那樣，我當時未能說服他放棄他的“虛擬式”理解和譯文。對此，我並未放在心上，因為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愛氏的信對於我的論文研究以及中國科技史界的重要性。直到最近我無意中讀到許先生答何凱文君的文章，才知道，原來先生早在15年以前就將原譯文中的“在中國”三字刪掉了；2005年初，他又重新審讀思考了愛氏致斯威策的信的譯文問題，“終於認識到自己固執己見的錯誤，愉快地接受了胡大年、Martin J. Klein和張之翔的意見，”並再次修改了譯文。³⁴

常常有人把許良英先生的執著誤作固執。上面的故事證明，實際上先生是聞過則喜。當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時，不僅不文過飾非，而且將其公諸於眾，其心胸之坦蕩，在當今中國學界恐少有出其右者。作為許先生的晚輩和學生，在解決束星北是否當過愛因斯坦的助手，以及關於愛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譯文問題，這兩個疑案的過程中，我不過在先生的直接啟發和指導下，做了少

33 胡大年，致董光璧的信，1998年12月20日。

34 許良英，“關於愛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譯問題”，第100頁。

量輔助工作，卻多次受到先生公開的點名致謝和稱許，這使我深受感動！先生以其身教，為我們年輕的一代，在如何正確對待他人的學術幫助方面，也樹立了楷模。

最後，我還想再討論一下愛因斯坦致斯威策的信的譯文，並對許先生 2005 年的譯文提出兩點商榷。該譯文先發表于許良英和王瑞智編的《走近愛因斯坦》（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其標題由原來的“西方科學的基礎和中國古代的發明”改為“西方科學的基礎和古代中國無緣”：

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係。

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作出這些發現是令人驚奇的。

首先，我不同意新標題中的“無緣”二字。通觀該信，我以為愛因斯坦並未作出“無緣”的判斷。這裏的關鍵，在於如何理解該信的第二段第一句（“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ese steps.”）。假設斯威策曾在他的信中詢問過愛因斯坦：“為什麼古代中國有燦爛的文明，卻未能孕育（西方）科學？”（當然，

要確認這一點，必須要找到斯威策給愛氏的信。）那麼，當愛因斯坦說“中國的賢哲們未能邁出這兩步”只不過是在復述斯威策的問題，但換了一種說法。這裏似乎並不包含愛因斯坦自己的判斷。正如上面Klein教授所說，以愛因斯坦對中國歷史的有限瞭解，他不會對如此重大的學術問題輕率地下結論。我以為，愛因斯坦在這一句話裏想要表達的意思是：即使“中國的賢哲們未能邁出這兩步”人們也不必感到驚訝，因為我們本來就不應該期待世界上任何人會作出這樣的發現。對於中國人是否真的未“邁出這兩步”，其實愛因斯坦並未置可否。另外，先生用逗號將這一從句分為兩段，也容易使讀者產生誤解。其次，新譯文中最後一句的意思是正確的，但似乎尚未把原文的語氣完全表達出來。這裏的難點，在於如何翻譯“at all”。我以為，《愛因斯坦文集》1976年版中的譯文，只要去掉“在中國”三個字，即“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全都做出來了”，要比新譯文的“作出這些發現是令人驚奇的”，更貼近原文。

我不揣冒昧，在先生的譯文的基礎上又作了一些調整，將愛氏的信重新翻譯如下，再就教于先生並恭賀先生九秩高壽：

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希臘哲學家（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所發明的形式邏輯體

系，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的通過系統實驗找出因果關係的可能性。

在我看來，人們不必對中國的賢哲們未能邁出這兩步而感到驚訝。令人驚奇的倒是那些發現到底都作出來了。

胡大年：1984年畢業於北方交通大學建築系，1984-1987年就職於國家計委標準定額局，1987-1989年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讀物理學史研究生，2001年獲得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博士學位，現任紐約市立大學城市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做人——做學問，人生觀——世界觀： 祝父親九十大壽

許成鋼

“非凡的人總要遭到平庸小人的瘋狂反對”。

——愛因斯坦

做人正直勇敢，頑強善良，以及對社會黑暗醜惡勢力的疾惡如仇，是自幼父親對我教育的最重要的部分。在我剛剛能夠聽懂故事的時候，最早聽到的是父親講的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高玉寶的《我要讀書》、《半夜雞叫》以及《水滸》裏面的“李逵探母”等。當時父親在東廠胡同二號家裏給我講這些故事的許多情景片斷至今仍然歷歷在目。面對父親講述的連環畫畫面，我常被感動得潸然淚下。父親教我做誠實坦誠，助人為樂，見義勇為的孩子；教我的英雄是李逵式的直勇搏擊的戰士。父親給我的童年教育裏，除了漠視甚至鄙視名利之外，不存在任何與功名、財富和地位相關的內容。這一“過於”強調誠實和正直並且漠視功名的非孔孟之道的“片

面”教育使我一生很難“適應”現實社會，甚至時常感到處處格格不入。

記得在幼稚園時期，有一次在家裏見到父母解放初期身穿幹部制服的照片，誤以為是軍裝，到幼稚園向小朋友吹牛說我爸過去是解放軍（科學院幼稚園的小朋友裏幾乎沒有任何人的家長是軍人）。結果好奇的小朋友到家裏詢問，被當面揭穿。父親極其嚴肅地教育了我必須誠實的道理。雖然多少有些委屈，但誠實做人的基本準則卻銘刻在心。

對世界對自然的好奇探索和理解，也是自幼父親對我啟發引導和教育的重要部分。直到自己從事研究工作之後，我才真正理解，對世界的真摯的好奇心與做人的正直，是作為一個學者必備的基本素質。在我童年生活的記憶裏印象特別深刻的一幕是父親帶我參觀剛建成的北京天文館。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記得當時面對令我眼花繚亂的宇宙和地球模型及觀測儀器，父親給我講解宇宙的奧妙帶來的巨大的興奮。利用北京天文館的宇宙及地球模型，父親向我解釋大地是個球，地球與太陽、月亮的關係，日食與月食的現象與原因，太陽系的結構。並向我解釋天文館大廳正中懸掛的巨大的“傅科擺”如何能證明地球的自轉。雖然對此道理的真正理解是以後的事，但每當我見到“傅科擺”時，尤其是在北京天文館，

我都會回想起那一幕。父親也領我看過位於建國門的古觀象臺，講解中國古代天文學家觀測天象的方法。

稍晚些，父親反復給我講述在黑暗的中世紀，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等科學家為真理而慘遭迫害並為之獻身的故事。那些故事自幼銘刻在我心裏，其深刻含義至今仍然讓我思索不止。在事實面前，在科學面前，世界上沒有什麼人的理論是天經地義不可挑戰的。而揭示真理時常會同某些既得利益集團衝突，古今中外追求真理都要付出代價。特別是在專制的社會裏，真理遭到權貴利益集團的扼殺，愚昧產生於對言論的封鎖，產生於權貴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追求真理經常要付出血和生命的代價。這種代價使得不畏暴政追求真理的科學家寥若晨星。最讓我驕傲的是，父親是這寥寥晨星之一。

記得在幼稚園年代，一次乘車，有人給母親讓座。我很不解，問父親為什麼。父親告訴我媽媽要生寶寶了。那時所居住的東廠胡同2號是科學院的宿舍。院子裏的“大人”都是科學院的研究人員或幹部，孩子們即便不是幼稚園同學也是整天玩耍在一起，甚為和諧。但是從某一天起，我感到一些年齡稍大的孩子變得態度異常，冷漠甚至敵意。有人直率地說，你爸爸是右派。雖然“右派”一詞聞所未聞，但從小朋友無端的敵意中已經可以猜到幾分。那天晚上我問父親，“他們說你是右派。你

是嗎？”“什麼是右派？”他說我還太小，長大以後會明白的。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在我成年以後，吳敬璉教授曾經向我提起那天目擊科學院全院大會批判“大右派”的父親的情景。在批判會後他同父親乘同一輛卡車從中關村回東城。

從那天又過了幾個禮拜之後，有一天，一個陌生人到家裏同母親談話，態度非常嚴厲，母親一直在哭泣。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母親哭，感到十分惶恐。成年後才知道，在那段時期，黨組織要求母親把父親趕出家門，迫使其順從黨給他的處分去東北勞改。母親無法執行這一“任務”，而且深感她曾以性命而為之奮鬥，對其極其忠誠的黨極其不公正，使她無法理解，無法接受。這使她極度悲憤，導致我的妹妹也隨著母親的過度悲哀而胎死腹中。此後因為“包庇”父親的“右派言行”母親受到嚴厲處分。

不久父親被迫孤身離家回浙江老家務農，接受“改造”。沒有人知道這一去何時再歸。他沒有機會見到我進



移到
下一页

入小學的那天，更從來沒見到過我作為中學生的樣子。自從父親離家直到我成年，我只在小學四年級和五年級時同父親短暫見過面，但每次都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

1961年父親第一次回北京時，我已經小學四年級。那年初春的一天，父親突然回到家裏。見到父親的喜悅之外，他那補丁摺補丁的花子服也讓我驚訝與傷心。在我的記憶裏，那時他的衣服堪與現在存放在父母家中的他1978年從農村帶回的襤褸衣衫相媲美（見圖）。當時正值全國的“困難時期”，即由“大躍進”引發的全國大饑荒時期。全國窮困，千百萬人餓斃。消息封鎖，文字獄盛行。在北京念小學的我，除了時常“吃糠咽菜”感受饑餓外，對京城之外發生的災難一無所知。

作為一個曾經被劃為右派的農民，他的境遇遠比其他他人困難得多。雖然衣衫襤褸，一貧如洗，飽受歧視，父親表現出的樂觀和信心超過我所見過的所有的人。儘管被黨列為敵人，那時的他仍然以全部熱情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忠於黨的路線，忠於毛澤東，並以此教育我。此後十多年醒悟之後，我們全家都“嘲笑”他當年的愚忠。我記得那時他稱自己是像李雙雙一樣的農民（李雙雙是當時流行電影《李雙雙》中的主角，是個大公無私維護集體利益的人民公社社員）。每當談起他美麗的家鄉——浙江臨海張家渡村，就興奮不已。不厭其煩地講述他的

家鄉之風景如畫，那清澈見底涓涓流淌的溪水，象鼻岩之美不讓桂林山水等等。他對家鄉優美景色的描述，從我兒時開始，一直講述到如今九十歲高齡時，還是眷戀依舊，希望有朝一日能乘高速列車重返家鄉再次欣賞家鄉如畫的美景。

1962年我五年級時，父親第二次回北京。這也是我在成年之前我們的最後一次見面。那年他回來的原因是為了編譯《愛因斯坦文集》。他雖然極其窮困，卻為籌備此項工作興奮不已。在短暫的父子團圓的時日裏，他向我談起愛因斯坦。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愛因斯坦”這個偉大的物理學家的名字。父親用最深入淺出的方式向我解釋愛因斯坦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的偉大貢獻。他重新提起我在幼稚園時曾經問過他的一些物理問題，諸如：為什麼汽車開動時人會向後倒、剎車時又會向前倒？為什麼汽車開動時窗外的東西會往後跑？等等。父親簡單地做了些解釋後說，待我長大後才能進一步解釋。在重新提起這些問題時，他深入淺出地提到了伽利略的相對性原理。作為一名偉大的科學家，伽利略的故事是我自幼就聽他講起的。雖然只是朦朦朧朧，類似這種關於伽利略的相對性原理的許多啟蒙性科學史的講解，讓我潛移默化地體會到實證觀察與科學理論發展的緊密關係。

父親除了講科學以外，也大量的講“革命”。那是

個“革命”的年代，那時的他，雖然被黨整肅，但對殘酷整肅他的政治體制仍然並沒有清醒認識，對反右的陰謀與陽謀仍然不能識破，內心仍然是個忠誠於黨的革命戰士。他誠心誠意地承認自己反對反右運動的錯誤。同時，他多次結合自己的經歷向我講述並介紹《在烈火中永生》和《紅岩》。在我的記憶裏，《紅岩》是他寄給我的。父親送給我的《在烈火中永生》一書中有許多他的批註。他告訴我與這兩本書的主題內容相關的他自己地下黨時期的經歷，以及到重慶尋找共產黨的經歷，包括浙江大學地下黨的故事。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于子三事件（從我懂事起，家裏的牆壁上就一直張貼著于子三的肖像）。于子三是當時浙大的一名進步學生，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他與地下黨有聯繫，但並不是黨員。1947年10月于子三被秘密逮捕，後被殺害在浙江保安司令部監獄。由此爆發了反迫害爭自由的全國性學生運動。當時父親是浙大地下黨支部書記。

1962年父親回來時，帶我走訪了許多他過去在地下黨時期，以及在科學院工作時的朋友和同事，例如李晨，呂東明，趙中立等。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他們所討論的問題，都是同革命、國家，以及學術息息相關的，而不是家庭問題，或一般的人事關係……這一切對我當時來說，雖然似懂非懂，但覺得很新鮮也很刺激。

那段與父親的接觸，時間雖然短暫，但他的談吐，使我感受到了很多同齡人感受不到的新鮮內容。當年我在香山慈幼院讀小學。同學大多是幹部子弟和高級知識份子子弟。在此背景下，同學中流行對家長官職和工資級別以及家庭財富程度方面的攀比之風。父親回京時，我向他提到同學之間的這種攀比風氣。父親對此表示大不以為然，全然冷漠。那時我心裏感到，父親一定是我們全班同學所有家長中最窮的，但卻是最有學問的，也一定是最革命的。

父親在京的短暫訪問很快就結束了。我記得那天和母親、弟弟一起送別父親的那一幕，我們送他到家附近的燈市口無軌電車站，從那裏他乘車前往北京火車站。他用扁擔挑著從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的前身）與科學院圖書館借來的大量有關愛因斯坦的文獻。當時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知道，自打那時分開後，一別就是13年。那時作為一個農民，父親居然能在北京圖書館借到如此大量的圖書，當時的我不懂其中的緣由，但是以後想起來覺得這也像是一個奇跡。後來才知道，當時父親的這項工作是屬於中共高層所下達的任務。

父親回到浙江農村以後，我和他的往來只限於通信。他給我寄來過多卷的《十萬個為什麼？》，書中他寫了許多批註，絕大部分批註都是指出書中的各種邏輯錯誤

和事實錯誤。他這種指出流行書籍中邏輯錯誤與事實錯誤的做法，對我少年時期的思想影響非常大，使我自幼的心靈裏種下了重邏輯重事實不盲從的種子。在那個時代，凡是印在書上的就是正確的，而從那時起“唯書為上，唯鉛字為準”的崇尚潮流在我心裏已經開始動搖。當然，面對毛澤東和政治體制的獨立思考獨立批判的能力，則是在很多年後，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後才獲得的。

在我讀初中一年級時，父親給我寄來了他用筆名“林因”發表的論文《試論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之所以用筆名，是因為被劃為右派後，他被禁止用真名發表論文。當我收到這篇論文時，異常興奮。雖然並不能真地看懂，但懵懵懂懂地讀了很多遍，有些命題留下深刻印象，由此激發的對科學和哲學的熱情和興趣對我以後的思想的發展意義深遠。我與個別談得來的同學討論這篇論文。當時我們班裏有一兩位同學讀書較廣，涉獵很多歷史、哲學與物理的入門知識。在那個以革命壓制知識、以熱血掩蓋愚昧的年代，居然還有人知道愛因斯坦是偉大的物理學家，但是沒有同學能讀懂這篇論文。從那時起，我開始自學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這本當時國內大學普遍使用的哲學教科書。我在自學這本大學哲學教科書時，很自以為得意，覺得自己很超前（以為自己一個初一學生可以讀懂大學的哲學教科

書)。碰到一些閱讀困難或想不通的命題，如否定之否定規律等，在與父親的通信中試圖向父親請教。可是，沒有想到父親回信中對這本當時流行的大學教科書，以及一些流行的觀念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批評的核心是關於哲學與科學之間的基本關係問題。他認為哲學是科學的工具，不可君臨科學之上發號施令。哲學可以為科學探索開路，但不可為科學堵路。

從那時起，在後來的幾十年裏，通過通信和交談，父親多次同我討論與世界觀問題相關的基本問題：哲學與科學的關係；數學與科學的關係；邏輯與實證的關係；關於科學的起源；關於科學同希臘哲學在根本上的差別；關於科學是以實證為基礎的；關於數學是人造的邏輯結構，哲學也是人造的邏輯結構，它們關心的是邏輯的一致性；而科學關心的是外在世界，和對外在世界的認識，所以它一定是以實證為基礎的；關於哲學對科學的可能的啟發意義；關於哲學並不能夠從普遍意義上指導科學；等等。從我讀初中一年級時起，我就記得父親講解的這些基本道理，持續至今。這對我思想裏形成的對世界的基本的認識有重大影響。實際上，這些基本認識至今都對我的研究與教學有著實質性的基本影響。譬如：如何認識經濟科學？如何認識理論經濟學和實證經濟學的關係？一些經濟學家，特別是理論經濟學家，在這些基本

問題上概念混亂，以致對經濟學的發展和教學造成嚴重的惡果。之所以說是“嚴重惡果”，是因為這些經濟學家對經濟學是什麼，經濟學到底是數學還是科學，概念混亂。結果把經濟學變成了像數學一樣，起點是公理（假設），其終點是邏輯的證明；判斷的標準是邏輯證明的優美。但是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它的起點必須是觀察，是實證的內容；其終點必須仍然是觀察，是實證的驗證。起點和終點之間的邏輯結構，是為了幫助人們更深刻地去認識事實之間的關係，為了更好地去組織人們的觀察。

在我讀初一和初二年級的那段時間裏，與父親有大量的通信往來，通信的內容基本是討論一些基本哲學觀點和有關革命的思想。這使我深受其影響，當然沒可能與其“劃清界限”。父親對黨對革命事業的虔誠的愚忠也深深地影響了我，使我從一個極為頑皮的孩子變成了一個積極上進的學生。在清華附中初中二年級時，我變成了同學老師公認的學習優秀政治上積極上進的學生，被同學選為少先隊大隊副隊長。當時清華附中共青團分團委很希望我加入共青團，我自己也非常希望能夠加入共青團。但因不能與父親劃清界限遭到否決。我在二十多年後才得知這件事情的原委。那時清華附中分團委不是一個獨立的機構，其上級機構是清華大學團委。分團

委把我的入團材料報到大學團委，結果後者否決了我的入團申請及分團委的建議，理由是我不能和我父親劃清界限。原因是，清華大學黨委和團委掌握了父親在反右運動中的所謂“右派罪行”：為清華大學的右派（如物理系的何成鈞教授等）喊冤叫屈，攻擊黨的“反右運動”，說反右運動破壞了黨與知識份子之間的關係，等等。

為與父親劃清界限，我曾經讀過一些反右時主要報刊上批判父親罪行的文章，包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還有別的報紙。讓我吃驚的是黨報刊登的他的罪名，說他造謠說黨中央分裂了，說劉少奇、彭真反對毛主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但是讓我同父親劃清界限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父子感情當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此外，另外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這引起我內心產生強烈矛盾：一方面，自幼父親對我的基本教育都是忠誠於共產黨。基於父親對我的一貫教育，我忠誠於共產黨。但另一方面黨要我同我的父親劃清界限。這一對矛盾在我心裏非常尖銳。我同父親的所有通信來往，以及有限的父子交談，要麼是做人要誠實；要麼是要我忠於黨，忠誠於革命事業；要麼是有關科學和哲學的基本道理。我看不到什麼是應該劃清界限的地方，怎麼劃清界限。

1966年初夏，文化革命爆發。清華附中是紅衛兵

的發源地。在清華附中紅衛兵組織成立以後，他們首先打擊的對象之一就是出身不好的學生幹部或優秀學生。雖然年紀還小，我那時腦子裏面的愚忠已經相當深入。以為共產黨毛主席發動的所有革命運動一定有深刻的為了解放全人類的道理。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文化革命；是毛主席親自支持的清華附中紅衛兵。紅衛兵推行血統論，尤其是血統論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使得自己的頭腦非常混亂，非常痛苦。認為這是毛主席發動的革命的基本內容，認為自己過去不能與父親劃清界限，意味著自己將成為革命對象……於是我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表示與他斷然劃清界限。寫這封信是我一生最讓我自己感到恥辱的一件事。從此，我與父親的關係，與父親的通信往來斷了幾乎十年。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真正能夠與父親劃清界限。事實上，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我自己後來的一系列政治與思想上的活動和行為以及後果，都同父親一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1970年，我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因從事探討文化革命性質的政治經濟學自學研究活動被打成反革命時，每一次的批鬥會和大多數批判我的大字報中，在我的罪名上都要提到我出身於反動家庭，我父親是個大右派等等，我的罪名總是與父親是個大右派的背景形影不離。

在文革高潮時期，也就是 1966 年晚些時候，在毛澤東發表了批判劉少奇的大字報之後，清華大學的造反派在全國最先張貼出了批判劉少奇的大字報，把劉少奇與彭羅陸楊聯繫在一起。當時我看了這些大字報感到非常詫異：怎麼回事，毛主席發動的文化革命的革命對象怎麼會與父親當年的“右派言論”是一樣的呢？當年也許父親不但沒有錯，而且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面？這些問題都裝在我的心裏，除了跟極個別信得過的同學（文革時的戰友）提過，從未敢與其他人提起過。無獨有偶，多年以後，哈佛大學的麥克法誇爾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在其巨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書中，引用父親當年的這些“罪行”作為其討論文革起源主線的證據。但是父親認為他當時的這些言論是聽別人說，自己並不相信，也不符事實。

大約在 1974 年，在中斷多年通信後，第一次在黑龍江農村收到父親從浙江農村的來信。當時我迫於監督勞動的條件以及對政治社會問題的頹喪情緒（我於 1970 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完全停止了對政治經濟學的探索，轉而把所有業餘時間用於自學數學、物理學和電子工程，集中精力於控制方面的技術革新。父親來信教導我應該堅持原來的志向，不可因受打擊而放棄初衷。他還寄給我《康帕內拉 (Campanella) 傳》，要我

學習中世紀宗教迫害下勇不屈服的戰士。鼓勵我站得更高，看得更遠，鼓勵我關心更寬廣的問題，從社會到政治，從科學到歷史。在我身陷逆境的時候，此書竟成了我與那時的戀人呂匡輝的一本重要共同讀物。這些鼓勵是我自從被打成反革命以後，恢復我的自信以及廣泛熱情的最重要的支持，是我的精神的轉捩點。父親寄給我一些關於狹義相對論以及相關的科學史的書籍。那段自學給了我關於相對論的啟蒙知識，對後來理解科學史及相關的科學哲學討論非常重要。父親鼓勵我關注當時正在進行的“批林批孔”“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等運動。在此鼓勵下，我得以部分重拾政治經濟學興趣。好在自從林彪斃命之後，我的“罪行”有所減輕，歸還了部分被沒收的書籍。雖因身陷囹圄與世隔絕，對當時政治運動的背景一無所知，面對當時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鋪天蓋地的聲勢，我感到其邏輯難以理解。對照《資本論》英文本（經恩格斯親自譯校），我發現官方（現在歸咎於四人幫）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議論及批判違反馬克思的原意，從馬克思主義角度看，存在基本概念問題。

1975年夏天，我同父親時隔13年後第一次得以相見。那次相見於杭州的原因很特殊。1974年黑龍江建設兵團對我的“反革命案件”下了正式“結論”，誣陷我在十幾歲時曾組織過遍佈全國九個省市自治區的、目

的在於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組織。父親得知此情，強烈要求我設法尋找途徑力爭平反。儘管他的身份是農民，依然想方設法尋找他的朋友來幫助，全力以赴地做各方面的努力。此外，他當時非常迫切地希望能見到我的另一個特殊的原因直到見到他才知道。除了我的“反革命”平反問題外，他要同我談的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對毛澤東和“四人幫”的認識；第二，是對文化革命的認識（當然這兩方面是聯在一起的）；第三，就是對當時國家前途的深刻擔憂。在文革之前，雖然被打成右派，父親對共產黨毛澤東的愚忠仍超出常人。父親對毛澤東的迷信直至 1974 年才猛然醒悟；他開始醒悟文化革命是個大騙局，毛澤東是個大騙子，大暴君。他強烈希望我能夠意識到：毛澤東發動、四人幫推動的文革對國家造成巨大的災難；他對國家的前途深感極度的擔憂。在文字獄盛行的恐怖年代，這些話都只能面談。雖然對政治內幕細節知之不多，我在對待文革及許多相關問題上，在此之前就已經持相當批判態度。所以，我和父親的看法一拍即合。

1976 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臺，“文革”浩劫結束。父親終於可以全時地集中精力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了。1978 年以前，父親的身份仍然是個“農民工”：是農村戶口的商務印書館每月領取 50 元生活費的臨時工。

在經歷了嘔心瀝血的十多年坎坷之後，1976年深秋《愛因斯坦文集》終於即將出版。但四人幫的覆滅使父親樂極生悲。他受了風寒，咳嗽不止，飯也吃不下。我陪他去醫院門診，查出右肺有陰影和空洞。下午商務印書館通知父親去看剛到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樣書。在路上，父親咳了血。第二天又咳了一茶杯。於是商務編輯徐兆福和我送父親住了北京結核病院，後又懷疑是肺癌。在那段期間，我幾乎每天在他的病房。前往探視父親的人絡繹不絕，以為他要不久于人世。

萬幸的是，醫院對父親的各種嚴重懷疑都被逐一排除。3個月後，父親回到商務印書館做臨時工，直到1978年回到中國科學院。父親在商務印書館除了著力《愛因斯坦文集》及自己的研究工作以外，還在自己的辦公室裏，每個禮拜組織一個小型討論會（workshop），討論愛因斯坦研究的文獻。經常來參加討論會的人員有趙中立、張宣三，方勵之也來參加過幾次。我每次都去旁聽，甚至還報告過一些文獻。記憶最深的內容是有關產生愛因斯坦早期成就的科學（理論和現象）和哲學的基礎。與此相關，父親建議我翻譯幾篇著名物理學史家霍爾頓（Gerald Holton）關於愛因斯坦的科學史以及科學哲學的論文。這些工作和討論給我留下難忘印象。其中有些對我的思想產生很大影響。例如，霍爾頓關於

愛因斯坦與牛頓的世界觀和科學方法論的對比，尤其是他們的共性；方勵之關於“科學走進來，哲學退出去”的議論，等等。在那段時間裏，過去黑龍江建設兵團的摯友王貞平也來過商務印書館同父親交談，並參加了一部分翻譯霍爾頓科學論文的工作。最近，他在給我的信中這樣提起，“回想起當年回京，向伯母說明你的情況，她淒然淚下。又去商務印書館宿舍見伯父，他身著農民黑棉襖，爽朗而樂觀。而我目睹中國知識界精英蒙此不白之冤，則悲憤不已”。

我於 1984 年離開中國社科院去哈佛經濟系做訪問學者時，在哈佛拜見的第一個師長不是經濟學家，而是父親的朋友，物理系的霍爾頓教授；他也是在哈佛第一個邀請我赴家宴，第一個邀請我到鄉間別墅與他家人小住度假的師長。難怪我的經濟學思維裏充滿了與物理學的歷史和發現過程相關的內容。同霍爾頓教授的最後一次見面的機會更像是上帝為父親同他的友誼而設。那是在 2008 年美國物理學會大會的頒獎儀式上。父親與霍爾頓教授同時獲獎：霍爾頓教授榮獲 Pais 物理史獎，而我則代表父親領取薩哈洛夫人權獎。

1986 年，父親與方勵之和劉賓雁在中關村家裏小聚，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共議和反思“反右運動”之教訓，以防類似慘劇重演，禍害國家

人民。不幸，這項計畫被當局封殺，方勵之和劉賓雁被開除黨籍。同時被開除黨籍的還有王若望，是當局把父親誤為王若望，使父親得以暫時倖免。同時，深得民心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迫辭職。這是自從文革結束以來的第一次與改革反其道而行之的最嚴重的政治事件。

這個消息震驚了在美留學的中國學生——文革以後的第一批赴美留學生。在1987年胡耀邦被迫辭職之前，廣大留學生普遍意氣風發地認為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朝著民主的方向緩慢前進，言論自由逐漸得到保障，反右運動之類的悲劇不會重現。卻萬萬沒想到胡耀邦本人會因為所謂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職，著名知識份子重新遭受迫害。受此衝擊，哈佛、普林斯頓和哥倫比亞等學校的留學生分別獨立自發發起組織起草公開信；以後合而為一，中國大陸留美學生發表了千人“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如今這千名簽字的學者裏，許多是國際、國內的學術帶頭人，或政府機構、金融機構、國際機構之要員。我當時在哈佛經濟系讀博士，在深度擔憂之中與其他憂國憂民的同學一起，亦為此盡了些綿薄之力。千人公開信中說，胡耀邦的去職“將極大地損傷全國人民進行改革與建設四化的積極性，使我們感

到震驚和不安”。“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的處置和批判，……使人感到這是打擊知識份子、壓制思想解放歷史悲劇之重演”。“我們以為，近來事態的發展是與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國策背道而馳的，並使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等權利受到了嚴重侵犯。發展下去會斷送我國的政治經濟改革”。古今中外，專制、腐敗和恫嚇從來是促成社會不穩定的基本要素。不幸的是，1987年初發生的這一系列事件成了兩年後的“六四”事件的前奏。歷史悲劇以血腥的方式重演。

在1988至1989年期間，政治改革未見蹤影，“新權威主義”卻甚囂塵上。鼓吹者認為中國的改革不宜提倡民主和人權，而必須走新權威主義之路，以新加坡為榜樣；或者至少中國的政治改革應該曲線民主。當年鼓吹“新權威主義”者之中，居心叵測者有之，認識不清或心存幻想者更有人在。父親從民主和人權的基本原則出發，旗幟鮮明地深刻指出“新權威主義”之危害。最具迷惑力的反對民主及鼓吹新權威主義的論點強調民主可能不利經濟發展。對此，父親強調過的最突出的要點之一是，民主和人權是每個人的基本需要，經濟發展既不能離開民主，也絕對不是改革發展的全部目的。父親的這些要點同著名經濟學家森（Amartya Sen，獲1998年諾貝爾獎）以及科爾奈

(Janos Kornai，對中國以及全世界轉軌經濟影響最大的經濟學家)所長期強調的民主和人權之見解完全一致。即，民主與人權不僅有其可能作為經濟發展手段的工具價值(instrument value)，更重要的是其作為人的社會及發展的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同時，父親強調寬容為維護人權的基本原則，強調通向民主的道路只能是長期的思想啟蒙；反對任何急於一蹴而就的過激行為，尤其反對任何以民主或人權為名義的秘密團體活動，使用陰謀或暴力手段。事過二十多年，“新權威主義”體制長期刻意壓制民主與人權導致的後果現已昭然若揭，父親對“新權威主義”的深刻批判不幸而言中。專制剝奪民權益發肆無忌憚，貪汙腐敗益發氾濫成災，社會矛盾益發激化，違反民主法治的“維穩術”越維越不穩。雖然中國的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由體制內產生的社會政治經濟的穩定問題，已經赫然成為決定中國經濟可否持續發展的決定因素。即使只為了維持經濟發展，新權威主義體制也已是非改不可了。

憂國憂民，為推動政治民主化，1989年2月，父親發起致趙紫陽總書記及中共中央的公開信。42名著名學者簽字，其中包括兩彈一星元勳王淦昌，多個中科院及社科院研究所的正副所長，院士，著名作家等。信

中充分肯定十年改革的成就，同時指出因政治改革的缺失而導致的嚴重問題，尤其是腐敗盛行。呼籲儘快盡力進行政治改革。紐約發行的《世界日報》評論說，“這封公開信在海外產生了重大影響，也成為後來八九民運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

在1989年4月開始的北京學生爭民主反腐敗運動期間，父親努力向學生申述民主的基本原則；並以他有限的影響力，反對任何過激做法，力主學生停止絕食回到校園，以理智冷靜爭取民主，以思想啟蒙為爭取民主之長遠道路等等。可是當時他的主張未被採納。6•4大屠殺之後，父親的生命安全受到極大威脅。許多親友強烈勸他離家避難。他毅然拒絕。在接受國外記者採訪時，父親在被竊聽錄音的電話中公開宣佈，他隨時準備被捕，願為民主事業做一個譚嗣同，死而無悔。

父親為民主所做的努力以及遭遇得到了國際學術界，新聞界及政界的關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古德曼教授（Merle Goldman）是其中之一。古德曼教授曾兩次訪問過父親。在一次訪問時，她注意到並默背了父親牆上懸掛的愛因斯坦肖像下的一句愛因斯坦語錄：“非凡的人總要遭到平庸小人的瘋狂反對（Great spirits have always found violent opposition from mediocrities）”。她回到哈佛後，要

我打長途電話回家，幫她確認這段語錄的每一個字。她說這句話確切地描述了父親的境界和遭遇，她要在她的著作裏引用。她說，父親是她心中的英雄（“he is my hero”）。她曾在若干著作中向世人系統介紹父親在人權民主方面的努力和見解。在她的著作《在中國播種民主的種子：鄧小平時代的政治改革（*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一書中，古德曼教授介紹了1989年2月父親發起的公開信對後來學術民主運動的影響。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米勒（H. Lyman Miller）教授在其著作《後毛時期中國的科學與持不同政見者（*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 Mao-China*）》中則詳細介紹了父親組織這封公開信的科學家背景。實際上父親是此書討論的主要人物之一。在古德曼教授的另一著作《從革命同志到公民（*From Revolutionary Comrade to Citizen*）》中，她介紹了父親1992年的文章《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能成功》。

父親的這篇文章發表於北京出版的《未來與發展》雜誌1992年第五期，為“今後十年中國改革的前景與問題”大型筆談的文章之一。文章直指鄧小平南巡有意回避的問題：政治民主。此文的發表在海內外引起震動。但由於刊載此文，導致該雜誌幾乎被迫停刊。父親在文

中回顧，在1981年，改革的目標“曾確定為：建設一個‘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現代化國家。人們為這個目標所吸引，對未來充滿希望。可是，由於根深蒂固的幾千年封建傳統的作祟，民主始終是寸步難行。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出史無前例的人間慘劇之後，民主自由被視為洪水猛獸，堅持主張民主的人被斥之為‘敵對分子’。時間仿佛又回到了‘反右’和‘文革’年代”。父親指出，光搞經濟就像是拐了一條腿，原來的那些問題都還存在，將來會出大亂子。還尖銳地指出，如果人是經濟的動物，經濟搞好了，就什麼都好了，那希特勒搞得最好。因為納粹上臺之後，德國經濟年增長率達11%，何況希特勒搞的也是“社會主義”，我們應該高喊“希特勒萬歲”了！事隔十八年後，在充分觀察中國及其他轉軌國家的發展的基礎上，2010年，著名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教授在為吳敬璉教授八十壽辰的祝壽辭中，以相同的方式獨立地重述了與父親以上完全相同的論點。

事隔近二十年，中國的改革已造就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中國進一步發展所面臨的重大困境，進一步改革所面對的重大挑戰，均比那時更清楚，在沒有政治民主的經濟發展下，司法不能獨立，言論新聞不能自由，民怨益發高漲，社會不能穩定。在沒有政治民主的經濟

改革中，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交換導致腐敗愈演愈烈，巨大經濟利益引發的對政治權力的爭鬥更加危險，不僅改革不能前進，甚至政治不能穩定。如今，“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能成功”已逐漸成為仁人志士的共同認識。

1994年3月，父親同六位知識份子共同發表公開信，呼籲當局改善我國人權狀況，指出“舍人權而侈談現代化，無異緣木求魚”。次日，《紐約時報》以頭版頭條長篇報導。但是這一呼籲改善人權狀況的努力卻導致父母親的人權受到極其嚴重的侵犯。先是他們被軟禁在家；隨後他們無論是外出做操，還是去醫院看病，都有警察跟隨其後。從那時起，住所的第一層樓門口，多年來一直都有警察，目的是監守，禁止父親與外人來往。我每次回國探視父母，都身受穿警服或著便衣的警察的嚴密監視。甚至我的朋友來看我也受到警察的無端騷擾與恐嚇。那時有社科院的同事開玩笑說，如今治安不好，令尊真福氣，有保鏢24小時保護。多名國際國內的學者向我講述過他們探望父親時遭受警察騷擾甚至扣押的經歷，其中多數人因此未能見到父親；但仍有少數人使用巧妙方法瞞過警察見到父親。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The N

VOL. CXLIII . . . No. 49,632

Copyright © 1994 The New York Times

7 Chinese Intellectuals Appeal For End to Political Repression

Beijing Urged to Free Dissidents and Stop Arrests

By PATRICK E. TYLER

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mes

BEIJING, March 10 — Challenging the Government's latest crackdown on dissidents, seven leading scientists and intellectuals appealed in writing today to President Jiang Zemin for an end to repression of free speech and for the release of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The statement, made available to Western journalists a day before Secretary of State Warren Christopher is to begin an official visit, is believed to be the first petition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human rights from a group of eminent intellectuals since the crackdown on the Tiananmen Square demonstrations in 1989.

Arrests Are Protested

The group said it was protesting the arrests and intimidation of dissidents over the last week in advance of Mr. Christopher's visit and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e appeal to the authorities to bravely end our country's history of punishing people for their ideas, speech and writing, and release all those imprisoned because of their ideas and speech," said the petition, signed by seven intellectuals. The group was led by Xu Liangying, a 74-year-old historian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who helped translate Albert Einstein's collected works into Chinese.

"People of insight, who are concerned with the fate of the nation and who are dedicated to our country's modernization, feel shocked and at the same time upset and worried," the statement said, adding, "To talk about modernization without mentioning human rights is like climbing a tree to catch a fish." [Text of appeal, page A10.]

The tone and spirit of the statement recalled the popular movement that rose in the winter of 1989 and gathered momentum that spring, first among intellectuals, then among students and workers. Their protests in favor of democracy paralyzed Beijing and seiz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for weeks until the movement was crushed by tanks and machine-gun fire in Tiananmen Square on June 4, 1989.

Petition Mailed to Officials

Mr. Xu said he mailed the petition today to President Jiang and to Qiao Shi,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r parliament. Official Chinese news organizations have not yet reported the appeal, but its existence is likely to become widely known here through foreign radio broadcasts beamed to China.

Providing a copy of the petition to The New York Times, Professor Xu asked that it be conveyed to Mr. Christopher and expressed a desire to meet with him during his three-day visit, which begins on Friday.

In Tokyo, Mr. Christopher sought to play down expectations that he might meet with dissidents, saying he had no "plans to do so at the present time." [Page A10.]

The other signers were Ding Zilin and Jiang Peikun, philosophy professors whose son was killed during the military crackdown four years ago; Shao Yanxiang, a poet; the writer Zhang Kangkang; Liu Liao, a physicist; and Professor Xu's wife, Wang Luli, a historian.

All are well known and command

Continued on Page A10, Column 1

1994年3月10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报导父亲
发起的呼吁当局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公开信

在父母被軟禁期間，1995 年的一幕強迫“旅遊”頗有戲劇性。那年 9 月，“第四屆國際婦女大會”將在北京舉行。同年 8 月，我去東京參加“國際經濟計量學”大會，計畫會議之後回北京探望父母。此前，警察到父親家裏來，要求父親在第四屆國際婦女大會期間離開北京，遭拒絕。中科院出面幫助勸說父親離開北京。父親說，必須要等遠道歸來的兒子回來一起決定。記得在我回到北京之後，在路上已經看到家門口停了兩輛警車。臨近家門時，警察從車裏出來呼喚我的名字，使我十分吃驚，沒有料到陌生警察會知道我的名字。警察在確認我已回到北京後，很快就到了我父母家，要求全家離開北京。於是，由中科院具體安排，我們全家於 1995 年 8 月底，在科學院幹部的陪同下一同離開北京來到山東煙臺，到煙臺的第一站居然是住在警備司令部的招待所。

1995 年 5 月，父親發起了一封題為“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中國的寬容”的公開信。如同 1989 年公開信，此信聯合了 44 位國內著名的知識份子，其中許多是在不同方面對國家做出過非常重大貢獻的科學家和學者。在這份呼籲書上簽字的著名科學家和學者中，有相當一些現在已經過世了。對於中國的未來，對於中國人民，父親和他們一起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為推動中國的進步做出了貢獻。1993 年聯合國決定設 1995

年為“國際寬容年”，以促進聯合國《寬容原則宣言》的基本精神。該宣言指出，“寬容是一種確認人權、多元化包括多元文化、民主和法治的責任。它擯棄教條主義和專制主義並確認國際人權文件所提出的標準”。父親希望在此寬容年之際，向國內外有識之士呼籲寬容之原則，關注中國的狀況。

在父親起草的“寬容呼籲書”裏，提到了古今中外歷史上一些著名的因不寬容而踐踏人權的事件。例如，在中世紀的西方，把思想上的異端看成是洪水猛獸，以至於把布魯諾當眾燒死；用刑訊手段逼迫伽利略放棄地動說等等歷史悲劇。與此並列，呼籲書裏提到中國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受害者2000人；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把全國11%以上的知識份子打成專政對象；“文革”更是消滅異己的民族大災難。到1978年以後，雖然許多冤假錯案得到了平反，初步展現過一些好轉的局面，可是由於缺少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所必須的寬容制度或氛圍，還是發生了1989年的六四慘案。這份呼籲書中說：寬容是民主政治的應有之義，也是政治民主化的條件；寬容體現為對人權與自由的尊重，又應以道德準則和法律為界限。這份呼籲書同時在國際間，在香港和紐約用中英文同時發表，在國內外引起非常廣泛的反響。呼籲書發表之後，世界上有數以千計的

科學家和知識份子以及社會活動家，包括 10 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這份呼籲書上簽了名。不出所料，許多簽字者受到當局的嚴重騷擾與威脅。而出乎意料的是，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楊振寧居然迫不及待地配合當局的騷擾與威脅，以卑劣手段破壞寬容呼籲書的聲譽。此舉如同在三十年代曾經出現過的極少數為納粹服務迫害其他科學家（包括攻擊愛因斯坦）的諾貝爾獎科學家，如勒納德（Lenard）和斯塔克（Stark）。他的倒行逆施立即引起各界強烈譴責。例如當時紐約的《世界日報》上發表一文題為，《楊振寧博士何必站出來反對寬容？》著名作家王若望先生亦發表文章（《動向》1995 年 8 月號）評論楊振寧的作為。他說，在呼籲書發表之後，“得知王淦昌列名於‘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籲實現國內寬容’的公開信，楊振寧迫不及待地前往‘做工作’”。他表示“對楊振寧這位博士，在事件之後如此緊逼，如此積極地甘當丑角”，“深感噁心”。但是，世界上絕大多數科學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幾個月後，1995 年 9 月，紐約科學院宣佈，為表彰父親在推動科學家的人權方面所做的努力，授予父親“佩格爾斯科學家人權獎”（與丁子霖共得）。紐約科學院在頒獎聲明中特別提到這份寬容呼籲書。

幾年之後，2008 年美國物理學會（APS）宣佈授

予父親“薩哈洛夫人權獎”。美國物理學會的頒獎聲明說，授獎于父親是“為其一生通過寫作及向公眾傳播，宣揚真理、民主和人權，即使在遭受監視、軟禁、騷擾與威脅，甚至流放的條件下也不放棄 (For a lifetime's advocacy of truth,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 despite surveillance and house arrest, harassment and threats, even banishment -- through his writings, and publicly speaking his mind)。”美國物理學會還說，“正是通過許良英的工作，愛因斯坦的人權、社會正義、知識份子社會責任的思想在中國開始廣為人知，也被 1980 年代以來的民主運動所引用。在這一時期，許還大量寫作，宣揚科學與文化的繁榮需要學術自由”。“1995 年 4 月，他發起‘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中國的寬容’的呼籲。他的呼籲的簽名者常常成為政府的迫害對象。九十年代以來，APS 國際科學家自由委員會一直關注著許的政治和身體狀況”。

由於父親身體不好，不能親自前往領獎，於是由我替父親赴美參加美國物理學會 2008 年大會的頒獎儀式。在頒獎儀式上，我代表父親將《愛因斯坦文集》三卷經學會主席贈送給美國物理學會（現藏於美國物理學會的玻爾物理學史圖書館），獲熱烈歡迎。同年 8 月 7 日，

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布希在泰國曼谷就美國與亞太國家和地區關係的總結性“告別”演講中，引用父親關於人權的一貫見解。他說，“我們呼籲實現開放與正義，不是為了把我們的觀念強加於人，而是為了使中國人民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正如中國科學家許良英所說：‘嚮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

美國物理學會薩哈洛夫人權獎甄選委員會成員哲傑西（Edward Gerjusz）和曾敏兒（Betty Tsang）兩位教授對媒體說明該委員會為何在全世界諸多極為優秀的致力於人權的物理學家中決定授獎給父親，因為他“幾十年來致力於人權和自由，即使遭到迫害，仍堅持不懈，深具愛因斯坦的精神”。在父親九十壽辰之際，曾敏兒教授在她給父親的祝壽辭中寫道，“許良英老師，只有在罕有的人生時刻能遇到像你這樣不凡的人物”。

最後讓我引用愛因斯坦在《探索的動機》一文中的話來結束此文。這是愛因斯坦在普朗克六十歲生日的慶祝會上所講的。“在科學的廟堂裏有許多房舍，住在裏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樣，而引導他們到那裏去的動機實在也是各不相同。有許多人所以愛好科學，是因為……科學是他們自己的特殊娛樂……另外還有許多人所以把他們的腦力產品奉獻在祭壇上，為的是純粹功利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來把所有屬於這兩類的人都趕出廟

堂，那麼聚集在那裏的人就會大大減少……我們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這也就是我們所以愛戴他的原因”。父親一貫謙卑，反對我將其同科學巨匠普朗克相提並論。為了更確切地表達我的用意，也許我應該把愛因斯坦原話中的“科學的廟堂”改為“科學與民主的廟堂”。眾多的人們敬重父親，是因為他為科學與民主的真誠和執著；因為他只服從於真理；也因為他畢生為推動中國的科學與民主事業所作出的貢獻。

許成鋼：1982年獲得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碩士學位，1991年獲得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教授，現任香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特聘教授，首爾國立大學“世界級大學”客座教授。

附錄 1

決不讓黨內右派分子腐蝕黨的肌體 公然反對黨對右派分子的反擊 許良英的靈魂浸透了右派思想

《人民日報》1957 年 7 月 29 日第 2 版

本報訊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全體工作人員在黨的領導下，於最近期間揭露並批判了該所右派分子共產黨員許良英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

在開始大鳴大放期間，許良英放出了許多煽動性的言論。他說：“整風的第一階段主要是讓大家吐吐怨氣”；“發牢騷是拆牆的第一步”。並且說：“反正大家經過肅反，都可以一視同仁”，就是說不需要什麼階級路線和黨內外的界線了。他持著這種思想和不可告人的目的，打著大鳴大放的旗子到處點火，散播反黨言論，還說“這樣的鳴放是黨的最高利益”。

許良英認為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初期有許多好的東

西，如自由、平等、博愛、個性解放等等，值得我們繼承。並認為只有繼承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才能“使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能迅速趕過資本主義國家”。他說這是他學習了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後的“心得”。並到處宣揚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他曾經對科學出版社的一位同志說“資產階級舊民主好，蘇聯所以發生斯大林事件就是因為缺乏資產階級民主”。

在大鳴大放期間，他覺得文匯報最過癮，因為“文匯報揭發得最徹底”。對人民日報則因為它反擊右派“太粗暴”，所以他不願再看了。

這個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真面目的充分暴露，還是在黨中央提出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戰鬥號召之後。

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以後，許良英在6月13日該所黨員骨幹小組會上公開地發動了對黨的惡毒進攻。他說人民日報發表這樣的社論，就是說整風運動不搞了，他覺得“很可惜”。他認為人民日報對右派進攻發動了反擊是“使人感到昨天還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變了臉，不道德，連起碼的民主也沒有，太粗暴了”。又說，“從章伯鈞、章乃器、儲安平等人的言行中看不出反對社會主義的東西；他們只不過是代表資產階級發表意見而已”。他認為章伯鈞說現在要出匈牙利事件了，

黨應該讓步，這話很對。他也對人說現在全國要大搞了，並煽動人進行反社會主義的活動。他認為人民日報將右派分子的話用大字標出是“製造人民內部的分裂”，“八個版全面反擊不是和風細雨的整風”。他還質問人民日報：“為什麼要這樣搞法？這樣整風就搞不好，要整風也是講空話”。他說：“給唯一向毛主席提意見的儲安平以雙倍打擊，是太粗暴了”。他還污蔑說：“對右派分子發動了反擊可能是毛主席的方針受到了黨內有宗派主義的高級幹部的反對，因而有了轉變，毛主席妥協了，這是老幹部想報復；太不道德了”。他還造謠說：“中央分裂了。劉少奇彭真壓制毛主席”並且裝做正人君子的面孔聲言：“我要起來捍衛毛主席的路線，不惜犧牲黨籍，丟開孩子和家庭”。他曾經去科學出版社問一個同志是否同意人民日報社論的看法，那位同志回答他說同意，他立即罵人家說：沒出息的知識份子，對這個都沒有反應。後來還對別人說，“這個人被黨支部搞過去了”。

在很短的幾天中，他城裏城外奔走過八九個地方，找過十幾個人，進行了不少的活動。但對於這些活動，除了同志們揭露的之外，他自己還很少交代。

關於他的反動思想和罪惡活動，目前哲學研究所的全體同志，正在進一步進行揭露批判和追查。

附錄 2

他們在哲學研究所研究什麼？

研究破社會主義立資本主義

許良英李德齊是黨的叛徒

《人民日報》1957 年 8 月 3 日第 2 版

新華社 2 日訊 中國科學院在 1、2 兩日舉行大會，揭發和斥責黨內右派分子許良英、李德齊。

哲學研究所研究人員許良英過去的許多老朋友、老同學以及同他一起工作過的同志舉出大量具體材料，揭穿了許良英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政治面貌。出身于惡霸地主家庭的許良英，自 1946 年入黨以來，每遇到個人野心遭受挫折時，即和黨對立，特別是反右派鬥爭開始以後，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更加猖獗。6 月 8 日起，人民日報發表了反右派的社論，許看了以後咆哮如雷，要撕掉人民日報，他販賣右派分子的謠言，胡說“黨中央分裂了”，“毛主席受到高級幹部宗派主義

的反對，這些高級幹部想報仇，太不‘道德’”；“毛主席妥協了”等等。他四出奔走點火，曾經向科學院院部、幾個研究所、中央團校等十多個單位的二十多人散佈對中央、對人民日報反右派社論的不滿言論；向他們宣傳資產階級的所謂“民主”，鼓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字報。他認為黨中央、領袖和任何人都不配被信任，只能相信他自己的“獨立思考”。科學院黨委書記對他進行教育後，他仍然堅持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的立場和觀點，說要堅決反對黨中央這樣做法（指反右派鬥爭）。他揚言不惜“犧牲黨籍”，並且為自己準備了兩條退路：“回鄉種田”或者“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做‘地下工作’”。

許良英在會上作的“檢討”中，他是客觀上反黨反社會主義、主觀上不反黨不反社會主義；他還說擔心別人誤會他的“政治面目”。批駁他的人同聲指責許的“檢討”是極不老實的。批評者揭發的許多材料已足夠證明許良英的政治面目很清楚——是右派分子；許的反動言行明明是通過主觀的；許是黨外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內應。會上發言者一致要求許良英要繼續徹底交代他的反動言行。留學美國的科學家舉出了美國勞動人民沒有民主自由的許多事實，來駁斥許良英所十分欣賞的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下略）

附錄 3

許良英：死心塌地追求民主

周密

原載《世界日報》所屬的《世界週刊》

2008 年 6 月 22 日

八十年代，天體物理學教授方勵之和《愛因斯坦文集》編譯者許良英在青年學生中間有很大的影響力不是偶然的，他們對獨立思想的理念身體力行，是提倡科學和民主啟蒙的著名中國知識份子之一。

今年 4 月 13 日，美國物理學會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在聖路易召開年會，會長畢能斯達克 (Dr. Arthur Bienenstock) 頒贈「薩卡洛夫獎」及獎金一萬元給中國科學院高級研究員許良英，但許良英因健康因素不宜遠行，由長子許成鋼博士代表接受。許成鋼並代表回贈父親所翻譯的《愛因斯坦文集》三卷給美國物理學會，贏得全場人士的熱烈掌聲。

許良英一生際遇與中國現代史吻合，可說是當代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年輕時，他一腔熱血想為中國的進步而投身革命，曾是忠貞的共產黨員，搞學運，更

是馬克斯主義的忠實信徒。然而，科學家求真求是的精神，促使他在中年的時候，重新衡量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因而發出「覺今是而昨非」的正義心聲，致力於闡揚民主自由的真正精神，即使遭到中共當局的密切監視，他也不為所懼，堅決的為人權而奮鬥。

美國物理學會的「薩卡洛夫獎」旨在表彰科學家在推動人權的卓越領導成就，每兩年頒贈一次。哲傑西 (Edward Gerjusz) 是甄選委員會五名成員之一，他接受訪問時表示，今年被推薦角逐該獎的候選人很多，而且條件都很好，至少有 10 名以上。許良英之所以能夠勝出，是因他幾十年來致力於推動人權和自由，即使遭到迫害，仍然堅持不懈，深得愛因斯坦的精神。另一位甄選委員曾敏兒 (Betty Tsang) 也是這麼表示。

許良英在書面答謝詞中以一貫的勇氣，疾言厲色：「正是愛因斯坦的思想使我醒悟，開始致力於捍衛人權的抗爭和民主思想啟蒙事業，使踐踏人權的專政的中國轉變成為尊重人權的民主自由的現代國家。」88 歲的許良英一路走來，什麼苦都吃過，也曾自殺過，但他自認已重生過三次，一心只想為中華民族的未來而進言，什麼都不怕了。

道德文章 啟迪八九學運

舉世矚目的八九天安門學運發生於1989年春天。在那之前，許良英為迎接「五四運動」70周年和法國《人權宣言》問世200周年，於1988年9月至1989年4月之間，寫成一系列文章闡述民主，如：《駁民主緩行論》、《中國的反民主逆流》、《呼籲政治民主化的聯名信》、《民主與科學是現代國家立國之本》、《「五四」和中國的民主啟蒙》，及《新權威主義新在哪里？》等。其中以《呼籲政治民主化的聯名信》及《「五四」和中國的民主啟蒙》最具震撼力。

許良英和浙江大學同學施雅風於1989年1月中討論國家大事，對方勵之1月6日向鄧小平建議實行大赦，釋放魏京生等所有政治犯的公開信非常讚賞，他們希望能夠徵集更多有成就的知識份子簽名支援，於是由許良英寫成信稿，並進行徵集簽名的工作。由於許良英患有心臟病，常常發作，所以遊說的工作時停時續，一個月後始徵集到42人簽名，多半來自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大學等。

這封「呼籲政治民主化的聯名信」於2月28日掛號郵寄給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總理李鵬等四人。信中直指民主與法治是經濟改革及杜絕腐敗的必要保證，

籲請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以及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獲罪的青年。如此公開發表政治見解在中共統治下是很罕見的。這封公開信對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也成為後來八九民運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

1989年4月胡耀邦含冤去世，許多大學生自動發起反腐敗爭民主的運動，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前。許良英的《「五四」和中國的民主啟蒙》這篇文章曾在5月的天安門廣場上反覆廣播。「六四」後該文被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定為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民主自由人權方面的代表作。許良英本人被指為是僅次於方勵之的八九民運的黑手。六四大屠殺以後，他因身體健康因素未被逮捕，但第二次被開除黨籍，且遭到中共當局的長期監視，他家的電話一直被竊聽。

棄馬克斯 勇於面對迷信

許良英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近代物理史的高級研究員，他從青少年時期就熱心從事共產黨的地下活動，是一位資深的共產黨員。1949年中共掌權後，他數度遭受整肅。許良英獲浙江大學物理系學士，是著名物理學家王淦昌的得意門生。1957年許良英因公開反對反右派運動，同情知識份子，成為中科院第一個被批的人，被定為「極右分子」，這在當時是極為嚴重的

罪名，表示是人民的敵人，許良英於 1958 年第一次被撤銷共產黨黨籍，還失去公職被下放到黑龍江，但是他拒絕去。

許成鋼說，小時候不懂右派的意義，後來才漸漸知道，右派的孩子長期受社會歧視。不過，資質優異的他於 1979 年跳過大學直接考進清華大學工程碩士班，這是因毛澤東死後制度改變之故。他後來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現為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

被打為右派的許良英，受到黨內很大的壓力，結果被迫和在中科院任職的妻子王來棣離婚，以免連累家人。許返回故鄉浙江省臨海縣勞動，做個普通農夫，同時開始翻譯《愛因斯坦文集》。三卷《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過程歷經 14 個年頭的煎熬，於 1976 年至 1979 年間陸續出版，在知識份子中迴響很大，也引起中共新一代領導人胡耀邦的關注。愛因斯坦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全力倡議，直接啟迪當代中國民主的思潮。然而，這可是有違當初翻譯的目的，毛澤東絕對想不到因為翻譯《愛因斯坦文集》，共產黨的整個基業將可能被動搖，這是相當諷刺的史實。

許良英在接受「薩卡洛夫獎」答謝詞中說：「當時我和方勵之就是在愛因斯坦思想的感召下，開始思考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問題的。」

許堅信馬克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他一度死心塌地地跟從毛澤東，即使遭受整肅，仍「心服口服地承認自己是錯了」。他說他遲至 1974 年，才從毛澤東的迷信中猛醒過來，他瞭解毛澤東和江青發動「批林批孔」的真相，只是為滿足自己的權力欲望。

雖然許良英不再相信毛澤東，但馬克斯主義仍為其中心思想。他後來不斷增廣對國際現勢的認識，不斷研究近代文明發展史，對馬克斯的迷信也漸次消滅。1987 年是一個關鍵的時刻，他常說：「只要胡耀邦還在臺上，共產黨還有一線希望。從胡耀邦的下臺，我進一步明確認識到，馬克斯的最大歷史錯誤是主張專政，排斥民主。」

胡耀邦 1987 年 1 月被黜罷官，造成大陸人民極大的失望。這也促使許良英徹底的放棄對共產黨和馬克斯主義的最後一點信仰。

許良英在許多篇文章中分別詳細記載他的心路歷程，並且不畏中央威權，也不怕別人訕笑，誠懇的說出他「覺今是而昨非」的大徹大悟。任何人展書閱讀《科學・民主・理性—許良英文集》時，都可以感受到他獨特的知識份子情操。

只問是非 不計個人利害

正如許良英的門生胡大年博士所說：「許老師最大

的特點是做人正直，學術嚴謹，容不得一粒砂子，即使親密的朋友，也直言指出，絕不講情面的。我們做學生的在做人上和學風上都學到很多！」

另一位高足王作躍博士深表贊同，並補充說道：「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許先生的話，就是他的勇氣（Courage），借用其師竺可楨（注，浙大校長（1936–1949）及中科院副院長（1949–1974））的話，就是『只問是非，不計利害』，是非的問題比利害問題要高得多。許先生做得非常好，看到不應該的事情都會說出來。」

當問及許成鋼如何被嚴父教導時，他說父親雖嚴厲，但講道理，可以和他辯論。王作躍說，他曾指出許良英翻譯上的錯誤，老師馬上虛心接受，不會擺架子。

八十年代，天體物理學教授方勵之和《愛因斯坦文集》編譯者許良英在青年學生中間有很大的影響力不是偶然的，他們對獨立思想的理念身體力行，是提倡科學和民主啟蒙的著名中國知識份子之一。

老而彌堅 大聲疾呼民主

1994年3月9日，許良英和六位異議人士撰文呼籲當局重視人權，宣稱中共推動現代化卻罔視人權，無異於緣木求魚。兩天後，美國紐約時報在頭版頭條刊登記者邵培德（Patrick E. Tyler）對他的訪談，標題是

《七位中國知識份子呼籲結束政治鎮壓》，可是中共非但不衡量呼籲的事實，更加侵犯呼籲者的人身自由權利，派駐大批軍警到他們在北京中關村的宿舍區，把許良英夫婦軟禁三天。此後，他們的宿舍常有警察把守，不准外國記者採訪，並任意逮捕他們的訪客。

1995 年許良英又起草呼籲書《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寬容》，希望中共不要在把有獨立思想的人當作「敵對分子」，重新評估六四事件，釋放所有因思想、言論和信仰問題而被關押的人，結束中國傳統的文字獄之災。同時，希望全社會培育尊重他人的寬容精神，棄絕暴力行為。國內簽名的共有 45 人，接著得到國際知名人士的熱烈回應，一個月內共有一千餘人簽名，其中 10 人是諾貝爾獎得主。

不過，許家宿舍因此又引來一批警察守衛，訪客被拘扣，簽名者陸續有七人被警察傳訊。許良英說，他既然呼籲避免極端的情緒，自己也沒有發表任何抗議聲明。

倒是美國物理學會的國際科學家自由委員會（AP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Scientists）自 1990 年代起就積極的注意許良英的安全。

1995 年許良英獲得紐約科學學院的漢茲・派哥獎（Heinz R. Pagels award），讚揚他為民主自由作出重

大貢獻。

許良英和長期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老伴王來棣合作，自 1985 年起，開始大量閱讀西方文獻和各家代表作，計畫寫一部「夾敘夾議、學術性與普及性並重的闡述民主的歷史和理論的著作。」他在美國物理學會的「薩卡洛夫獎」得獎答謝詞中說：「我們年事已高，視力很差，記憶力已開始衰退，且經常有各種雜務干擾，工作進展很慢，現在還只寫到美國建國初期。但我們有信心，一定要把它完成，為中國民主、自由、人權事業盡自己應盡的力量」。

誠如愛因斯坦於 1954 年接受一項人權獎時所說的名言，「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了意見，對它們保持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愛因斯坦的這份崇高的人道信念，成為許良英為中國民主和人權奮鬥的原動力，這也是為什麼他一直為民主大聲疾呼、老而彌堅之故。

參考書：許良英，《科學・民主・理性——許良英文集（1977-1999）》，明鏡出版社，2001 年 12 月初版。

——原載《世界週刊》2008 年 6 月 22 日 39-41 頁。

《文化情理》系列 43

書 名：呼喚民主與人權：賀許良英先生九十壽辰

編 者：王作躍 劉兵 陳恆六

出版人：何 頻

責任編輯：謝 銘

封面設計：餘 夢

出 版：明鏡出版社

網 址：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通訊地址：P.O. Box 795, Deer Park, NY11729-0795, USA.

電 話：(516)338-6976

國際統一書號：978-1-935981-53-4

定 價：HK\$ 90 NT450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一版